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国之行

〔美〕费正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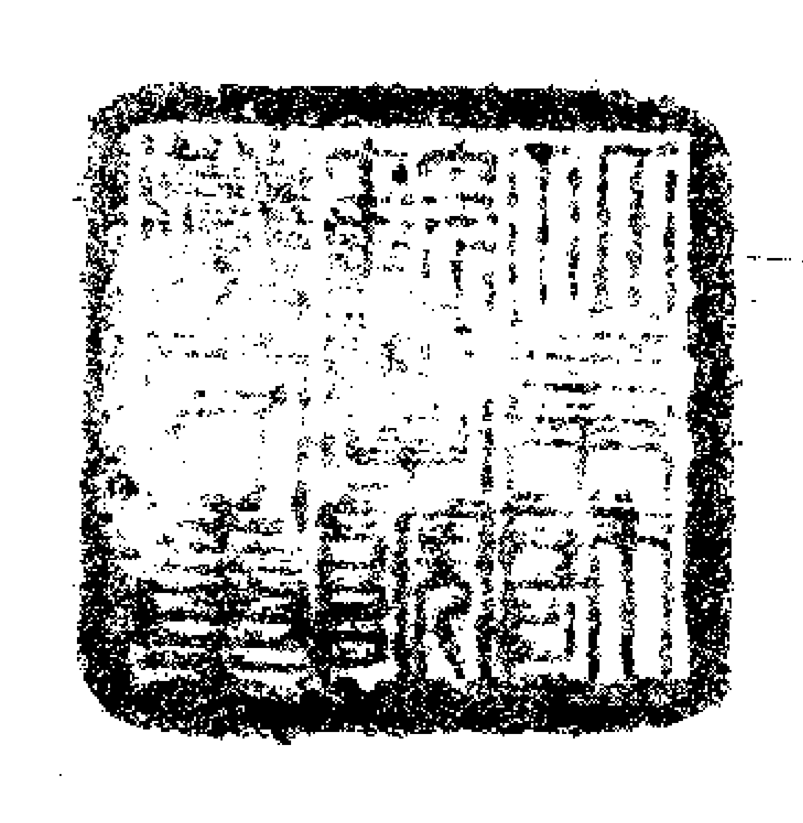
赵复三 译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国之行

〔美〕费正清 著

赵复三 译





新华出版社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 国 之 行

〔美〕费 正 清 著

赵 复 三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插页2张 115,000字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5011—0135—3/I·21

统一书号：10203·235 定价：1.50元

前　言

许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各国新闻界的极大注意。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立场不同的新闻记者，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封锁，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称解放区）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并不为外人所详知。

首先冲破这种封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于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此后，他们都又多次访问中国）。接着，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爆发了持续八年之

久的抗日战争。这个时候，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或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中国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和埃德加·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解放区的资料。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各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时期，由于这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的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象斯诺一样，为促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不息，作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计划出版一套丛书，专门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包括作家或其他方面人士）所写的，报道或者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迹的著作。

出版这些著作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看看这些外国同行如何观察、分析、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采访与写

作的角度，看看他们如何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他们的文采怎样？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特别是有些出自名家手笔的佳作，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较，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较迟，发展较慢，技术设备等也比较落后，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近百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中国兴起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它就显现出磅礴的气势，使得剥削阶级的一切报刊相形见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解放区则有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这是国民党及外国侵略者的封锁造成的），它却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国解放，最终打破了桎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种种障碍，使它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时期。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即使有了今日这样空前规模的发展，想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景，也不能妄自尊大，还应看到不足的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拿别人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缺，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二是为我国的中共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我们选编的这些著作，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每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或详或略地记述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派

势力的动态，涉及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国民党政府是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反动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一方面，它一贯地压制言论自由，实行原稿审查酷政，不许报刊反映事实的真相，他们象怕揭露自己身上的脓疮一样，害怕被人揭露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反动措施以及人民极端痛苦的生活。

另一方面，它只知穷兵黩武，不思进行建设，而在有关统计、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建树，几等于零。这个政府囿于短视的眼光和狭隘的阶级私利，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仍继续执行压制群众、限制言论，特别限制报刊报道共产党、解放区、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战业绩。而在各解放区内，虽有民主自由的环境，人民的新闻事业有了广阔发展余地，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人们的奔忙，日寇、汪精卫、蒋介石三方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异常严重的物质困难，当时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也难系统地整理、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一个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其最大的困难和苦恼，就是缺乏系统地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或社会调查统计材料。现在选编出版的这些著作中的资料，尽管是一些片断，在内容上比较零碎，或者就其准确性上说来也不尽确切。但是，根据我们读后的印象，毕竟大多数是比较翔实可靠的。当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述，往往表现很大的差异，确属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我们认真查对其他有关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是能够识别有关资料的真伪的。

基于以上考虑，这套丛书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每本书的内容，首先衡量有无研究、参考的价值。如果在资料价值方面不足，而有流畅的文笔，在文章风格方面又有可取之处，也酌情少量选入。

这套丛书定名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编选工作根据有关著作搜集情况而定。但在装帧、封面以及印制规格上力求统一。根据现在已汇集的著作，初步计划出版十本，准备一、两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大部分是过去出版过的中译本。这次重新出版的时候，只要原来译文通顺，忠于原著，只在文字上作些整理（主要是改正错字,个别词句上的文字修饰,尽可能地统一译名，但若寻找不到原著而有译名与别处不一致的地方，暂时只好保持原貌。如果发现原来译本毛病较多，则拟请有关同志对照原著加以校订、修改或者重译。还有一些内容充实，在过去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尚未译成中文的，拟约请人翻译。如果能够找到有关资料,对每本书的原著者生平(或其有关著作当时发生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作一简短的介绍。

目　录

一、迁入华盛顿……………………………………（1）
二、战争中前往中国………………………………（17）
三、在重庆安顿下来………………………………（37）
四、玛丽·梅乐士与战略服务局…………………（55）
五、学术中心与美国的利益………………………（65）
六、1943年——蒋介石开始失去民心……………（88）
七、发现了左派……………………………………（118）
八、回华盛顿战时情报局工作……………………（146）
九、战后中国………………………………………（160）

跋…………………………………………穆欣（181）

一、迁入华盛顿

珍珠港事件前四个月，我被美国政府征召参加为战争服务的学术机构。此后五年我暂时离开哈佛。首先在华盛顿度过一年（1941年8月——1942年8月），然后，在中国度过一年零三个月（1942年9月——1943年12月），在华盛顿住了一年零八个月（1944年1月——1945年8月），最后又在中国度过九个月（1945年9月——1946年7月）。我34岁到39岁时的这段风险经历把我带入了世界性事务中去，并无疑地改变了我。正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战争年代的经历使我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思想与如何采取行动。这是由于战争提出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具有创造性的行动。

1941年夏，比尔·杜诺万上校作为新成立的情报协调局长，正致力于建立全球范围的情报和特工组织。情报协调局下属的研究分析处是用以支持其它部门的一个独立组织。它的指导思想是：对各种事实进行分析，才能弄清情况；这对将采取的各种行动是否正确，关系重大。研究分析处的人员主要来自各大学。对他们的要求是：要象他们以往在学术界那

样，以严格的学者态度研究问题的现状及将来。

威廉斯学院院长詹姆士·芬尼·巴克斯特三世被聘为研究分析处主任。巴克斯特约请兰格参加，兰格又推荐麦凯，麦凯又推荐了我。于是，我们四人于1941年8月离开历史系前往华盛顿。8月13日早晨9时15分，在宾州大街与宪法大街路口的空荡荡的鼎盛大厦中，巴克斯特、兰格、麦凯以及兰格的得意门生，俄国问题专家菲利普·莫斯利举行首次会议，商讨研究分析处如何建立。为使学者的工作能在军事问题上发生作用，他们需要陆海军人员与情报协调局人员合作。当时，国会图书馆新楼正好落成，情报协调局研究人员就在国会图书馆新楼中着手工作，但是，国会图书馆各研究组的研究报告都直接提供情报协调局总部（它坐落在华盛顿市区的另一端25号街与西北E街路口）。SI（秘密情报部）和SO（特工部）也坐落在那里。

巴克斯特和兰格从全国学术界物色各种专家。他们招聘到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多年担任密歇根大学政治系主任的约瑟夫·拉尔斯顿·海顿教授。他是一位远东问题专家，曾在菲律宾大学任教，并于1933—1935年担任菲律宾副总督。1941年他的大作《菲律宾：国家发展的研究》刚问世。与此同时，唐·麦凯负责把国务院每天收到的无数电报摘要提供给研究分析处，以便研究分析处能够分享各种情报——正如神怪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缝制没有生命的人像，需要通过电流以使人像得到生命。

当时我还很年轻，只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大学不过是个讲

师，但是，我主张使用中国和日本的材料来研究中国和日本，并成为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叫我去啃的第一块骨头是海军方面提供的日本造船与铝、钢和飞机制造的情报。这是我在前一天访问海军情报局得知的一份重要情报，杜诺万上校要求对它作出鉴定。于是我花费了一个下午。这份情报是由伪装成渔民、香客的间谍进行观测而拼凑成的，此外还有不知来源的统计和有关新机场和工厂的各种名单（后来获悉它是英国方面的情报）。情报中提到日本工程师正在"勘测由下关到朝鲜釜山之间的海底隧道，那不过是横跨对马海峡，相距122英里。"

我认为这份报告不准确，从日本报刊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巴格斯特和我向杜诺万上校提出我们的看法。杜诺万给我的印象是"平稳而优柔寡断，办事举棋不定"。他的确办事举棋不定，但另一方面，那正表现出他力求使工作具有创造性。至于优柔寡断嘛，他决不是那种人。

此后不久，我就同时要着手两三方面的工作——帮助国会图书馆建立远东组，其中包括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帮助杜诺万上校在政府各机构中间证明：新建的情报协调局网罗有专门知识的学者，是十分有价值的；并且要结识在华盛顿的所有"中国通"们。当时，每一个政府机构都骤然间感到需要谙悉中国情况的人员。我们在北京或中国各地四年期间结识的那批朋友，很快就象菜肴上的辣油那样浇遍全城，而且每周都有更多的老中国通到来。

我们夫妇在我的同学比尔·杨曼夫妇家中下榻历时几周。杨曼的夫人艾尔西·珀金斯曾一度在我们北京的家中借住，

他们夫妇最初相识也是在我们家中。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比尔是联邦能源委员会的首席顾问。这时，他与汤姆·考克林合伙经营法律事务所。他们参与宋子文建立的“中国防务供应公司”。艾尔西的先辈曾经从事美国早年对华贸易，现在，她的丈夫又从事一种新型的对华贸易。这个公司一直继续到战争结束以后。最后，宋子文聘请比尔担任他的房地产经营代理人。

威尔玛只用了几天功夫就找到一处舒适方便的房屋，它坐落在乔治城区34号大街（西南段）1306号，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厨房、两间卧室和一个小花园。我们立即签订了合同，准备从9月1日迁进新居。

8月14日，我去看望劳合林·柯里。1928年，劳合林还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讲师、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经过拉福莱夫人——伊萨贝拉的介绍，在麦迪逊与拉福莱的连襟，那与柯里夫妇会过面。柯里一度在联邦储备局工作，后来成为罗斯福的六名行政助理之一，1941年初被罗斯福派往中国去见蒋介石，并被任命主持租借法案和对中国的活动。

柯里博士是白宫工作班子的一员，他的办公室在国务院大厦（现在的行政办公大厦）二楼，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办公室下面，房间很大，有两个秘书。当时，他正为滇缅公路的种种问题大伤脑筋，为此把纽约的一些卡车运输公司经理们派去组织运输工作。这条公路是中国取得供应的主要血管，然而它却腐败透顶。那些司机，连为机件加油都不会，却知道怎样贩运私货。派去的纽约佬通常不是好对付的，但是，在一个串通抵制他们的环境里，却是束手无策。

在劳合①那里，我发现他实际是克莱尔·陈纳德上校的后台。当时，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空军团（一支非官方的雇佣空军）配备有一百架P—40型歼击机，正在缅甸秘密训练之中。后来，情报协调局研究"对华援助"这个题目时，我为他们安排利用劳合的档案，以说明对华援助的初期情况。

劳合的经费预算中没有款项聘请助手。经过几个月周折，最后到12月里，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我以情报协调局委派名义，用部分时间协助劳合工作。这样做一举四得，对劳合，对我，对情报协调局对战争都有好处。因此，圣诞节时，我就在劳合办公室旁边224号房间开始办公，电话号码是"白宫80号"，还能有比这更体面的身份象征吗？

就这样，我在权力大厦的走廊里逐步上升，其实当时我的工作很清闲，无非是到处串门，与人谈话，从中收集情报，解决一些次要问题。这项工作很有趣，使我在战争即将爆发的1941年秋季，对那些正在制订对华政策的戏剧性人物，有一个观察的机会。

继柯里之后的演员表上，领衔的是斯坦利·库·荷恩贝克。他和我，从外表看来，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来自中西部，在威斯康辛大学时都参加同一个联谊会，还属于其中同一个支部，我们又都接受过罗氏奖学金，在哈佛又是历史系前后同事，他讲授"1793年以后的远东"一课，以后由我接任。有时，我甚至担心，我们两人连脾性都一样。

---

① 劳合林的名字缩称。——译注

8月15日，我打电话给荷恩贝克博士，告诉他，我到华盛顿工作了。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粗暴生硬，问我，杜诺万打算干什么？他对自己的任务是怎样理解的？他为什么把这么多人搞到华盛顿来？我表示不知道，这也是事实。我又说，我以为他是一切都了若指掌的。当然，我只是作为老相识，和他在电话里作非正式谈话，我以为这并无不妥之处，因为我还没有被派到哪个部门、哪一个人手下；我希望得到他的意见。

几天以后，威尔玛和我去看望他，只是喝了点应酬酒，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显然，他认为对华政策问题，只要有他就够了，至于柯里，无非是办点具体事情。

斯坦利的书房，头顶上有各种绳竿，写字台是可以开合的新鲜玩意儿。这一切都被组合在一起，适宜于动作缓慢的人，土里土气，正象他本人一样。

如果从某个人的事业可以概括美国远东政策的弱点，则应属斯坦利·荷恩贝克了。他在中国的生涯是从1909—1913年（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官办学院里任教四年，这正是他获得罗氏奖金（1904—1907年）之后，那边对他在语言上并没有要求。他的学术专业是政治学。当时政治学刚从历史学分离出来，但仍与法学有密切关系。1911年他在威斯康辛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是保罗·芮恩施教授，芮恩施后来成为威尔逊派驻中国的公使。荷恩贝克于1916年发表《现代远东政治》一书．1914—1917年间，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位陆军上尉，由于在1919年凡尔赛和谈中充当了远东问题专家而一跃成名，接着又在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以后他在政府中担任专家。1924年至1928年，转入哈佛大学讲授远东历史。1927年发表了《今日中国》一书。1928年又回华盛顿担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擅长于把法律义务和道德原则搅拌在一起，这完全适合美国一贯夸耀的开放政策。这种陈腐而软弱的外交理论，在当时却很合荷恩贝克的口味。这样可以既站在美国立场维护法律形式，又站在中国立场玩弄正义的词句，两方面他都可算作相应的美国文化的代表人物。

他在国务院生涯中最奇特的方面是：他并不是职业外交官，只是个民间专家，而1937年以后却在国务院远东司主管中国和日本科，凡涉及这两国的事务，均需由他过目，并得到他的批准。这种不寻常的安排表明，远东和其他地区不同，这种工作对门外汉来说简直捉摸不透，需要由“懂得”东方的专家来掌握。

这幅图画，问题不少。然而，荷恩贝克博士精力充沛，十分自信，也很精明。他也和其他的中国通一样——自封或被认为具有凡人所无的奥秘知识。他到过中国，也讲授过中国现代史，但是这并未曾使他认识到自己(以及每一个人)多么缺少知识，相反，这一点十分有限的知识却给他带来了成功的经验，并给予他十足的自信心。他只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到过中国，而中国发生过好几次革命，他都不在场，因此，那些革命都在他的视野之外，但这对他毫无妨碍。他的主要特

性就是一种惊人的自以为是。在我们早期的接触中，有一次他曾向我解释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象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轨道早已铺好，目标十分明确，日本人应该懂得这一切，这就全看他们了。"这样，两辆火车要避免迎头相撞，就要看扳道叉的功夫如何了。

1941年8月，曾经在日本和中国服务的外交官们起来反对国务院远东司对日本采取的明显的绥靖政策。当时，国务院远东司的司长是麦克斯·汉密尔顿，他是个毫无见识的人，只知道对他的上司荷恩贝克亦步亦趋。有几名外交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象副国务卿苏姆纳·威尔斯一样，要求对政策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但远东司内的这次分歧被敷衍过去。1944年，远东司的官员们又一次对荷恩贝克造反，指责他对赫尔国务卿封锁重要情报。不久以后，荷恩贝尔被派到荷兰去担任大使，他的官运就此完结。

斯坦利·荷恩贝克认为：决策者不需要对实地情况有直接接触，因为一切情报都会送到国务院，经过他的办公桌，唯有这时，一个人才能看到全貌。这是他把自己的弱点说成自己的优点的办法。荷恩贝克的聪明年轻的助手阿尔格·希斯，为这种有害的思想当吹鼓手。我以前不认识他，他远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和我熟悉的人，都认为他对荷恩贝克拘守条文的保守思想，太驯顺了。他对远东一无所知，唯一拿手的是程序和礼宾事宜。

在国务院管界内，最优秀的人物首推约翰·佩顿·戴维斯。他是在四川出生，离开北京后，曾到沈阳旅行一圈，这

时已回到国务院。他在接电话时常常以清脆的声音用日语说：“莫希，莫希”（喂,喂），使打电话的人以为东京接管了这家电话，戴维斯却以此为乐。

在五角大楼,迪安·腊斯克当时已经是陆军上尉,正负责军事情报中有关大英帝国部分。他的前任是一位和蔼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连一个保管剪报档案的助手都没有。我们对在印度和缅甸展开军事行动并未作好准备。情报协调局在这方面的贡献之一，是搜集地图和由专家计算出来的印度铁路运输能力。

当时,在五角大楼担任中国谍报工作的G—2官员是一位漂亮动人的少校弗兰克·罗伯兹。他曾在北京担任语言教官，当时我们参加同一个学习小组。1937年,他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舰潘奈号上任指挥官，这艘炮舰被日本飞机炸沉，差一点把这位指挥官炸死，罗伯兹从此成为英雄。我作为情报协调官员，向他提供国民党政府基本情况的档案，这是1941年2月柯里博士在重庆所得到的。这些表格看上去洋洋洒洒,却并不准确;但这是我们仅有的这方面资料。我把这份资料复制提供给G—2,并且把弗兰克和劳合约到一起吃午饭。他们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作非正式会面,要比经过官方的途径容易得多。

8月17日星期日，我们到胡适大使那座被草地树丛包围着的堂皇住所，和他共进午餐。他曾经在二十年之前领导过五四运动中的一翼。他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

8月18日，我又遇到另一位北京的老朋友和学中文的同

学海顿·博特纳少校，他正从事向中国提供军需的工作。他要应付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们只要最新的东西——例如，桥梁无法通行的重型坦克——而他则强调有爆破力的武器，这更为有用，也容易得到。海顿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按照他所受的训练，由美国帮助中国增强军事力量。

次日，我拜访了宋子文。杜诺万曾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与宋子文和宋的顾问，曾在国联担任卫生专家派驻南京的路德维希·拉奇曼博士会见。

> T·V·(子文的英文缩写）和我一起回忆威斯康辛大学足球队的中卫道尔·哈门，带球多么快，在对方后卫之间穿插自如，直到把球带到底线。R（拉奇曼）身材矮小，目光锐利、鹰钩鼻子，象白鼬似的到处窥探。他们两人都象要把我刺透似地盯着我，我也同样使劲盯着看他们。
>
> 杜诺万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他的远东问题专家。后来，他把宋子文的信拿给我看，其中强烈要求美国援助飞机，以便抵御日本对重庆的空袭。……认为我们只顾援助俄国，而对中国仅说一些空话。

几个月内，美国志愿空军团，也就是飞虎队，便将能保护重庆。但是，在1941年夏末，宋还在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极力争取空防力量。杜诺万是他活动的渠道之一。但是，当时杜诺万还忙于在华盛顿这座发电厂里，把他自己那部发电机安装起来。由于我当时闯了进去，我被临时说成是他的“专家”。其实，我于重庆的空防，没有任何用处。杜诺万在这

一点上的权力，也并不比我大。事后，我在日记中写着：“宋的呼吁信，除我之外，不知还有谁读它。”（当然，我说错了。）①

当时，我就是这样，与许多人会晤，却没有做多少事情。九月里，我聘请波莫那学院的伯顿·法斯到我们的研究分析处主持日本方面工作。约瑟·海顿则充当高级分析家班子中的一员。伯顿和我都没有指导这种研究的经验，因此，我们接受了海顿的建议，聘请密歇根大学的查尔士·雷默教授来担任我们的远东组长。雷默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他的关于外国在华投资的著作，成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他又带来了与他长期合作的一位研究助理。于是，我们就在国会图书馆的新建附属大楼中，把各组工作建立起来，用雷默的话说，“开步走”了。当时伯顿和我都还资历很浅，雷默作为领导人，理解力又太迟钝，但为人心地很好。当时，我们最操心的是要和华盛顿的各政府机关竞争，物色干才。

我第一次参加“情报即权力”的游戏是：杜诺万给我们一个紧急通知，要准备一项关于中国铀矿资源的备忘录。幸而我们手边有新版《中国年鉴》，从书末索引中查到“铀”字，再翻阅正文，提到湖南、江西有铀矿。我们的绘图员赶制一幅地图，在湖南、江西标上三个“×”形记号。我就拿着这份临时炮制的盘菜，匆忙送给杜诺万。当时他正与汤玛斯·K·芬莱特在开会。这可以算是我对“曼哈顿计划”②的贡献。

① R·E·谢伍德的《罗斯福与霍浦金斯》一书第406——408页提到宋的这个呼吁。——原注

② 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制造原子弹计划的代称。——原注

在国会图书馆附属大厦中，一时还没有很多工作，于是，我征得雷默同意，设法与其它政府部门建立联系。本来，情报协调局的任务就是进行协调。我把分布在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一些新建立，还不为人所知的机构如经济作战局等处的过去在北京结识的朋友以及别人组织起来，每星期三利用中午聚餐，举行非正式聚会。这就把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都联络组织起来了。

在华盛顿的一件快事是我得以与毛蒂默·格雷夫斯和他的夫人琴恩熟悉起来。他以一贯的远见，早已编制了熟悉东亚语言的美国人名录，以备战争来临的不时之需。他又雇威尔玛编制一本关心中国的美国各团体名录（1941年出版）。

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曾有一度不录用妇女，这是因为它的会长华尔多·莱兰鉴于他的前任曾经雇用一位女秘书，这位女秘书把一切档案都记在自己头脑里，以致离开了她就象计算机停了电便无法运算一样。威尔玛到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任职，只能在人们看不见的一间后屋里工作。

毛蒂默喜欢凡事自己动手，对秘书协助工作没有多大兴趣，是个孤独的领导人。他以丰富的想象力推动美国人学习各种冷僻的语言，特别提倡对俄国和中国的研究；靠他的坚韧性和独创性，以微薄的力量，支持一些重点大学聘用年轻的讲师，出版译著丛书和丛刊，举办暑假学校，帮助图书馆和培训人才等，前面提到过恒安石①从事的编纂中国人名大辞典

① Arthur Hummel，现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父亲，原为美国在华传教士，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创建中文藏书部，以此著名。——译注

的工作，不过是许多项成就之一。

毛蒂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飞行员，后来成为一位历史学者和人文学者。他有许多癖好，其中之一是精细木工。他预见到在一个交往日增的世界中，对各种语言和后来所称的地区研究专家，将有越来越大的需要。最初，他曾被聘担任我们研究分析主任。但是，他不愿到政府部门工作，认为那将扼杀他的主动性和手艺人一般的精细工作精神。

1941年12月8日是星期一。那一天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电话声不断，都是要物色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专家，最好是男性，年龄在二十一岁到三十岁之间，对两国有实地工作经验，能操流利的当地语言。如果有这样的干才，早已被海军方面捷足先登抢去了。海军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遍访全国，罗致研究这两个国家的专门人才。

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当时只致力于对拉丁美洲开展睦邻关系，所以直到1941年后期，作为国务院工作建设的一部分，才被授权成立中国处。主持人是一个有经验的中国问题官员威里斯·R·佩克。威尔玛是他手下第一个雇员。佩克着手教导威尔玛如何做到官僚机构所要求的精确程度和办事手续上面面俱到，这对一个刚征募来的官员是重要的一课。威尔玛此后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了五年，最后成为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文化官员。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下午，当听到电台广播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时，我如同其他人一样，急忙赶到办公室坚守岗位。可是，在空荡荡、鸦雀无声的国会图书馆附属大厦里，

我找不到收音机。于是，只好向家里打电话，从威尔玛那里，了解事态进展情况，当时，马歇尔将军还在岩石小径公园骑马。不过，他到了办公室里，至少可以收听到消息。

战争好象证明了所有我们的备战措施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从哈佛来到华盛顿，从一个个人独立工作的环境转向集体工作环境时，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是从一项事业转而从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这种感觉并未由于战争爆发而消失。过去的学术生涯使我感到每天都在完成一些事，例如，有目的地阅读了一本书，一堂堂扎扎实实的讲课象是为大厦增添一块砖石，与学生的一席谈话，帮助了他的成长等，我可以从中看到成果。可是，华盛顿的官僚生活使一个人被无数的电话、会议、公文、同事会见共餐、社交活动等所包围。而且这种经常性的来往，充满了竞争和低劣的政治手腕。一项政策倡议是否得到重视，往往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而要看兜售的本领如何；纵或所处理的事情关系重大，但很难说个人取得什么成就。

虽然官员生活对我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但是作为情报协调局和柯里的联络员，我认为自己做得相当出色和成功。我的任务是了解在各种政府机构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每个人情况。同时，我协助散发重要消息。情报协调局设有很强的制图部门和精干的制图员。我们出版公路、火车、河运交通的地形图，这些可以收到立杆见影的实际效益。我们还出版名为《中国战况》的周刊。我还从事美国援华历史的研究。最后，我利用柯里的大办公室作为会议室，不定期地把

一些主要机构中的中国专家召集在一起，交流工作情况并互相启发。

情报协调局的研究分析处要为陆军和海军军官手册编写其中经济、社会和政治部分。这些工作要根据G—2和海军情报局的资料，加以扩充，把数据、地图、概况汇成简编，以供指挥官随时应用。这些工作策励着新机构的工作人员。从同一批专家那里，我可以找到有用的材料，为劳合草拟备忘录，送给罗斯福。有一时期，我成为他的印度交通专家。我所依赖的是打电话问不列颠帝国组的丹·桑纳。当劳合问我印度有多少卡车时，我在五分钟后回答了他，使他大为惊讶。

我的来往穿梭，不过是在一些人之间做穿针引线的介绍人。我没有强烈的政策信念，因为我对当代中国没有任何直接了解。劳合林·柯里被罗斯福派遣，再度去重庆（1942年7月21日—8月7日）回来后，要求全力支持蒋介石，认为对蒋介石不需要采取什么牵制手段，可以信赖他“会顺着我们的心意，执行一项强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制度的强大国家①”。显然，劳合对中国也没有第一手的了解。

到1942年6月，研究分析处的远东组已配备了二十名官员和七名兼职的咨询人员。其中有八个人从事对华工作。他们平均有七年在中国的经验。远东组前后提交了七十五篇报

---

① 见米歇尔·夏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1979年出版）一书第235页。——原注

告或研究论文。然而很少人涉及到政策。我们只负责汇集事实，与政策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至于政策方针需由柯里那样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去考虑。

1942年1月，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向缅甸挺进。派史迪威到中国执行任务已在进行之中。这时，华盛顿的每个机构都感到需要在重庆设置派出机构。

二、战争中前往中国

战争的风云变幻，会给顽强的事业家带来千变万化的机会。为应付前所未有的局面，必须想出各种新办法，其中，有些是办到了，有些则没有。当时没有人对我的工作职责给过什么明确指示，全靠我自己去做。我给自己规定的角色是根据事物逻辑综合的结果，形成一条首尾一致的行动路线，我便沿着这条路线干下去。

工作开展使研究分析处远东组需要在中国派驻代表取得研究资料。我和法斯的第一个建议是采取大卫·奈尔逊·罗威分析中国报纸的办法。当时，卡尔·莱墨还没有担任我们的领导。大卫在哈罗尔德·拉斯威尔以及其他政治学家的熏陶下，对计量分析简直是上了瘾（计算各种政治字眼出现的次数）。他把信口开河的政治讨论，进行计量分析，变成以数字为基础的科学。他已从基金会方面取得了资助，前往重庆从事这项研究。我们委派他代表研究分析处在那里工作。他于1941年11月27日抵重庆。

情报协调局在中国开展工作不是一个小问题。操华语的美国人征募中国职员时，需考虑到他们可能是双重身份，还

要向中国老板汇报情况。

任何秘密，就象垃圾箱里的空罐头招来苍蝇一样，并且不时制造各种夸大性谣言、错误观念、恐惧、虚幻的希望和妒忌等。当时已五十四岁的约·海顿应算是有经验，有头脑的高级政治家，他推荐在中国盐务局工作的艾逊·麦克多威尔·盖尔博士充任情报协调局在中国的代表。

我曾在上海见过盖尔博士，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中国通，略带圆脸，留一小撮英国式胡须；曾在荷兰莱顿大学获中国学博士①，是美国的一位学者官员。

他从一个受雇于中国的雇员转而领导美国的一个办事机构是不容易的。作为第一任情报协调局驻重庆代表，他显然干得不很出色。他的中文名片上印有"美国情报局"代理人的字眼，仅这个头衔就使他在中国不得人心。

这方面的事情如此不顺手，大大出我意外。同时，大卫·罗威也遇到了困难。他不喜欢大使馆成员和许多中国人。他感到有人盯梢并阴谋陷害他，使他的人身安全都有危险。人们认为他的想法非常可笑，我们怕他的神经出了什么毛病，让他回美国治疗。实际证明并无必要。有人建议我去替换他的职务。6月2日，杜诺万任命我担任情报协调局在华首席代表，主管一切事务。他给我的工作任务指示是把我

---

① 盖尔博士的论文题目是《盐铁论：论古代中国关于国家控制工商业的一次辩论》，于1931年出版。《盐铁论》第1——19章记载了公元前81年的一次辩论。1934年盖尔博士翻译了《盐铁论》第20——28章，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上海出版。——原注

打入昏乱地狱的一个杰作：“（1）你是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2）你被授权代表局长处理情报协调局整个小组事务，（3）你被授权行使对重庆情报协调局人员行政领导，凡不属于其他分支机构所负特殊任务范围，关系到情报协调局在重庆人员整体利益的事项，都由你领导。”

它意味着我要对秘密活动负责，却不能管理秘密活动；又是高官，又是替罪羊。这个命运是我无论如何，不惜代价，也要摆脱掉的。幸好，虽然向我下达了正式签字的指示，这个安排很快流产了。1942年6月13日情报协调局与海外情报署分开并改组了。海外情报署改为战时情报局，留下的研究分析处、秘密情报处和特工处合并成为战略服务局（OSS）。我立即着手为我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制定了范围较小但内容明确的任务。

与此同时，盖尔博士被召回，约·海顿由于他的倒霉主意失误，被遣往重庆收拾残局，将功赎罪。1942年8至9月我们一起进行了一次友好的旅行，使我们能对战时美国的技术扩张有个概观，它照例超过我们对世界的了解。

在1942年时，泛美航空公司仍对美国政府提供空航方便，后来由空运指挥部扩大业务所取代。当时，泛美公司的飞机仍是DC—3型号，双引擎，固定尾轮，当飞机着陆时，客机尾部也要着陆。至于机首着陆轮喷气式引擎和空调设备都是后来的事情。旅客搭上DC—3，在热带阳光下飞行，就象坐在滚烫的沥青上似的，身体浸透了汗水，不时又可以使人冷到冰点以下。舱内气压不能调节，因此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时，大家都会感到呼吸困难。八十年代的旅客享受惯

了飞机上的优等服务，其舒适程度远超过日常生活，听到这些会觉得简直是活受罪。而在1942年，泛美航空公司所做的，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使我们都感到象探险家似的。

8月21日，我和约·海顿乘飞机从迈阿密取道南美洲和非洲前往中国，绕道情况就象1842年时从撒拉姆或巴尔蒂摩水路航行，取道南大西洋和印度洋前往远东。我们先飞到波多黎各加油，然后到西班牙港（特立尼达）过夜，第二天越过奥林诺可和亚马逊河的几处宽阔河流，到葡萄牙殖民古城贝莱姆，它位于赤道以南三度。这里的渔船，青色房屋，公园似的广场，刷上白色的树干和人行道的咖啡座都使人想起十六世纪葡萄牙帝国的另一端，澳门的景象。

> 贝莱姆有如上海，坐落在大河的入海口，所不同的是两岸没有居住着千百万农民。我们飞越过几幢在亚马逊河支流两岸破陋不堪的小木头房子，它坐落在沼泽丛林边上清理出来的地区。我想一定有一个通向与它一般大的城市的河岸内地，但是，弄不清楚它在哪里。
>
> 这里每一分钟都充斥着抵达和离境的人们。美国人正致力于扩张，正如当年葡萄牙建造这个地方和澳门以及旧日马六甲海峡……。美国人为运送新型武器，遍地铺建巨大的钢筋水泥跑道，犹如当年葡萄牙为炮舰、船只建筑的码头和炮台一样。

从巴西海岸的累西腓，我们乘四引擎飞机用整个晚上越过南大西洋。傍晚，在广阔无际的海洋上看到远处一个小斑

点，逐渐靠近，原来是阿森松岛。孤独的高峰上刻画出一条灰色狭长的跑道，它还在平整之中，使我想起了牙医师在修补我的臼齿前锉磨的情况。

下一站是阿克拉（当时是黄金海岸，现称加纳），几乎是未开发前的夏威夷岛风光，有一个浅水海滩，对于滑水板是很适宜的。在住宿处，你不必问黄褐色被单几时曾换洗过，谁顾得上它呀？泛美公司航线从阿克拉东行到另一港口拉各斯，然后向东北起飞，穿过尼日利亚到铁路的终端卡诺。

接着是在迈杜古里的野营，这可算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骄傲。我们从机场驱车十五英里，也不知是从哪里到了哪里，最后驰入一个场地，有几幢新的房屋。我们进入其中一幢，享受到从冰箱里拿出来新纽约城制造的莱茵金牌啤酒，还有可口可乐。然后，我们在一幢有晒台的木屋里洗淋浴，木屋里面有几个大的盥洗盆、镜子、钢椅、钢丝床和冲水恭桶。我们在一间洁净无瑕的餐厅里用餐，有穿白制服的厨师为我们烹调西红柿汤，接着是炸鸡、土豆烧小牛肉、涂上花生酱的玉米面包、果酱和薄荷调味汁。每个走过这条航线的人都不禁要谈起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能设想，究竟通过什么鬼办法，把这些东西运到这里。这几乎象在美国一样，然而从最近的供应站到这里，要跨越七百英里。晚间，一轮明月升起，真正是非洲的大月亮，我想听听狮子的吼声，但是，整个晚上我所听到的是靠近卧床的

露台上，一个七尺高的电冰箱的声音和厕所冲水的声音。在这条航线上旅行，而想使非洲和泛美航空公司隔开是很难做到的。

在埃及和印度这些过去大英帝国的土地上，我碰上了们英美联盟的问题，这问题以后在中国也遇到——一种兄弟之间的竞争。这场竞争中，不列颠的骄傲、经验和领导权虽已成为强弩之末，却引起美国人的条件反射，怀疑其中有帝国主义的、反对民众的谋划。美国在谴责美帝国的残余。同时又要利用它们，而很少意识到自己继承了它的衣钵。我们惯于沿袭不列颠的做法而理论上却加以抨击。

8月28日，我们从喀土穆沿尼罗河而下，抵达开罗，在那里停留六小时，下榻于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纪念碑式建筑牧人大旅馆（现在已不复存在）。旅馆的建筑高大，有黄色大理石的圆柱，厕所的天花板有二十英尺高，浴盆之大足够把人淹死，却没有淋浴设备。有制服上钉着铜纽扣的服务员，还有女侍、土著仆人；华贵的餐厅里，墙上是红黄两色的S形波纹，荷叶周围缀以数不清的花结；门槛上刻着凹进去的花纹，还有精致的铁花；吊灯错落，象荡漾在水上的灯火一样；喷泉四周攀满蔓萝；还有其它各种装饰，都是仿照英国基布尔学院等著名建筑的样式而来。人们几乎以为在那西班牙式拱门、罗马式穹顶、英国制造的赭色壁龛里，穿着紧身古装的维多利亚女皇就坐在那里呢！

我们在花园的草地上用餐，同时看英国军官们与他们的舞伴温柔地翩翩曼舞。他们仿佛并不介意，也有理由不必介意，德国人就在离此三小时汽车行程的沙漠里。6月30日，一名当地情报人员报告说，前线有一个十英里长的缺口，经过三十六小时才堵接起来。德国人本可以从那个缺口冲过来，可是，他们太疲乏了；随后，澳大利亚部队从叙利亚赶到了。

最后由一架英国水上飞机载送我们从开罗起飞，跨越被羊群啃得寸草不存的圣地巴勒斯坦，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口的巴士拉，由那里前往喀拉奇。最后，9月6日抵达新德里皇家旅馆。在旅馆里，我找到白修德，他戴着一顶蘑菇般的大遮阳帽，带我去参加一个酒会，在那里见到了埃德加·斯诺，《先驱论坛报》的阿奇·斯蒂尔，《纽约时报》的赫坦特·马修斯。他们都穿着战地记者的黄卡叽布衬衫短裤，佩戴绿色肩章，看上去又神气又漂亮。斯诺正准备经波斯去俄国；白修德则随着一两位将军飞来飞去。

我从未到过印度，从表面上也可看出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惊人的差异。当时印度还未解放，在战争时期喀拉奇和新德里的人们，看去就象：

一些畏怯、抖缩的生物，十分纤弱，以致不可能象中国人那样打仗。他们不会和人为小费争吵，接过小费时都立正敬礼，至少在军事机关周围的人们是如此，同时，他们也从不对人露出一丝笑容。和中国苦力打交道时……如果你给得多些，他们还会

要得更多；如果给得少，他们就和你吵；如果给得不多不少，他们也还要嘟囔几句。……印度民众穷到极点，比中国还糟，……在现代文明的外观下，穷人的衣衫那样褴褛，……而在中国，人人都一样穷。

这种肤浅的走马观花式印象（后来哈罗德·艾萨克斯在《脑海中擦过的痕迹》一书中也曾描述过）对二次大战期间到过印度和中国的美国人来说，是十分普遍的。从某一方面说，印度人的奴态与英国统治阶级的傲慢正好相配，而中国人和英国人在这时已是平等地打交道——至少能互相作出反应。

在德里，我们的英国伙伴们……发痒、发烧、生疮、害登革热、疟疾、灼人的高热，等等，等等。夏天气候干旱，温度达到华氏一百二十度，还不断刮风，使人筋疲力竭；然后雨季来临，一切都匍伏在雨中；现在则是准备迎接冬日晴朗的阳光。你可由此体会一点殖民地的生活，表面看来很阔绰，仆役成群，帝国派头，而同时还要经受痢疾和各种炎症。

我们经过两星期，才开始对印度有一点粗浅的印象，9月13日，我从新德里乘火车前往阿拉哈巴德的美军基地，沿途地势平坦，

与衣阿华州不无相似之处，只是在田间看不到任何几何图形。耕地的形状各式各样，庄稼——譬如说，玉蜀黍——是黑糊糊的一团。印度人在这块土地上居住太久了，他们的精力被耗尽了，人人都象是需要一个假期。最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虽然都

穷困，都穿长袖衫，但人们之间依然各有不同。

从炎热潮湿的印度，飞越缅甸北部喜马拉雅山“驼峰”，忽然就到达干燥的云南高原，印度与中国的鲜明对比，更显突出。

从印度中部，我们飞到阿萨姆，然后进入中国。……在朝东飞行时，喜马拉雅山横亘在北边，黑色的群山后面是白皑皑的雪峰，河流从山地跨越平原；最后飞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空，它与恒河同样成为印度大地的标志，两旁是沙岸河，水东流，飞机也沿河向东飞行，然后降落在茶园之中。阿萨姆土著在烈日下劳动，每人撑一把大黑伞。这里又是一座美国兵营，士兵们都来自中西部。在这个地图上找不着的地方，他们每周看两次电影，在军中商店可以买可口可乐之类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9月20日)，我们继续东飞，“越过驼峰”飞机越升越高，高过欧洲最高的山峰，有些山峰被植物覆盖而呈绿色，有些河谷却荒芜着。来到缅甸北部上空，红壤的台地与绿色的峰顶、多彩的云层点缀在一起，景色真是壮观。我们都准备着日本人随时会出现。旅客们认为，日本零式飞机基地在我们南方不过一百英里，时刻伺机袭击，没有理由认定它们今天就不来。以前也听说过在云层中与日本飞机捉迷藏的惊险故事。然而，截击并不象人们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

我们来到滇缅公路上空。这是一条蜿蜒的红色公路，没有经过多久，它就沿着山坡伸向滇池，这是昆明的标记。滇池边有陡起的高峰，再过去就是西山了。从空中望去，昆明并不大，它在群山环抱的一片平原南端。整个平原到处有河流、村落，十分秀丽，也灌溉得很好。

我重返中国的第一个印象长期深入脑际。

(1) 我能和人们谈话，以前学过的语词，现在需要用的时候又记起来了，就仿佛我一直没离开中国似的；(2) 人们有生气，有笑容，与印度人懒洋洋，受压抑的神情显然不同；(3) 到处都看到妇女象男子一样工作，她们朝气蓬勃，与周围的人们享受同样的自由；(4) 中国人的方形脸庞比瘦削的印度人脸庞，看上去更强壮，肤色也更健康。

二十世纪初，昆明还不过是中国西南端一个沉睡着的省会。它首次遭受侵入是法国从印度支那的河内修筑通向昆明的铁路。1938年，华北三所大学内迁到昆明。1941年，为连接跨越"驼峰"的中印空运航线，美国空军第14大队（飞虎队）在昆明修建了巨大的空军基地。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和美国飞行员们的到达，使昆明骤然繁荣起来，向四面发展，城内显得拥挤不堪。

海顿博士和我为等候去重庆的飞机座位，不得不在昆明停留几天。我们到大学探访旧友，首先就去看望梅贻琦校长。他原是一位物理学家，这时是昆明西南联大（由天津南

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的临时校长。他比我记忆之中显得更加憔悴疲乏，但对人依然十分和蔼。

联大教授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吃住等基本需要，我的朋友们如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人教授陈福田都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一座老剧场的露台上，住在临时搭起的活动房屋中。美国领事馆和剧场这两座建筑都是自辛亥革命到北伐时期的云南大军阀唐继尧所修造的。当时，法国人修筑的滇越铁路是昆明（云南府）与外界的唯一交通命脉。剧场的露台建筑很单薄，但是好在不收租金。我们坐着谈话时，

> 硕大的老鼠在纸糊的顶棚上跑来跑去，几乎从窟窿里掉了下来。于是话题转到猫上，买一只猫要化费二百元美金。我被邀请再来昆明时，到露台上去一起度野营生活（后来，牛津大学的E·R·休斯教授也这样做过）。

教授们如此赤贫，使我为之震惊，我写道：

> 他们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长此下去，可以想象得到那种局势——令人沮丧失望的悲惨境遇，先是勇敢地面对，互相鼓舞，然后是思想和行动上都逐渐软弱下去。

事实上，他们又继续维持了三年，然后回到战后的北平，又去继续挣扎。

我还找到另一位北京时代的老朋友鲍勃·温特。他可算是I·A·理查兹推广的基本英语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当时五

十八岁。

他在躲空袭时，两次都被人把衣物盗窃一空。现在，他的院子里养着一对猴子，其中一只用链子拴着，见人就咬，陌生人闯进来决难逃过它，除非把它打死。鲍勃的院子里种满了花，书厨里装满了书，而且对当地民谣、街谈巷议他都如数家珍。这几位都是单身汉，只有陈福田是例外，他的妻子在檀香山，有家眷的人，生活就更困难。

我去找联大的图书馆长严文渊。他原来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副手。我上次在战前见到他时，他刚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有一个第一流的宏伟计划，搞来了国会图书馆的全套目录卡片。这一次见到他时，他住在一间小店上面的搁楼里，正躺在床上，饥病交加，为三个孩子没饭吃而发愁（战后，他到联合国去任职了）。

清华的政治学家张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家祠里，他就睡在供祖宗牌位的祠堂里，周围倒是个可爱的小花园，长满了树木。我们的老朋友，北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则住在五英里以外的乡村里，我们在北京时代最亲近的朋友梁思成夫妇原来也住在昆明，后来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四川。星期日，海顿博士借到一辆吉普车，张奚若担任我们的向导。

吉普车里坐了六个人，我担任司机。在城里杂乱无章的路上驾驶汽车，时而要敲车身的铁板，把

载着长杆的小车赶到路边去，经常是在手推独轮车和小贩们中间穿来穿去，车身在石路上颠簸得跳上跳下。警察总是挥手让汽车过去，汽车喇叭还要不时悲鸣几声。穿过城关，来到了乡下，在低湿地上用木排铺出一条路，在原野里弯来绕去，最后来到原野的边沿龙头村（这是当地人对“龙庄”的叫法）。我们把吉普车停在庙前树丛中，穿过小径来到钱端升家。他们的房子与梁家紧挨着，原来都是林徽因设计的。住在乡间的好处是不怕空袭。盖房子的这笔交易是不付地租，五年以后把房子交给地主。

我们把老秦与钱也请到吉普车上，驰回城里。车中坐了八个人，大家舒服地挤在一起，……七点到梅博士家会餐。梅博士的房子很宽敞，他把房子供给所有教授们使用，多数教授们都住在搁楼上，没法接待客人。据温特说，梅博士的薪金，每月不到六百元，可是一次会餐的费用决不少于一千元。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送给梅博士一小瓶治疟疾的阿塔别林药片，它大约可卖一千元。

通货膨胀带来了十分反常的现象。一包美国香烟卖十元；一支派克钢笔卖六千元；自来水笔、手表和照相机是投机市场上的热门货。人们手上有钱，却没东西可买。因此，向一位教授赠送一支钢笔，就等于送给他多于一年的薪金。昆明尤其是各种进口货高价出售的市场，因为有许多中国官员和美国官

员兼营商业从中牟利。

昆明大学教授们的处境令我十分震惊，我立即向华盛顿汇报。我写信给阿尔杰·希斯，也准备他把这封信给荷恩贝克和柯里看。这些信里的观点是我多次阐述过的，因此把它援引一下。

昆明，1942年9月23日

亲爱的阿尔杰：

抵达昆明已经五天，在等候飞机，同时看望北京时代的老朋友们。我要立即告诉你的初步印象是：（1）中国人远比印度人开明而且有干劲；（2）这里的英国人比美国人活跃得多（派驻人员比美国多一倍，出版刊物，设立阅览室，有藏书，已派来一位牛津大学教授，还将陆续派更多人来，等等）；（3）西南联大的原清华教授们，都是美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在中国学术界处于顶尖，而现在却在精神、肉体两方面都处于饥馑状态；（4）在我们上次谈话中，记得你曾提起，华盛顿能对中国局势作出比在现场更确切的判断，因为华盛顿得到的报告更全面，因此，有才能的人留在华盛顿更为有用。

我很抱歉，作为一个朋友，我愿把我的结论告诉你：这是外交史上最为有害的一种理论。想到这种有害理论竟在华盛顿有所表现，更加深了我日益增长的一个信念，现在是美国外交史上最令人感到可笑的时期之一，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为此嘲笑我们这

一代。你是否记得，1870年，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埃德蒙·哈蒙德宣称，他已在白厅① 研究欧洲局势三十年，欧洲外交局势从来没有象1870年那样安宁和平静。两星期后，普法战争就爆发了。从此以后，哈蒙德的话就经常被人引为笑柄。

我所怕的是，我们目前在亚洲的政策，将会被援引为不能掌握这里主要局势而招致失败的例证。这里的局势可以从各种角度去估量，但首先要看到这是现代西方民主理想反对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的战场。可以说，这是一场文化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将建立起相应的价值观念，从而创造未来。我不必更多渲染这两种对抗的力量，你我都知道这一切。问题在于，我们美国是这场斗争中的一方，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在事实上并不承认这一点。我们谈论全球斗争，却避而不谈中国的问题症结。

这种无能状态典型地表现于对待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就知道，他们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逐渐死去。…………这些在美国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思考、言谈、教书都和我们一致，他们是美国在中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分利益，在目前这场斗争中，他们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然而，过去一年里，我们竟没有为支援

① 英国内阁所在地。——译注

他们想出一点办法，只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还能做一点事情。

这一桩具体工作的失着不过是我们政策中更根本的谬误的一个例证。依我看来，更根本的谬误在于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能卷入另一国的事务中去，哪怕它是全球斗争中的一个战场。英国人至少还向这里运送书籍，并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运送的书比我们多。

在华盛顿还有另一种有害的理论，令人遗憾的是，它也曾出于劳合之口，而按理说，无论从你或从他那里，都不会出现这种谬误。这种有害的理论认为，在当前中国，最主要的是和日本人作战，所谓文化联系只是次要事务，无足轻重。我的意见恰恰相反，我认为，这里的首要问题是文化。劳合当然注意到，经他手运送来的武器并未都用于和日本作战。其原因，就广义的含义来说，就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只是作战的一个方面；而且，除非使用这些武器的中国人有正确的思想，否则，运送物资的结果可能不是好，而是坏。很难设想，美国的理想在这里打了败仗，而战争却能真正获胜。不须说，中国人总会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想使全世界组织起来，就必须有某些共同的思想，并使我们的思想压倒其它思想。令人惊奇的是，在这里思想之易于输入，就象飞机飞进来那样

容易。然而，要在中国进行系统的思想工作，却由于华盛顿主管部门没有想象力而遭到搁置。这种缺乏想象力就由于缺少与中国现实的接触。情况汇报送到远距离外，可以整理加工，使原来的主见得以加强，但是一个人只靠文字去接触局势，就会失去正确反映的能力。

在你看来，会认为我变成一个扩张主义者，这是因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我们的世界中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是则不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都应致力于组成一个我们的世界，而不让它成为别人的世界。由于国内对这里缺乏了解，这里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是：派来的人太少；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谁也不应再责怪他们。

在表示了上述意见之后，我现在不得不想：怎样向你提出意见。我能庆幸的是，哈佛委任我为终身教授。姑且假定哈佛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样，我随时都可以回国，不必经过大使馆，而直接写信给《新共和》杂志。我想，你和劳合会因为我的这种"吓唬"而高兴，至少，这是我的希望。

〔附件致希斯〕

清华教授情况

提要：由美国培训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是美国

在中国的一项投资和资产。现在，他们快要被灭绝了，应该寻找支援他们的办法。

资料来源：本报告是根据与以下各位教授的谈话：在夏威夷出生的美国公民，英语系主任陈福田，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两人都是大学校务委员），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钱端升，国民参政会成员，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校长。这几位是清华大学教授中美国留学生的领袖，我与他们自1933年就相识，因为当时我在清华大学蒋廷黻主持的历史系任教一年。此次在昆明一周间，我访问了五六个教授的住处，并与十二位教授进行了谈话。

（1）清华大学最能代表美国对中国的兴趣，因为庚款中有几百万美元都投入清华大学了。正如在任何重要大学一样，教授是投资中的重要部分。清华大学由于它的学术地位和财力，能够从美国留学生中挑选最优秀分子到清华任教。

总的说来，他们是中国曾受西方学术培训的精华分子，因此，是美国教育影响的活的代理人。清华的建筑和设备都已落到日本人手中，美国政府三十年的投资，现在剩下的只有这些教授，因此，他们的处境值得特别重视。

（2）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致力于控制中国知识界，为此长期以来极力要控制清华大学及其它大学。然而，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都坚决抵制。

结果是一场长期持续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与教育部的权势和金钱，另一方面是教授们决心维护美国传统下的学术自由。这两方面的力量是不能比的，因为教授们靠出卖书籍和衣物维持生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非给与支援，这场斗争的结局将是：维护美国自由信念的教授们长期营养不良，患病，情绪低落，以致流离，死亡或腐化。

（3）具体说来，国民党与教育部的做法是：动员年轻的教授参加国民党，凡肯于这样做的，就得到重庆方面的优渥照顾；政府给西南联大的经费，是按照招生数量，而不考虑清华（以致整个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教授水平；同在昆明的省立云南大学，经费远比西南联大充裕，而西南联大三校教授却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萃。

（4）类似的事例还可举出很多。去描述大学教授们如何住在搁楼上，卖书籍和衣物度日，负债累累，因营养不良罹病等细节是不必要的。他们之受苦，究竟只是由于通货膨胀或还由于官方的敌意，姑且不论，总之，就他们对中国和美国的价值来说，他们所得薪俸太微薄了。

如果我们承认，在我们正进行的自由与统制的全球斗争中，中国也是一个战场，那末，我们因未能援助这些人，将使美国在这场斗争中记录上一个污点。

今天的读者会注意到，这个要求干预的呼吁并没有考虑到，美国用什么方式援助这些教授。但无论如何，总可以找到一些间接的办法。这些意见以及其它类似意见，对华盛顿是起了一些作用，但却用了很长时间。我来到战时中国所陷入的第一个危机就是与华盛顿某些人所主张的“打日本第一”唱反调。这样，我就卷入了另一场斗争，在我更深入到中国事务中去以后，它的意义日益明显。

三、在重庆安顿下来

尽管在昆明的生活有各种困难，它那晴朗的天气象是在亚利桑那，至少可以补偿许多缺陷。在我们从昆明前往战时首都重庆后，我们也就与干燥的阳光暂时告别了。前往四大强国之一的首都重庆的旅途真是“蜀道难”。盟国朋友只能从空路前往，而一年之中有大半年时间，重庆都被云雾笼罩着。云南的名称很确切，它的确在“云层以南”。四川这个名字也有其来历（四条河流，长江只是其中之一，都穿过各自的丛山和险滩），可以看到云岫从江山蔼蔼升起，结为云层。我们是9月25日离昆明北飞的。

跨越了无数绿色的群山、赭红色的土地；半山腰
也有稻田。我们的飞机攀到云层以上一万二千英尺
的高度，再钻出云层下降时，长江和雾都就在脚下。

重庆的三个飞机场对飞行员来说，都是不同的挑战。首先，在长江中间沙洲上的跑道只能在冬天低水位时使用。飞机从那里起飞时，驾驶员要小心横跨江上的一条电缆，飞机必须在电缆上面或下面过去。第二个是九龙坡机场，跑道的一

侧是山，另一侧是长江，飞机起飞时，还未上升多高，便已在江面上了。第三个白石驿机场最大，要跨过一道山，座落在河谷里。飞机在云层中盘旋下降时，往往要下降到比山峰还低，才能看清跑道。四引擎的C—54大型运输机，曾因看不清跑道，飞机着陆时偏离跑道中轴线二十英尺，只能倾斜着陆，看去就如大象跳舞一样。有时，气候不好，飞机不能着陆，只能折回原地。（战后，从上海飞重庆的C—54型飞机，经过七小时飞行，到达重庆上空，有时盘旋一小时也无法降落，只好沮丧地飞回上海。）1942年时，我们那一次飞行倒很顺利。在重庆机场上遇到陈纳德将军和电影监制人约翰·福特。战时人物往往在机场上最易见到。

重庆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为人类居住，十分不幸，因为没有平地，要在城里往来，得象山羊一样忽上忽下。"在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半岛上，只有"山边几条新街可供汽车行驶。"每一样东西都似乎"罩着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土"。

我在战时中国首都度过十五个月，当时，无论是冷战，或中国革命，都还未使我们为之苦恼，构成威胁的还是德国人和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战还刚过了一半。遇上晴天，日本轰炸机往往把重庆的褴褛市民赶进防空洞去。但是，重庆通常都笼罩在云层之下，因此，我们感到的更主要的问题是潮湿的气候。

1942年重庆的居民，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如此充满信心，甚至令人难以理解。也许是因为美国已经动员起来的缘故，我这个三十五岁的哈佛大学教授来到重庆，也可表

明这种战时动员的程度。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新设的中国处派一个教授到驻重庆大使馆，提供小型影片，同时为国会图书馆收集各种出版物。这就是我对外公开宣布的任务，用体面的学术外衣掩盖我的另一项任务，替华盛顿的战略服务局收集日本出版物，拍成缩微胶卷送回战略服务局去，为的是赢得战争。

战略服务局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人埃森·盖尔博士回美国前，在重庆城外约两英里，离蒋介石、孔祥熙、史迪威将军和其它人的总部不太远的求进中学院内，为战略服务局预备了一所房子。这个地段附近是权势的象征，在求进中学院内有几个民间机构一如红十字会、中国基金会（掌握中国赔偿美国的庚款）、金陵大学等。我们的一幢楼，有四层，二十五个房间，墙壁是用石块砌成的。然而，自大卫·罗威离去后，代表战略服务局的只有克莱德·萨金特一人（在北京时，他曾租赁我们的后院）。为填补这个真空，美国战时情报局也搬了进去，它与战略服务局本来是兄弟，都是由情报协调局演变而来的。

战时情报局的活动很多。我们在北京相识的朋友，新闻记者麦克（弗朗西斯·麦克拉肯）·费希尔在珍珠港事变后被征入伍，这时负责美国在自由中国的新闻宣传。在心理战方面（用飞机散发传单），由在日本长大的吉姆·斯图尔特协助他工作。他们已经有一批工作人员，收听记录，复印散发战时情报局的新闻广播。在取得海顿博士同意后，我邀请战时情报局更紧密合作。不久，他们在纽约的专家就能用特殊设备发出

传真新闻照片。我们两个局的办事处还幸运地有一辆汽车。

由于我还有一个头衔是美国大使特别助理（但我只拿公务护照，没有拿外交护照），我还要走到半岛顶端，走下二百多石阶，搭小汽轮逆着激流过江，爬上南岸，到美国大使馆去。在大使馆，我花费了两天时间，向高斯大使和使馆参赞卡特·文森特解释我的角色。要把我这门手艺说清楚，真花费了不少时间。

我决心首先明确一点，在大使领导下，并通过大使进行活动。我没有自己的密码或传递渠道。说到底，在全部战争机器中，我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从事有关研究和掌握出版物，不从事秘密情报或秘密行动。我的行政预算及人事开支由大使馆掌握。它的款项来自收集外国出版物委员会，这是由联邦政府各部共同设立的，起初简称INDEC，后来简称IDC。

这个在全球收集图书的机构，属战略服务局研究分析处主任威廉·L·兰格领导，具体由一位年轻的图书馆专家弗雷德里克·G·基尔戈主持。弗雷德于1935年在哈佛大学化学系毕业，随后参加了怀德纳公司，从事拍摄外国报纸的缩微影片。1942年3月，兰格把他征召到战略服务局，掌握主要从德国收集的各种出版物，这是情报工作所需要的。他的委员会要为各种不同的要求服务；这时，弗雷德年刚二十八岁，他一身而兼外交官、科学家、还当通讯员。东亚不是他的主要兴趣。我把从中国情报机构得到的日本、中国各种文件，用莱卡照相机拍摄成胶片，送回国去。至于伯顿·法斯则努力寻找来自东京的各种报纸、年鉴和政府报告之类文件。

我还希望能把中国出版物也加以收集，运送回国，使美国的中国出版物收集工作不致因驼峰阻隔而陷于停顿。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委派我担任国会图书馆驻中国代表。他虽不能提供多少经费，却抱有极大的善意；国会图书馆的东方学部主任恒梅尔博士尤其如此。

最后，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要从中国人方面取得什么东西，就必须给他一些东西。这无非是互惠的古老原则，不能平白无故地受惠于人。因此，我担任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代理人，威尔玛则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中国处，拣选有缩微影片的书籍和科技著作，运送给我。我带有一架放映机，这是华盛顿一位科学家发明的，还带有灯泡、镜头，可用以加工制造别的镜头。

为使我的工作贯彻互惠原则，在我为麦克利什起草对我的工作指示，（1942年8月12日）和替杜诺万上校起草对我的工作指示（1942年8月18日）时，我都插进这样一段话："你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中美之间的出版物交流。"

我向高斯大使详尽地谈了对自己工作的设想。我认为，许多美国军事机构、战时机构同时在华活动，就象一个多头巨人那样，缺乏一个统一的政策。罗斯福总统派劳合林·柯里博士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绕过了大使。盖尔博士又有他自己的密码，如同军事系统那样单独行动。我希望大使了解，我虽有三个上级领导机构，却并不致威胁他那已经很有限的权威。

高斯大使是圆孔中的一个方木桩。有一次参加招待会以

后，他与麦克·费歇尔和我一起回家，向我们讲述了一小时

关于他在上海担任领事时的故事，怎样制服了贩毒商人，把他们绳之以法。他表示，他最希望从事的工作，莫过于在国内担任一个地区的检察官，贯彻执行法律条例。他后悔，未曾在战争爆发前便退休，以便去当地区检察官。他说，他是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对浪费公家的钱和不讲效率，感到不能容忍。在委员长设宴时，他坚持要准时出席，尽管约翰·卡特温柔地劝他不必如此。

当时在大使馆里最干练的外交官应推约翰·卡特·文森特，他是佐治亚州人，在中国有长期的经验。他给我的印象是：

说话极快，理解事物更快。对任何局势都感兴趣而在涉及他本人时，又能保持客观态度。他说大使阁下在重庆江段南岸和中国政府相望的隔江这幕闹剧，早可以结束，可是大使一再拒绝了这个机会。最使他心碎的是，大使不肯开口要经费，把现在外交部的大厦买下来。他说，在这里哪怕只住一年半，也象永恒那样长久。以他这样一个机敏，充满生气，时刻准备行动的人，要与那个大块头，行动迟缓，拘泥于法律，不爱与人交往，思想停留于过去的人每日相处，他真不知怎样打发这种令人难熬的日子。他打发日子的办法就是对各种问题提出

自己的看法。和他们两人在一起交谈，会很就快忘记大使和他的雪茄（雪茄烟头和大使的头都是白色的）就在旁边。约翰，卡特有一种天才，能毫不费力地绕过阻碍。在这种充满机会和失败的情况下，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早就吵翻了，可是他靠忍让渡过了这一切。

1942年10月，高斯先生又遭到来自华盛顿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温代尔·威尔基的故意冷落。威尔基把美国竞选总统的政治大马戏带到了重庆。在我们刚抵达重庆几天后，他就在重庆为自己竞选总统展开活动。在这方面，最鲜明表现出中美之间的文化距离。这位来访者，说大话，讲派头，用他的美国人性格向中国人讨好，仿佛中国人会参加投票选他担任美国总统。这就好象一位非洲酋长向爱斯基摩人表演部落舞蹈似的。

10月5日，我和使馆官员，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埃德蒙·克勒伯一起，跟着满身是劲的威尔基先生跑步访问了四所大学，办法很简单：在夹道欢迎的学生中间走过去，忽然停下来，与一个指挥欢迎队伍的学生握握手，再停下来随意挑一个学生，连珠炮似地问他的学系、学业，父母等等；再快步走进接待室，连珠炮似地向校长询问学生人数、班次科目、学生年龄、各系人数比较、经费状况等（他使年高德劭的张伯苓为之发抖）；然后走到楼外，在台阶上对围上来的学生演讲，题目是“我在四年大学生活里怎样和教授作对”，发表一些主观的评

论，表示自己有个性；中途又改换题目，讲战争如何严重，他作为人民的代表，如何献身于未来世界防止战争重演的使命。当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只是不断地表示自己充满献身精神。学生们也和重庆所有的人们一样，看去又瘦弱，又疲乏的样子，但都还表现出惊讶、热情、兴奋的神情。在一大串“民主万岁”、挥舞小旗中，整个上午过了一大半。最后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主持的招待会。两兄弟的身材都那样矮小。教育部长讲了一大通以民主与自由为教育的宗旨。

蒋夫人为威尔基举行一次茶会，在茶会上她发表演说。威尔基所到之处，使每一个人都为之激动，他的精神感动了人们。宋美龄的表演也十分出色，连威尔基都似乎为之倾倒。他随后讲话，先开玩笑说，追随夫人安排的程序使他忘了要发表反对他的光辉对手罗斯福的演讲，等等、等等。整个茶会都是在玩弄辞令，参加茶会的人是新生活运动那一伙人，都是此道老手。

10月6日，孔祥熙博士为威尔基举行一次花园招待会。这是在他官邸的后花园里，景色宜人。我的座位接近首桌，在首桌入座的是：王宠惠、陈纳德、何应钦、孙夫人、威尔基、孔祥熙、蒋夫人、高斯、史迪威、白崇禧和孙科。

参加这个中美关系聚会的人物，就足以说明这种关系的

错综复杂。以出席的美国人来说，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的权势压过了高斯大使。史迪威是华盛顿方面中轴人物乔治·马歇尔的代表。陈纳德则是个走运的大兵，得到蒋夫人的大力支持，认为空中力量之重要胜于其它一切。两位夫人，蒋夫人与孙夫人，谁都知道她们是亲姊妹，然而孙夫人是位人道主义者，同情左派，不是追求地位的野心家，也毫无实权；事实上，她被这个家族的其他人看管着，只能在城区范围内活动。在这个大家族里，孔祥熙与蒋介石是连襟，是靠蒋介石过日子的。孙科是孙中山前妻所生，有可能成为蒋介石的对手，但没有实力；他的政治地位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他参加蒋介石政府，可以表明蒋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出席的中国将军们，何应钦是忠于蒋的黄埔毕业生的代表，而白崇禧（在军事上，他更有本事）原来是桂系，他的出席象征蒋领导下的团结。最后是王宠惠，他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国际知名的法学家，代表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那批人。

他们合在一起，显示出一幅图画：军人占压倒地位，这在战时是不足为奇的；另一方面是在一个领袖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大联合。蒋介石是和罗斯福平起平坐的，因此，他不能出面与竞选失利的威尔基会晤。

这次茶会由黄仁霖将军担任司仪，使茶会为之生色。黄身材高大，热情洋溢，亲切和蔼。我们于1934年在南京曾经相会。他在蒋夫人的侍从班子里是个关键人物，起初担任励志社总干事，然后活跃于新生活运动，现在是战地服务团（为美军提供食宿条件）的主持人。凡是与美国人应酬的社交场合，

蒋夫人就派他担任在宫廷里插科打诨的角色，他扮演得神气十足，到处向人拍肩膀。据说，他早年是学唱京剧大花脸的，后来又学了二十年代美国大学的那一套，结果就汇合为俚俗的表演。1946年圣诞节时，威尔玛参加了一次圣诞晚会，黄仁霖在晚会上的表演可称登峰造极。他扮演圣诞老人，向大家分送礼物，其中还有一件礼物送给"那可爱的小男孩乔治"，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对这一出毫无表情。

另一方面，黄仁霖将军的战地服务团要想讨好美国军官们，却为此受了不少气。他告诉我："美国士兵坦率真诚，唯独以前到过中国的军官，总以为他们一切都懂，"很难对付，要求既高，又爱猜疑，黄说起这方面事例时，甚至带上了反美情绪。

我们在重庆遇到的许多人，几乎都是十年前北京时期的老相识，埃德蒙·克勒伯在大使馆，约翰·戴维斯在史迪威将军那里，麦克·费歇尔主持战时情报局；还有一批中国老相识如弗兰克林·何①，是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来的，现在从事战后复员计划工作。由于有这批熟人，因此我对事物的了解得以具有连续性，并给我一种洞察力。艾弗瑞特·格罗夫司密斯在于海关的工作，虽然现在已经与海关毫无关系了。原来的总税务司腓德烈·梅兹爵士，还在上海被日本人关押着。到1943年，他的总税务司职务便将由L·K·利特尔所接替。

我还发现，蒋廷黻住得很近。一年多之前我曾写信给他，

---

① 何廉，经济学家。—译注

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正逐渐为备战情绪所取代。1941年7月，他回信给我，说起中国的目标，以及他希望战后重返学术界。九月间，我又从华盛顿写信给他，列举了美国学者到政府中工作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强调需要中国出版物，和国民政府社会经济工作的情况报告。10月11日，他回信表示将提供大批资料，包括统计数字，特别是要纠正对中共地区的美化夸张。11月12日，我回信给他，并附去巴克斯特的一封信，介绍主持缩微胶片工作的D·罗，我还概述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中国的工作计划。1941年12月6日，廷黻回信热情建议，在哪些大学可以开设阅览室，以及如何进行学者交换等。他预见到，在大使馆里有必要设立文化参赞，还要有几辆卡车，专事经滇缅公路把书籍运到中国。

时隔九个月，现在我已登上门来，推行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部分工作。但同时，我相信廷黻对情报协调局一定印象不佳。他不时请我去吃晚饭，打桥牌，但是没有什么材料送来，很可能，这不是他主管的范围。

9月间一个晚上，我与美国财政部稳定金融委员会代表索尔·阿德勒一起去蒋廷黻家。

> 廷黻向我们叙述一些他为蒋介石编制预算的故事。翁文灏要建造钢厂，产品成本要四万美元一吨，在战争时期无济于事，到战争以后更是毫无用处。廷黻把这个主张驳倒了。另一个什么人设法使蒋介石同意，修一条通向西伯利亚的铁路或公路，这需要很大一笔投资。廷黻向蒋介石发电报，陈述得不

偿失，终于否定了这个方案。他的主张是在目前危机时期，要尽力压缩非必要的投资，以尽量按预算执行，使通货膨胀不致失去控制。他和阿德勒都认为，军队和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是必须充分保证财政支持的。我对此表示不同意，我看国军现在无事可做，而战争一结束，知识分子将十分重要，至少从美国人的利益看来是如此。

10月初，原北平国立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在香港沦陷被日本人监禁一年之后，脱身出来，到达重庆。他是第一流的学术组织者，每天都有新思想、新计划。同礼以拮据的经费，于1934年创办《中国图书季刊》，我们在战时关于中国新出版书籍的有限消息，就全靠这份季刊。

袁同礼一度是清华大学图书馆长。他于192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得文学士学位，1923年在阿尔巴尼纽约州图书馆学院得图书馆学学士。他帮助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编目工作。1925年，就任北大图书馆长，1929年任北平国立图书馆副馆长。他以图书馆界领导的地位，把中国图书馆工作者送到国外进修，创办馆际借书制度，交换国际图书，还推动统一编目、新书索引、丛刊目录等工作。1935年，他吸取国会图书馆的做法，对所有中文书籍印制目录卡片。战争开始后，他把两千八百册珍本古籍送到国会图书馆保管。他还推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总之，袁同礼在四十八岁时已成为中国的图书馆巨擘。他在重庆再度出现，对我来说，是个吉兆。我们立刻联合起

来。不久以后，他就在教育部下面成立起中国国际文化服务社，以官方名义散发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缩微胶卷。在各大学的阅览室里都有我们散发的缩微影片，装在漂亮的红盒里，附有影片内容索引。我的邻居，金陵大学工学院长还设计出一种阅读箱，可以与影片一起搬运。各大学的教授们都对美国的专业书籍如饥似渴。现在运用最新技术科学的成果，能够大大克服书籍运输的困难，受到极大的欢迎。

同礼还为我的办事处起了中文名称为：学术资料服务处，隶属于美国大使馆。“学术”与“服务”这两个词十分宝贵，它使我与秘密情报得以保持适当距离。在英文名称中，我们称之为美国书刊服务社。

我从盖尔博士那里继承下来一位能干的经理人才陈松樵先生。他原在盐务总署任职，不仅办事干练，而且与孔祥熙博士有私交。实际上，他定期向孔祥熙报告我的办事处的情况。后来我们比较熟悉了，他也把孔祥熙（当时是行政院长）特别赞赏我的某项工作告诉我。这样，我就与中国官方主持的工作网、私人关系网都联接起来了。

1943年1月，我去拜会孔博士。

孔与我坐在靠椅上，我向他陈述我的经历、目前身份和工作任务。他很精明，盯住我看了很久，似乎要判断我是否诚实。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在细听我所说的一切之后，他同意让我接触机密文件。

后来，我为描绘个人关系网如何发挥作用，曾记录

下来

陈松樵的一天

我们的总务和中文秘书陈先生是美国政府这艘船在重庆的汪洋大海里行驶时围绕船身的润滑油，使这艘船不致每日每时遭到沉没的危险。他身材不高，年纪不大（只有三十二岁），经常穿一件长衫，他的举止对上级恭顺，对同级很会说话，对下级傲慢自大，架子十足。他就象一辆汽车，有三挡，能根据路面情况立刻换挡。美国人都喜欢找他陪同去买东西，然后看他的出色表演，开足马力，压倒那个不走运的店铺老板，他滔滔不绝，时而讲美国大使馆，时而讲孔院长，为打折扣讨价还价，讲中国人的颜面、交情、身份很高的关系人物、以后的生意，还讲真正的理性。战时情报局和其它朋友们都不时请陈先生来“谈判”。无论是失窃，或是煤烧罄了，或某人被捕了，或恭桶溢水了，或是要买信封、买新房，都交给陈先生去办。

他出去跑一天，就会回来汇报说：费博士，我到液体燃料管制委员会去搞汽油，副主任的秘书吴先生是我的连襟曾先生的堂兄弟，曾先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画家，吴先生答应我们可以重新登记，配售五十加仑汽油——二十加仑甘肃汽油，二十加仑代用品，十加仑酒精。您看，我们比过去只配售

二十加仑汽油要好得多了。因为战时情报局也在我们院内，它们也使用我们的名义，因此，我告诉吴先生，这是美国大使馆的需要，他应予保证。我又去粮食部找徐副部长，他以前也在盐务总署任职，他发给我们许可证，可以按中国政府机关买米的价格购买大米——您这里的职员大多是中国人——，我已和佩顿先生说妥，按比市价低的价格，把米卖给中国职员食堂，赚下的钱则用以补贴职工医疗费。这里是您的名片，名片上"大学"这个字印漏一个字母，老板说，就不收您的钱了，因此，我送他一点小小的礼物。我还带回一些现在很难买到的纸张，我是从财政部总会计师王先生那里搞来一份特殊许可证，王先生以前住在我叔叔的房子里。另外，我们的汽车司机说，要买一罐新的机器油，他的朋友在远东汽车修理公司做事，答应可以卖一罐，售价两千元，可是那铁罐已经生锈，我说，只能给一千二百元，还得问过费博士才行。我还在军事委员会停了一下，看望高先生，他病了，现已去乡下休息。他的副手席先生答应把机密报告档案借给我们，我把你的名片和缩微影片使用介绍各给他一份，并且约定下星期再次会面。这里是从外交部取来您的签证。外交部上星期停发签证，我找到在秘书科工作的堂弟李先生，告诉他，你本应上周就走的，他答应特别帮忙。

得到陈先生报告后，我又向他交代一串新任务：赖契利先生的房间里渗水是因为浴室里浴盆的下水道接口处漏水，如果能找一块砖把水管托住，也许就不致漏水；医院送来的报告说，厨师有砂眼、蛔虫、花柳（这是真的，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因此，要另换一个厨子；还有，中国职员的食堂不能用使馆的煤；前个月，上月份都已交代，他们应当自己买煤，另外，请买两本记事簿，请告诉杨先生，每一本记事簿开一张发票，还要有副本，如果他买三本记事本，那就要有六张单据；下星期里，我要拜会杨将军；这里一副铰链缺一个螺丝钉；我们还应归还标准石油公司一对铜鼓，这是博斯诺比先生借给我们，而去年陈先生又转借给盐务总署了，不错，以前的司机老王在解雇之前偷走一个，但我们必须赔偿一个；请为订制的书箱开支票并把现款周转金开支情况给我一份账表。……

这样的工作，日复一日，永无休止。他不停地忙碌奔波，有时要加以处罚，更多的是刻薄斥责，有时靠瞎碰，总之，从不停辍。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说不出陈先生的明确职责。

总而言之，陈先生是派来照顾并监视一个美国机构的中国官僚。他能向行政院长求助，既打发了外国人，又监视着他。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制服蛮夷的传统办法。

有了这样一个基地，我就开始在全城搜索对“部际收集

外国出版物委员会”(简称IDC)有用的资料。陈松樵为我与政府各部门的头头联系，我则逐个拜访，向他们解释我的使命，表示提供援助，同时也请求他们帮助。每次我把在重庆的探险写成备忘录寄交部际收集国外出版物委员会的弗莱德·基尔戈时，总留一个副本送交大使。有时，我向大使提交备忘录，把副本送给国务院。我还以私人写信的方式，有时写给劳合林·柯里，多数则是写给威尔玛，由她决定送给哪些人传阅。这些信件都是通过军邮发出的。

在陆军里，我有一个相当于校官的军衔，可以使用陆军飞机和医务设施，但我不在陆军部门工作。我曾见过史迪威将军几次，这些会面增加了我对他接近下层，敢说敢干的性格的了解，他的一句格言是了解他的性格的好线索：“不能让那些杂种把你踩在脚下！”

这种多渠道的活动为我观察人，接触人，反映他们的情况十分有利。只有几桩事情不能令人满意。首先是华盛顿送来的那种放映机对人的眼睛十分有害。它投射在墙上的光线过于强烈，使用它的学者们尽管戴上眼镜，还是很快就眼花头痛。还有，这种放映机在使用时，温度很高，很容易发生危险。我们需要在市场上出售的那种型号放映机，它根据经验，了解使用者眼力所能忍受的限度。

其次，我向华盛顿提供的缩微胶卷很难辨认阅读。在重庆搞到手的许多材料、包括报纸，都是用油墨印在廉价纸张上的。这种纸张在制作时是把大锅里浮游水面的纤维抄起来，在网板上凝固干燥而成。纸张通常是灰色或绿色，即便

用作手纸都不合用。油墨印在这种纸张上，常常出现一团团墨迹，纸张颜色又那样灰暗，无论叫谁阅读，都会发火。再加上重庆的电力，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我刚根据曝光表，把莱卡照相机上的光圈、快门调好，电力强度亮度已经变了。我寄回去的胶卷，谁也无法从头到尾读完一卷胶片。但是，关系并不太大，因为起初我拍摄下来的材料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

我起初提供给中国方面的资料也如同我提供给华盛顿方面的资料一样毫无价值。这就使我由充当两国知识界的掮客、经纪人降级为一种公众联系人员的角色。和我打交道的那些大亨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也无非是扮演一个联系公众人员的角色。我们谈论这种、那种材料，仿佛很内行的样子，其实，我们谁都不亲自使用那些材料。

这些缺点都逐步得以克服。较好的放映机和较好的缩微影片都制作出来了。六个月后，基尔戈派来葛斯·佩顿，他是个万能的摄影技师，还能用自制的变压器稳定电流。这时候，值得拍摄下来的资料也源源而来。到1943年底，华盛顿的“部际收集外国出版物委员会”已经能掌握七十种中国期刊，它发行的中国图书缩微影片目录达到二十二页之多。两国间出版物的交流开始畅通了。

四、玛丽·梅乐士与战略服务局

美国书刊服务社，按照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长凡事不痛不痒的惯例，使我游离在秘密战之外，而战略服务局的宗旨本来就是干这一行的。情报秘密和特工行动和我都无缘。（我欣赏莫蒂默·格雷夫斯的一句话："如果连我都知道了，那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秘密。"）对于战略服务局在全球进行的秘密战争活动，我只有未经考察过的粗浅印象，这个印象来自以下事实，即：杜诺万的机构从创办起，就要和海军情报局之类老牌机构相竞争。战略服务局和战时情报局一样，根本打不进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司令部，在他的战区里，决不会容忍从华盛顿来的竞争者。战略服务局于1942年末得以进入中国，全靠它支持美国海军已在那里进行的工作。

1942年10月的一天，在我的设在求进中学的办事处门前驶来一辆当时称为武器运送车的大型吉普，从车上走下一位年轻人，穿着黄咔叽布的衬衫和短裤，活象一个童子军。他的相貌不仅英俊，简直可以说是美貌，笑起来还有两个酒涡。他的名字是米尔顿·梅乐士，但是，大家都称他玛丽，因为当他于

1922年毕业于海军学院时，百老汇的红人名叫玛丽·梅乐士·明特。而1942年时，玛丽·梅乐士已是美国海军中校，而且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作他的后台。金当时是美国海军总司令，他委派梅乐士主持在中国的美国海军顾问组。

当时，梅乐士刚42岁，也和我一样，正在制订他自己的工作计划，摸索着前进，还要为他的官衔身份以及从印度飞越驼峰，把给养运到中国而奋斗，以至吵架。我和他相似之处，也只有到此为止，因为他的给养是黄色炸药和汤姆式冲锋枪，他的任务是和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将军合作。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戴笠这个名字可能最有权势，也最令人害怕。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蒋介石要把谁监视、调查、逮捕、处决，戴笠的组织就去执行。戴将军是靠暗杀起家，成为蒋介石的特工头子。他在国民党中国的地位就如同把J·埃德加·胡佛和威廉·J·杜诺万捏成了一个人，因为他手下的人既干联邦调查局的一套，又干中央情报局的一套。梅乐士把他拍摄的罕见的戴笠的照片收入他的回忆录《一种不同的战争》（1967年出版，但两人都已去世）。这位传奇式的秘密人物，从相片上看来很聪敏，而且显然比胡佛漂亮得多。

梅乐士和戴笠怎样在一起相处——以及中国的秘密警察怎样获得美国的枪支，接受美式训练——是中美两国“双人舞”中值得专门研究的一个题目。首先，梅乐士完全是浪漫地被中国吸引住了。他于1922年毕业后，在中国驻扎五年，游弋中国的各个口岸之间。他的新娘威尔玛（为和他的绰

号玛丽对称，大家称她比利）对任何一样中国东西都喜欢得入迷。1936—1939年，他再次被派往中国执行巡航任务，指挥一艘驱逐舰，当他回国时，就设法把夫人和三个孩子经滇缅公路撤出来。

其次，梅乐士在海军中得到擢升是靠他的专业本领。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40—1941年，他担任内部控制局的记录官员，负责美国海军各种控制系统仪器设备的性能管理。当时与他在内部控制局共事的，有许多成为海军系统各局的领导人。按梅乐士自己的说法，他那里就象个咖啡茶座，同事军官们经过时都要进来坐一会，休息一下。

这个能干，有活力，带浪漫色彩的技师交上好运，是由于他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军事参赞肖迅如少校结为好友。在1940—1941年间，美国海军里关心中国的人都预见到有必要在中国派驻海军观察员，一方面预报气候，以便在太平洋上掌握气候变化，另一方面监视沿海的日本船只。肖迅如少校经常与梅乐士谈论这些问题。不久之后，他们夫妇就成为梅乐士夫妇的密友，经常在一起吃饭。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金海军上将亲口指示梅乐士前往中国，建立一些基地，准备将来海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对他的书面指示却仅委派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里担任海军观察员，当时大使馆还有一名海军参赞，是海军陆战队的吉姆·麦克休上校，与梅乐士在海军学院是同班同学（我们早在北京时便认识麦克休）。

下一步是：金海军上将、梅乐士、他的后援负责人威里

斯·A·李海军上将以及肖上校在华盛顿一家旅馆里，便服秘密会晤。肖兜售他的主意，金海军上将表示口头同意。肖很快就得到蒋介石批准，让梅乐士前往中国，与戴笠合作。而戴笠派驻华盛顿的代理人不是别人，正是肖上校。

“那末，戴笠将军是什么人？”梅乐士问道。

梅乐士的回忆录就是以这种方式写下去，回顾他如何被逐步引导，和中国的J·埃德加·希姆莱建立起一种密切的感情联系。他发现，美国情报人员的报告都说戴笠声名狼籍，而肖上校却相反，认为戴笠是个好人。试想一下，梅乐士的工作成就是什么，就可以看出。肖是个引人上钩的好手，他的课题是：要找到一个能取得美援的中间人物，这个人要与高层人物有联系，具备领袖的素养，是“中国的真正朋友”，熟悉各种最新的科学技术，而且对广泛的政策问题毫不在意。梅乐士正是品质很好，而对政治考虑又很迟钝的那样一个人。

在我回忆中，梅乐士的“指挥”，那位肖上校是个胖乎乎的人，逢人便亲热地握手。我敢保险，他无论是向你劝酒或把你挂上肉店的钩子，都是抱着同样和蔼亲切的神情。他向华盛顿战略服务局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解释说，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的爱国心受到莫大伤害，因此，要把曾在中国住过的人再派往自由中国，将会引起双方的苦恼。这样的人将如同去提醒中国人过去蒙受的耻辱，而且，这样的人过去在中国气指颐使惯了，已经难以改变。今日的中国国民党人怎么能和昨日的美国人合作？就在这种荒谬的说法指导下，

肖上校做到了使梅乐士派到中国的海军顾问组里那些快乐的小伙子们，都是天真烂漫的新手，对中国话一句不懂，中文一字不识。

1942年4月，梅乐士取道横跨非洲的航空线前往中国，真是巧遇，埃德加·斯诺和他结伴同行。6月间，他和戴笠已经混得很熟，两人一起穿越日军防线到过距福建海岸不远的地方。梅乐士写道："每当发现一个给敌人通风报信的人，当时就进行审判。"戴的翻译解释说："戴将军不负责审判，只负责判刑后的枪决。"梅乐士由此得出了结论，戴将军"从未不经正式手续便动手杀人；华盛顿的情报对此总喜欢渲染夸张。"

1942年7、8月间，梅乐士访问印度，督运给养（在那里被一个日本特务刺了一刀，幸而未死）。随后，到重庆建立起一个破坏活动训练营，离城八英里，起名"快乐山谷"，在那里的美国人都按照中国习俗生活，而且和戴笠手下的人完全平等地共事。

9月22日，玛丽·梅乐士突然被任命为"战略服务局远东协调主任"。看来，杜诺万急于利用梅乐士与以多疑、诡秘、排外著名的戴笠之间的关系。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引起的涟漪也波及到我身上。1942年10月初的一天，梅乐士走进我在重庆的办事处，带着一丝笑容向我宣布："我现在是你的新老板了。"他把杜诺万的一封信交给我，其中表明，我归战略服务局在华首席代表管辖。当时，我并不知道梅乐士与戴笠的关系，我向他解释我的机构性质，并且说明：特工活动不属我的工作范围。如果梅乐士和他手下的人经常跑

到我这里来，或想利用我的办事处房屋供他们活动，我宁愿辞职。最后，我们商定：各不相扰。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清楚看出：当时我可能给他的活动带来麻烦，也不亚于他给我的活动带来麻烦。他曾劝我不要向王彭升将军索取有关日本的材料，（而当时在重庆，王是唯一拥有这种材料的人，）理由是：王的国防部情报系统是戴笠的对头。

尽管如此，到1943年5月，我的缩微摄影室主任，从纽杰赛州来的葛斯·佩顿和我经常与王彭升将军相互设宴招待，从他那里借来几十种日本出版物进行缩微摄影。从梅乐士那里得到的材料往往过时而且不重要。与此同时，美国书刊服务社散发了两千种美国大陆的各种刊物缩微胶卷，还向一些阅览中心提供影片目录和七十架放映机。同时，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了几千种出版物。我向国内报告中指出：为国会图书馆和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活动，使我们“在各方面建立起友好联系，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对工作感到自豪，我们终于从特务机构的阴影下钻出来了。”

同时，根据蒋介石的意见，梅乐士和戴笠签订了协议，这个协议由梅乐士于1942年12月31日草拟，双方协议建立“中美合作组织”（缩称SACO，我们在发音时故意模仿滑稽影片，把它念成“短袜套”）。戴笠任司令长官，梅乐士任副司令长官，每人有明确职责分工，两人都拥有否决权。这个协议要经中美双方最高层批准才能生效。梅乐士把协议草案携回华盛顿。1943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计划委员会建议予以批准。1943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字批准中美

合作协定，由此，海军——戴笠联合行动得以独立于战略服务局，甚至独立于陆军战区司令史迪威管辖之外。中美合作组织拥有半打飞机，运送它所需的补给物资，完全不理睬应归史迪威总揽的控制租借法案大权。戴笠不信任战略服务局，认为它可能有反国民党情绪。他“强烈反对战略服务局扩大在华活动”。杜诺万想抓住海军的衣襟，进一步插入中国，并未获得成功。到1943年底，战略服务局放弃了这个打算，梅乐士不再算是战略服务局派在中国的人了。12月初，杜诺万与戴笠、蒋介石会谈了四天。他亲口告诉我说，他“或是与他们合作，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就甩开他们。如果他们对他的人下手，他也对他们的人下手。当然他希望不致发生麻烦。”（1943年12月17日我的笔记）。这么强硬的谈话和“中美合作组织”的精神显然大相径庭。其实，有一半属于吓唬性质。结果是，战略服务局在中国单独行动，并不顺利。

即便在作战中，各部门间闹磨擦，抢地盘依然是行动的主要动力。中国使〔美国〕陆军得到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而金海军上将指挥海军征服整个太平洋的时候，也决心支持中美合作组织的气象站，海岸监视和训练突击队的活动。但是，1943年夏天，中美合作组织开始“戴笠将军称之为‘联邦调查局学校课程’”的活动。这是训练并且武装戴笠的秘密警察去对付中国民众。大使馆、国务院、史迪威、战略服务局和其它一些单位都反对这样使用美援。当时普遍的印象是：中国所首先关注的，不是抗击日本的战争，而是准备将来与中共的内战。中美合作组织的确起了骚扰日军的作用，并为美国海军登

陆进行了准备。要命的是，当1945年国共开始内战时，中美合作组织使美援完全用于国民党方面。它实际意味着美国“过早地”发动了美国反对中共的活动，这引起中共强烈的怨恨，并且理所当然地视此为美国帝国主义的罪行。

我对这一部秘史的了解，简略说来就是如上所述，而我也是后来才逐渐弄清楚的，特别是梅乐士的遗作《一种不同的战争》和米歇尔·夏勒对官方文件进行的研究，令人大开眼界，这就是他的著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1979年出版)。中美合作组织的始末是美中合作的高峰，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史上一件丑事。事过三分之一世纪之后，对它还未进行详尽的研究。梅乐士对戴笠的游击军的热切援助也使美国卷入中国国内政治，偏袒一方。它除了反映政策考虑之外，还反映了各系统——陆军和其它部门对海军——之间的磨擦竞争。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本能地使自己的活动与玛丽·梅乐士的接触处于最小限度，虽然当时我对他的使命与活动只有泛泛的了解。后来我知道，1943年间，约翰·戴维斯在华盛顿曾代表史迪威反对中美合作组织，但它是一种秘密性质的活动，所以我当时无从知悉。梅乐士象绝大多数美国军人一样，用尽一切手段去打败日本。而我在重庆的小小办事处却走在另一条道路上，我和许多非行伍出身的中国通一样，所关心的是中国的将来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当时，我们还未曾理解现代社会难以驾驭和社会问题无法解决。我们还刚经历了新政时期，许多美国人（劳合林·柯里便是其中之一）都在想战后帮助中国工业化的问题。当时

重庆那批灰心丧气的官僚很喜欢谈论战后重建计划，这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心缩微摄影的一个主题。

我和钱昌照接触中，发现他对此很有兴趣。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重要人物。这个机构在自由中国创办了一百个工厂。钱是陶孟和夫人的妹夫，是一位工程师，"我在这里所遇见的一切人之中，他最象正在形成中的元老——精干，壮实，精力旺盛，反应灵敏，工作不停，而且要求精确。每天午饭后从一点到两点，晚间十点到十一点，他都要读书。每星期六天，他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周末才和家人团聚。（1979年我在北京再次会晤钱博士，他已八十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1947年，他离开中国，到英国进修，在中共接管政权以后回国，继续从事中国工业化的事业。）

当时钱昌照的上司、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是长期担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以前是地质勘察的领导人。1942年10月18日。他用汽车带我进城。

> 他大概四英尺高，象螳螂那样清瘦，由于在沪杭路上一次车祸而前额塌陷，具有一副极有活力、爱探询的相貌，象侏儒，却十分敏捷。他要看关于战后的缩微影片。有朝一日，他可能成为重建中国的人。

翁文灏原来在清华大学任地质学教授。1935年国家发生危机时，他和蒋廷黻一样，从原来北京的学者去参加南京的国民党政府。翁是宁波人，和蒋介石同属浙江籍，出身官宦门第。1943年，翁博士果真制订了战后运用国家、私人资金、外国投资推行工业化的纲领。8月间，国民党采纳了这个计划。（他

和钱昌照一样，并没有和国民党同命运，而在1948年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后出国。1951年，翁文灏62岁时，回到大陆，又回到他的地质学本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次主持勘测铀矿和其它矿藏的工作。）

这几位领导人对中国工业化的兴趣是我的机构能予以帮助的。但是，当时历史的主流还是戴笠所准备的屠杀国内的敌人。美国的用以杀人的科学技术比用以改善人们生活的科学技术，更快地介绍到中国。不久以后，美国以超等技术于1945年制造出原子弹，更使象我这种舞文弄墨的人瞠乎其后。直到现在，我还在想，恐怕我们永远也赶不上去。

五、学术中心与美国的利益

我个人的作战目标逐渐在心中明确起来——要设法使美国教育出来的中国教授们保存下来，其中有些是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在当时中国抗击日本的战争，实际是被中美两国军方所垄断。我的反应就是把注意力转向它处。被动员起来的教授很少，甚至学生们也被看作是国家的稀有资源，必须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之需，而不要在战场上浪费掉。有些美国民间人士因此对战时中国感到幻灭，于是以募集妇女、儿童或老百姓来消解心头的郁闷。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反对抗日战争。但依我看来，抢救残存的自由教育比作战可能更为迫切。

这样梦想了一番，并且把我的名片印上三个头衔——大使特别助理、国会图书馆代表和美国书刊服务社主任——我就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物，可以在自由中国到处旅行。我曾经到过迁居昆明的三座主要大学。在重庆郊外，我还访问过第四座主要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以及南开经济学院。在此基础上，我又访问了国民党中国的国立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各主要研究所，当时坐落在长江上游的荒野丛林之

中。我的目的当然是想看望老朋友梁思成夫妇。这种公私兼顾的做法，我以为并不违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传统观念。

中央研究院的宿舍离蒋廷黻的住宅不远。1942年9月6日，我找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梁思成。“他充满了激情，把我的手紧握了五分钟。”他来陪都，是为了到教育部和中英庚款委员会筹款。

自1935年圣诞节后，我们便分手了。此后，梁和他的全家由北京南迁，抵达湖南长沙。日军轰炸长沙以后，他们又逃难，有时徒步，有时搭乘长途汽车，历时两个月，到达昆明。在日军轰炸昆明后，梁氏夫妇又迁往城外，在乡村盖了一所小房子。我就在那里与他们见过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博士决心在日军可能进攻昆明之前逃离那座城市，或至少躲避空袭和昆明的高昂物价，他决定迁到四川农村，指望四川的云雾可以保护他们。历史语言研究所宝贵的汉学图书馆和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文物都用卡车载运到四川李庄，这是宜宾(叙府)以东二十英里，长江南岸的一座小城镇。那里冬天寒雾重重，夏天热得象蒸笼，图书文物固然是安全了，而工作人员的健康却难免不受损害。参加安阳发掘工作的梁思永，当时正因肺结核而濒临死亡。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研究所也不得不随着迁来，当时林徽因也因肺结核而卧床。

思成发现我不用他在北京时送给我的中国名字费正清。这是因为战争情报局的麦克·费歇也取了中国名字姓费，我就愚蠢地放弃了费正清这个名字，改取当时著名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克的中译姓范。思成对我说：“这名字与中国成语中

的蛮荒劫匪谐音，正清的意思是正直清白，而且与约翰·金谐音，费正清是个真正的中国名字。”他当然是对的。我也回忆起过去，一些外国人由于不懂中文而起了带有贬意的中文名字，例如1834年英国派到广东的使节拿皮尔勋爵起了个中文名字“劳痞”，后来才发现这两个字的含意是“劳碌的痞子”。蒋介石起名“中正”，意思是居中正直，这个形象可以号召人们团结在他周围。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起名“正直清白”，是十分贴切的。

1942年11月下半月，我与陶孟和博士联袂搭江轮去访问李庄。我们于1932年在北京首次相会，以后他的社会研究所成为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他的夫人随来重庆，因患肺病，搭飞机前往兰州，希望西北的阳光能治愈她的肺结核。和陶同行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都为周围人们的处境所吸引，首先就是江轮上的情景：

这艘船是分几等舱位的一条船，样子象三层的普尔曼卧车，它漆成军用卡车的颜色，还在顶层甲板栽一棵树，用树枝来掩护烟囱。冲刷东西的污水经常在船舱两侧的通道里流着。甲板上挤满了旅客，用栏杆和我们的船舱隔开，这些人就在甲板上度过全部旅程。我们乘坐的一号舱则有八英尺长、六英尺宽，有两张床、一张书桌。舱外通向甲板的过道，只够一个魁梧身材的人通行，但是，两个瘦子却可以在这狭窄的通道里躺下来，于是走路时就要小心地在他们四肢的间隙里插足。有时，睡在通

道里的两个旅客特别瘦小，又好说话，就会有第三个旅客挤进来。前后甲板、饭厅里都是这幅景象，走路时要看清人们的胳臂、身体横陈在哪里，一路找间隙插足。上厕所时，不能坐着，在厕所里隔着半截门可以看到厕所门外，地上躺着的一位中国妇女的胖胖的脸庞。（附带加一句，甲板上的厕所伸出船舷，排泄物靠重力自然流入江里，幸好通常它不会流入船里。）

我们在十日晚间登船，次日清早，晨曦刚穿过嘉陵江、长江汇合处的浓雾，八时，江轮启碇，晚间停泊；如果中午以后到达一个较大的城镇，下午、晚间就不再启航了。船上的人群就象在地下铁道里一样拥挤，只是都无处可去，显得很悠闲。我们的船舱里可以谈话、睡觉，也只好做这两桩事。

我的行装中包括一块新油布，它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桐油气味，可以驱除臭虫，据说对人无碍，除非人在睡梦中梦着自己变成臭虫。我们还通宵点着电灯，以吓唬臭虫。我发现一种看上去十分活跃的蟑螂，后身大，前半身逐渐变细，直到颈部，长着楯形的喙。它向我的油布爬来，又仓惶逃去。我的蓝布睡袋是缝纫机密缝的；七英尺长，五英尺宽，我就钻到里面去睡觉。采用睡袋的理论是，臭虫若不从我身旁经过，决钻不进睡袋，当然，假如它一旦钻了进去，也不会轻易再出来。在睡袋里面，再从脚

底下拉起薄毯，这番动作就象杂技演员的柔体表演一样。格雷汉·佩克听说，有一位女传教士在睡袋里可以脱掉所有的衣服，或是别人以为她这样做了。身体钻在睡袋里，头上再蒙一块老太太的头巾，这十分有用，谁也认不出我是个人，但如果来了一头野兽，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伙食，是一日三顿丰盛的中餐，但决没有宴会那套无聊玩意儿。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是两碗饭，把我的狮子般的胃口变成象一头母牛的胃那样，吃饭时，就从碗边，把饭铲进嘴去，然后等它落进胃里。我们还有四川广柑可吃。把大衣、雨衣铺在木板上就睡觉，使人有一种蜷缩成堆的感觉，但很快就习以为常了。

就是这样，长江水在我们身下流过。长江与密西西比河不同，它的河岸很高，至少在四川境内是如此，并且江面宽度很少变化。河岸上山峦绵延，有时笼罩着孤零的树影；天边是一簇簇的茅屋，间或看到一排鳞次栉比的工厂，厂房不大，烟囱喷吐着浓烟，象在重庆一样。最有兴趣的是船夫的生活，在驶向下游的大型平底船上，十六名水手节奏整齐地用力划桨，掌舵的是一名妇女，她一手掌着舵柄，另一只手臂抱着婴儿，口中发出号令，真象古代传说中那种魁梧而有男子气概的巾帼英雄。驶向上游的船只又是另一幅情景，成群的纤夫，踏着沉重的

脚步，伴随着雄壮的川江号子歌声，即便一个激浪打向船只，把他们都拖向后退，号子的歌声也不中断。我们每到一处停靠码头时，照例已有一两只船在我们之前抵达。因此，我们登岸时，要象在旧家具堆里玩捉迷藏一样，跨过人们的身体，攀登船舱的升降天窗，走过其它船只的狭长跳板，然后再沿陡峭的石阶，走上江岸，到镇里去。

我们所到的第一站是江津，意思是江上的码头，这个名字与波兹维尔（波特这家人住的村庄）一样，没有多少诗意。我们的第二站是合江，意思是两江汇合之处，赤水河从这里流入长江。这两个小山城都很象样，出我意外。城里都有条石铺的大街，与长江平行，贯串全城。大街上没有车辆，但挤满了行人，大街两旁是各式各样的店铺，电灯黯淡，商品却花色繁多。

有趣的是新事物、旧事物杂处在一起的情景。昨晚，我们先行经一个道士主持的出丧队伍。那道士戴着平顶软帽，然后走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新建立的一座方碑，上面贴着标语；随后，又看到一位算命先生，坐在耀眼的电石灯下，戴一副罗克式眼镜，桌前写着"直言无隐，顺命勿怒。"在一条偏僻的傍街上，我们突然看到街中心蜷卧着一个男子，看来，呼吸都很困难，不知是由于患病、醉酒、或受人袭击。孟和尖声对我说："不要碰他！"然后，他解释说，

这个躺在街上的人，可能是一个圈套，你只要碰了他，就会有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人围上来，和你算账，最后只得出钱把他们打发走。

我们走了四天，来到宜宾，这是扬子江轮通航的尽头，我们从这里换乘较小的船，驶向下游的李庄。

这是个一万居民的小镇。镇上照例有一条石铺大街，两旁有各种店铺，街上挤满了人群。李庄地处狭长平原，约半英里宽，它的地势高度适足以避免水灾。在这里可以饱览长江的典型风光，两岸都是二百英尺到四百英尺的山峰，沿江有一条狭窄的平原，上面种植着各种作物。在四川境内，长江是在峡谷之中奔腾，因此河床不会改变。河身约四分之一英里宽。两岸峰峦端庄安宁，美丽如画，而长江水就象从画中流出来一样，真是壮观。

梁家的房屋坐落在建筑研究所院内，而建筑研究所又在国立博物馆大院里面。李庄的镇边，就是稻田，四周有石砌的小路。梁家的房子正在山脚下树丛之中，小山顶上是水塔，山坡上布满柑树和红橘树。四川的地理环境使这座小城很少见到太阳，经常是云层笼罩在头上，晚间则淅淅沥沥地下小雨，因为常年潮湿，又显得很脏；有一股潮湿的尿臭，象云一样弥漫到处，甚至整个四川都是如此。

在建筑研究所的内院一端，一间大屋子里，有一

打年轻的制图员在工作。徽因就住在同一个院内的另一间大屋里，她可以听到制图员们屋里的动静。通常她到制图员们的工作室去时，大家工作就紧张些，要徽因给予指点，工作的进展显然不如工作室的声音那样大。

中国传统的学者们退休之后，通常都住在农村大自然之中。但是，这些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们这样做，却是捏着鼻子不得已的。逃难到四川的经历已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现在所过的完全是农民的生活。挑水，吃粗粮，冬天至多点个炭盆，没有冲水恭桶。日本的轰炸如同后来毛领导的农民叛乱一样，使他们农民化了。

梁家的生活从来都是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现在由于生活水平的降低，也许使那些矛盾简单化了一些。首先是佣人的问题。由于工资太贵，多数都打发走了，只剩下一个女仆，她耳聋但品貌不错，为了不致使她伤心，把她留了下来。事实上，思成要自己做饭，病床上的夫人则充任他的指导。其次，各人的特性不同，老太太——徽因的母亲——脾气古怪，不断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思成喜欢吃辣的，徽因喜欢吃酸的，等等。第三是亲朋。我刚抵达，就遇到一位来访的飞行员，他是徽因的弟弟（也是飞行驾驶员，被日军击落）的同事。我离去之前，思庄（思成的妹妹）从北京燕京大学，经上海、汉口、湖南、桂林这条路线刚刚抵

达，她与思成已经五年没有见面。

徽因很瘦，但当我在时，显得还很活跃，凡事都照例由她来管，别人还未想到的事，她先想到了。吃一顿饭很费事，用很多时间，饭后，我们谈天，通常都是以她为主。晚间，从五点半以后就离不开烛光，或是菜油灯；因此，八点半就上床睡觉。没有电话；有一个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却没有咖啡；毛衣不少，但都不合身；有床单，却没有肥皂去洗它们；有铅笔、钢笔，却没有纸张可供书写；有报纸，却经常是隔了好几天才送到。这种拮据的生活就象一个人每天对生活打一个洞，从中掏出一点东西，此外就没有别的了；结果就是一种碰运气式的生活。

我住了一星期，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因重感冒而躺在床上。我为我的朋友们以坚韧的精神从事学术工作而深受感动。如果美国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早已丢开书本而去设法改善生活条件了。但是，中国这个训练有素的社会接受农民的原始生活方式，同时还照常进行工作。学者在社会结构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角色是根深蒂固，不可改变的，如果我的这些朋友们背离了这种观念，为生活需要，在业余时间里干木匠、砖瓦工、水暖工的工作，这就打乱了社会秩序，就会使他们成为人们非议甚至攻讦的对象。

在继续前往一座荒僻的山寺，访问傅斯年的图书馆之后，我又旅行一百五十英里返回重庆。但在宜宾等待去重庆

的江轮，有一个下午的空暇。于是，

我去寻找当地的传教士们。当地浸礼会的领导人是J·C·詹森博士，他（当然是）来自南达科他州沃特敦附近的斯平克县，自1911年到四川。现在浸礼会有几座学校，一所医院，三十个福音堂。他每年两要次步行前往那些分散的福音堂，每天走二、三十英里，走一圈要用几个星期。他是个严谨而精力充沛的人，由于自己来自农村，他对当地农业的兴趣不亚于传教。他认为，当地农民光景不错，穷人较少，农民衣着比过去好。自中央政府迁到重庆后，几年之中，吸鸦片的人已减少百分之九十。

中国受过现代训练的、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以及首都的政府中小职员，无疑是战时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而最为生计所苦，更甚于一般老百姓。1943年1月19日，陶孟和的夫人

因突然患肺炎而在兰州死去。她是我们的朋友中首先离开人间的一位。我们原打算把徽因送往兰州，现在看来也没有多大用处。我们派去一位健壮的护士（这项工作计划已难维持下去），在困难的阴影逼近的情况下，也做不了什么。

还有一些人也开始关心中国大学教授们的生活。美国联合援华会在二十二所国立、私立大学里成立了教职员委员会，提供医药援助、子女教育和贫困补助。不幸的是，美国联合援华会的主持人宣布，该会款项也将用以补贴教授们的

生活费用，有些人反对靠美国慈善团体维持中国国立大学教授的生活。这件事在报上成为新闻，蒋介石大为发火，把它否决了。一天，在重庆，

蒋梦麟在午饭前来看我，我告他美国联合援华会的破产计划。他的外貌很象梅贻琦——颀长身材，风度翩翩，但他富于思想而不是富于感情。昆明大学界的这两位领袖都以他们的苦行主义者形象著称。蒋近年不在北大，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仅余的衣物、书籍也典卖殆尽，他的夫人要设法谋个职业，而蒋本人则拟回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他比梅的处境还算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了个职业，被发现了，只好中辍。

蒋博士向联大教职员报告，美国联合援华会援助大学教授的计划不能实施，遭到大学教职员的猛烈抗议。他们认为租借法案既然可以接受，大学教授生活如此困难，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丢脸。蒋费了很大力气说服联大教职员，不要发表抗议文字。蒋梦麟认为，问题是能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保留骨干力量，或是在战争中失去培训人材的骨干，使原来已经不振的高等教育更增加混乱。依他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受到十分严重的损害。

联大教职员还都在苦苦支撑，他们想尽种种办法维持生活究竟用了哪些办法，大概谁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触及这个战场的一角。1943年8月，我们通过私人渠道运送药物。我通

过柯里的关系，从霍夫曼·罗希药厂得到一批维生素B_1，提供给联大，当时学生中普遍因缺少维生素而患牙床出血等等各种疾病。威尔玛把药品和贵重用品（钢笔、手表）不断运送到昆明的美国领事馆，通过我们的邻居陈岱孙教授，秘密分发出去，作为薪金补贴。到1943年末，我们的研究中心选送了六位大学教授去美国。在我推动下，哈佛燕京学社对六位研究人员每人补助一千美元，对其它八位每人补助五百美元，共用了一万美元。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也进行了类似活动。

我还推动柯里去说服陆军特别服务机构，拨出五千美元，聘请中国教授向在昆明的美军演讲。为了这项安排，我与史迪威将军最亲密的助手，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多恩将军大吵一场。他是个漂亮的军人，具有艺术家的才能，但是脾气急躁，绰号叫“粉红脸”，大概是因为他脸色红润的缘故。当我向他的助手报告我的为美军安排演讲的计划时，他火冒三丈，认为非军人竟然胆敢干预到他的司令部，说我把自己看做什么人，从大使馆来的，竟敢指挥军队系统的事情！？这番话出我意料之外，我也提高了嗓门回答，拿出史迪威的参谋长签署的证件（我本该首先把它拿出来的）。“粉红脸”冷静下来了。这次争论倒使我们此后成为好朋友。

在为昆明美军安排演讲的活动中，我邀请过张奚若、钱端升，还请过军医署署长林可胜少将演讲“中国军队的作战效率”。（1937年中国有六千名医生，林动员其中一千二百人参加了军队；医院由三十所增加到七百五十所，但是医疗

器材严重不足。在六年中，他们处理了三百五十万伤亡人员。军队为弥补粮盐款项的不足，自己种蔬菜。听来就象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①，逐渐在斗争中取胜。）

1943年1月26日，我到四川省会成都去访问集中在那里的各基督教大学，这与昆明、李庄的国立机构景象完全不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都搬到华西联合大学附近。

> 华西联合大学校舍是灰色楼房，有中国式大屋顶，绿树成行，还有运动场。传教士的住宅周围有砌起围墙的花园，一排是浸礼会传教士的住宅，一排是加拿大传教士的住宅。

我见到了三十年代在南京遇见过的传教士教师如毕范宇、芮陶庵、比尔·芬恩，还有1934年在厦门见到的年轻考古学家郑德坤，他正在筹建博物馆，有一位从英国来的美术系学生迈克尔·沙利文协助他。这里有一种亲密友好的气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传教士无休止的各种会议使人趣味索然。大多数学生们都过得不错，还希望能过得更好一些。学生中，多数读经济、货币与银行，希望在通货膨胀形势下找个职业。“华西联大的三青团已经组织起来，由毕范宇担任顾问”。

---

① 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一个暴君，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接近山顶时，石头又滚下来。因此，他就永远不停地推石上山。——原注

离开了国民党首都的正统氛围之后，我开始发现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在重庆逗留六星期以后，1942年10月，我曾告诉劳合林·柯里："战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不大。……国民党可能把共产党摧毁"，"象西班牙那样的农民自相残杀"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一月间到成都后，我发现"当地人们最忧虑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战。传教士中的左倾分子认为它势必爆发，外国军方人士也认为应该由此出发来考虑问题。"当地一批士绅，在1905年前后到过日本留学的大地主，这时多已年逾六十，他们反对四川军阀，欢迎蒋介石进入四川。

> 他们拥戴蒋为领袖，但不能容忍国民党及其政客，主张消灭共产党，让四川人(地主)统治四川。

这是又一个与其它派系闹矛盾的派系。

但是，所有这些先知们都预言，时候一到，国民党在六个月之内便将摧毁共产党。

反英情绪也很强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仪态优美的吴贻芳博士（1949年以后担任了中共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表达了这种普遍的对英国希望幻灭的情绪：

> 中国人把妻小、家产送到香港、新加坡，寄希望于那里的炮台。结果英国很快就投降了，令人大失所望。英国经常说它有各种权益，却没有采取行动维护权益，偏又还坚持它的权益，这就激起中国人的愤怒。

当时的四川省主席，政学系的张群，我曾与他会晤过一次，他认为英国人与美国人

根本不同，一个是君主制，一个是民主制。他一再重申中美合作的口号，意思只是说，美国应该永远成为一个圣诞老人。

在这些旅行中，我得到各种灼见分析，使我在华盛顿的霍恩贝克风车上又一次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我向柯里提交一份关于文化联系政策的文件，请他送给希斯，再送交霍恩贝克和汉密尔顿。这是一份主张干预主义的文件，其中争辩说：

活动计划必须以政策为依据，对华文化关系未能开展是因为指导它的政策不足以应付局势。中国是一个争夺的战场，我们应谋求使我们的价值观念适应中国人的生活并取得胜利。但是迄今为止，文化联系活动只在方式方法上着眼，却不考虑最终目标。

具体说来，在我们的新闻宣传中偏重于告诉中国，美国人是怎么干事情的，陆军公报宣传我们是怎么打仗的，新闻署宣传我们是怎样生活的，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还有我们研究中心的影片和技师介绍美国的科学和技术。整个活动都是提供情况，它所根据的理论是认为美国生活方式会自行取得胜利，如果它确实好，中国就会接受，如果它不好，我们再宣传它怎样好也是徒然。

这种看法太肤浅了。它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思想的产物，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不能听凭美国生活方式去任人取舍，那样做的结果将是在全世界宣传《大街》①、我们的画报、打桥牌、美国俚语、和社会风

尚。我们并不以此为耻，但是，我们应该能贡献更多的东西。《大街》不胫而走是不够的，对于饱经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往往引起人们厌恶。我们应当以高于《生活》画报的水平来打动人心，这个更高的水平应当讨论的是价值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做，而不是我们如何做。它应当通过文学、戏剧、艺术来表达，换句话说，通过"文化媒介"。它能够打动有创造性，寻求新思想的人们，而不是那些银行家。

研究中心最近向中美文化协会的赠款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个协会是孔博士②创立的，它向现代中国提供一个大学生——买办生活方式的样板。主持人和参加活动的人多半是在美国大学里只学会了球场上拉拉队那一套的中国商人。参加这个协会活动的只限会员，对中国大学生，对那些想在《时代》杂志以外，追求更多新思想的人毫无吸引力。

对比之下，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美术展览吸引了几百人，它有一个对外开放的茶座，极力把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上的精华介绍出来。

中国人象日本人一样，可以接受我们的技术。他们吸收的自然科学再多，也未必就此把我们连在

---

① 《大街》是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斯的名作，描写一个美国妇女有志于社会改革却处处碰壁的遭遇，最后只能随波逐流。——译注

② 即孔祥熙。——译注

一起。它很可能只是使中国有了反对我们的手段。当然，我们并不想把中国变得和美国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应当抱定目标，在两国之间创立一个共同的基础。日本在发展舰队的同时，发展武士道。中国现在以我们的援助发展重工业，而它的教育部长信奉本位文化，即中国自己的文化，这种主张使人想起张之洞鼓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不能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是当地的必需，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应当提倡国际主义。

总之，我们美国人对确立我们的文化价值，即我们所称民主生活方式，显得很落后。但是，我们正处在压力之下，驱使我们欣赏它、信仰它，从中寻求能普遍适用的原理。如果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能有所贡献，我们就应该贡献出来。

举例来说，一位年轻的中国戏剧界领袖，是耶鲁大学训练出来的，现正在重庆创作剧本，他说，对俄国舞台和俄国现代生活，他了解很多，但是他对美国戏剧界一无所闻。已有两年之久，研究中心对此是否能有所作为呢？（1942年12月4日）

斯坦利·霍恩贝克在1943年1月5日作了以下的评语，它生动地表明了华盛顿的缺乏远见。

国务院政治顾问办公室

1943年1月5日

PA/H AH

我倾向于同意费正清博士的，只是开头一段的第二句话，而这句话恰巧是联系当前至关紧要的一句话。

依我看来，当前的对华文化联系活动于当前局势之下，完全恰当。美利坚合众国正处于战时，中国也正处于战时，两国在并肩作战；当前对双方来说，首要的是赢得战争（当然这不是忽视或排斥其它价值），为了赢得战争，我们要做一切能促使战争胜利的事情。当前，重要的是向中国运送物资、器材、人员等，以便赢得战争。当前相对说来，派人到中国去介绍“美国舞台”（参看费博士备忘录末段）不是当务之急。我过去敦促，现在仍然敦促，今后还要继续敦促，派这样的人前往中国，他们不仅能向中国人讲授机械、工业、农业等的原理，而且更要紧的是能到车间、矿井、田地里去改进工作，向中国人表明，最讲实际又有渊博知识的美国人是怎样干活的，他们也能向爱讲实际并有渊博知识的中国人学习一点东西，就是中国人做同样的事情或其它某些事情，比美国人省料省钱。

我注意到希斯先生的说明，柯里先生讲到，费博士希望他的备忘录只供汉密尔顿先生和我阅读。尽管如此，我希望柯里先生能同意，把费先生的备忘录和我的评论性备忘录也送请佩克先生一阅。

马克斯·汉密尔顿表示同意，并加上一句，“价值”问题应由战时情报局和美国政府领导人发表看法。研究中心主任威利斯·佩克也表示同意霍恩贝克的意见。

我以为，霍恩贝克的第一句话很好—但是—不行，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他的平淡乏味的假设，认定两国在同样地从事战争，完全忽略了现实。他忘记了我所提到的中国内部的斗争。他一再说“敦促”，的确显得语气很有份量，然而却毫无必要，要派的人都已经派出了。他把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说成是同样“讲求实际、知识渊博”，也只是感情用事，至于末一段，则是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远东司的这些评论，我是后来才看到的，它证明了我的想法：华盛顿毫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我继续考虑这个问题，并再次写信给阿尔杰·希斯。

> 过去五个月来，我一直处于温和的震惊之中，这是由于在中国代表美国的活动看来并不充分，也不适当；然而华盛顿却认为已经很充分，很适当了。
>
> 这个国家正在奋力使它自身现代化，然而它也可能更多继承历史上的坏处而不是继承历史上的美德，结果在我们有生之年里，它在世界事务中将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积极因素。可以预期，我们的对华问题将与年俱增。为了自卫的缘故，这个中国必须工业化，而且要赶快完成。要有效完成这项任务，惟有靠美国在资金与技术方面给与援助。

在今后若干年里，我们将继续卷入中国的命运之中。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组织中的一个软弱部分。有无数勇敢、智慧的中国人致力于改变旧的道路，也改变他们自己，但他们只是沧海一粟。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应该支援他们，但这将是个长期的过程。

在此情势下，对我们来说，最起码要有知识。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人是怎么回事。

大使馆太忙，顾不上人物档案的工作，国务院的人物档案更是拖延落后。

按照目前的体制，对于中国的知识大部来自与中国官员的英语谈话。这为处理紧迫事务，当然很方便。然而为研究长期性问题，这就象是用单脚跳跃的办法走路。中国政府出版一种官方的统计要览，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它每月出版，现已出到第七十二期。我说的可能不对，大使馆还不知道有这份统计要览。无论如何，大使馆官员现在已忙得不可开交，应当批评的是这种工作制度，不容许对中国出版物进行认真的研究。

有一件真正不可思议的事就是：涉及这个地区的高级负责官员，自战争以来，竟没有到过中国。有的人认为，这样的官员对他们应当了解的地区不必从事第一手接触。使人震惊的是，我所敬重的、聪敏的朋友们竟然相信，靠现有的文字通讯工具，

就可以保持对现代中国的了解。而我即便用了几年功夫，依然做不到这一点。我在中国已经住了五年，对中国的了解真正是一点皮毛。即便现在或今后能有接触官方情报的便利条件。我也不能全靠文字资料掌握中国实际情况。现在新上演的戏剧、一大批拿津贴的杂志对文化发些不知所云的议论，在小城镇身穿西装的人在日益增多。诸如此类往往没有文字记载的印象，对正确估计中国的潮流方向，都是有用的。

我们在这里的长远利益必然是鼓励更多中国人员，沿着我们指引的方向发挥领导作用。没有人认为，必须去逐一了解留美学生归国后的活动状况，但是，很显然，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是领袖人物，并构成我们在中国的主要人力投资。他们是我们与中国之间的桥梁。若没有他们，我们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就象我们与俄国的目前关系那样。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1）把文化联系活动从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来看待；（2）从研究中心直接派人来执行研究中心的计划；(3)科学地研究中国的教育（即“文化”领域）。研究中心派来的人，应当访问大学并与大学教职员建立联系。英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J·布洛菲尔德去年就这样做了。美国人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目标应是务实的干预政策，发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并给

予支援。不要听信有人所说，他们自己可以混得不错。他们现在有些人已经患病，有些人为了一家生计已经离开学术界；（4）把美国交换学者集中派到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这几个地方的四五个著名大学中去。如果军队在这里进行的是总体战，在文化战线上，为什么不同样去做呢？

世界在缩小，为此，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只靠官方机构是不够的，国务院应该从学术界物色人选，委派他们担任研究官员，为此可以设立新的官职。以为外交官可以象清朝官员那样包办一切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我们必须支援美国的利益，而不仅是保卫而已。中国的文科教育就是美国利益之所在。（成都，1943年2月）

这种广泛的看法，逐渐为玩这副牌的人们所接受，虽然未必逐字逐句都与我所说的一致。战争驱使我们在进行巨大的后勤支援的同时，也要越来越多地坚持我们的思想——若是不提意识形态的话。威尔玛在华盛顿把我写的备忘录送给一些关键性人物，使它逐渐产生了影响。

从我的非军人身份活动来说，我在重庆熟悉情况的活动使我最后得以列席国民参政会的一次会议。国民党政府于1941年成立这个组织，以示将来要成立代议制政府。它只有咨询的权力，但组成人员却的确代表了非党知识界。我的朋友，来自昆明的钱端升是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为我弄到一张入场

证，参加会议。

会场并不很大，约两层楼高，顶上装着电扇，四周墙壁刷着白灰，非常简朴。张伯苓还有其它人坐在后排高凳上，参政员坐在一边，来宾包括许多军人，坐在另一边。有许多人看上去都很精力充沛的样子，妇女也参杂在男人们中间，席次由抽签决定。

就我所看到的一切来说，我不认为国民参政会将只是昙花一现。许多参政员都似乎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认为它将来肯定会有发展。

这种想把代议制政府移植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愿望，后来不幸夭折了。把各界有识之士聚集到一起，只无非起一点联系公众的作用，仅此而已。真正有力的还是特务系统，它们能吓唬持不同政见分子、消 灭 敌 对 分子。戴笠压倒了国民参政会；而自由民主观念，也象抱这种信念的大学教授一样，逐渐没落。

六、1943年——蒋介石开始失去民心

在战时重庆度过又一年后，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了丧失权力的道路。国民党是逐步走向没落的，我的上述结论也是逐步形成的。

首先，我因为躺在床上的时间多了，因此也有更多机会来思考我对各地人们的印象。派往海外工作往往使疾病随之而来。1942年冬和1943年春，我先患重感冒，继以肝炎，最后得了阿米把痢疾。我得重感冒是和比尔·芬恩在严寒中爬上邮政卡车车顶，从成都返回重庆引起的。当时，旅客在邮袋上旅行是司空见惯的，至于我们付了多少邮费，我已忘记了。



由于没有军用飞机到来，比尔·芬恩带我去拜会邮政局长，我们于是得到了搭车许可。对于长途汽车，可以比作下午六点从纽约布朗克斯火车站搭快车，开往大海里去。有人把它比作在加尔各答的黑洞区马路中间驾车。西方人征服自然之后，又想法制服机器；而中国人则受自然围攻于前，又被机

器困扰于后。因此，有时是长途汽车载运旅客，有时则是旅客推长途汽车。

我们在清晨四点半抵达邮局，其它旅客都已站在那里，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互相猜测，谁能抢先坐进卡车司机室。其实，那没有用，能坐进卡车司机室的，只限有特殊身份的人。一直等到六点半，卡车才启程，邮袋之上堆放着八个人的行李，比尔和我，以及其它五个旅客则又坐在行李之上。天气真是寒冷，这时最舒服的莫过于有幸挨近一位肥胖、有弹性的中国妇人了。

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课程，以及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后来由比尔·芬恩任主席）都应当感谢这位胖太太，我们就因为挤近她身边取暖，才免于冻僵。

两周以后，我身上的黄疸病发作，有一星期，什么也不想吃，全身发黄。许多人，其中有很熟的朋友，也有从未晤面的人，都前来探望。我不想看这些人时，就深深叹一口气或低声呻吟两声。厨子——他是烹调毫无营养的饭菜的能手，带有鱼味的元白菜，带元白菜味道的西红柿、胡萝卜，都用黄油煮在一起——也病倒了，给他帮下手的乡下佬为做没有油的菜而难倒了，要他烧没有菜的油，倒是可以的。最后，他总算买到四只雏鸽，每只国币一百二十四元（折合美金六元）；他把雏鸽煮烂，我得以饱餐一顿。

随后，大使馆代办约翰·卡特·文森特把我接到使馆，睡在大使的床上，当时大使阁下正回国。在使馆里，我的健康很快恢复了。

写于大使床上　在大使眼中，现在我也这样看，这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城市。这座房屋离江面一百英尺，在它之上、之下，还有其它石砌房屋，都是手忙脚乱地建造起来的。各座房屋之间有弯曲蜿蜒的石阶，在屋顶与垃圾堆之间出没隐现。山坡上每一寸土地都作了改进，一切坡面都砌上了洋灰，正象大使馆和隔壁重庆俱乐部前面一样，也有树，还有洋灰砌面中间的花池，花正盛开着。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周围灰色、艰难的氛围。外国人和中国下江佬都不喜欢重庆，认为它太阴冷。大使的卧室使我对此得以分外清醒地思索。

从江对岸半英里之外看重庆，正象一堆旧盒子堆在一起。从远处听去，仿佛经常处于骚乱之中。川江上的号子声、苦力们不停地踏着漫长的石阶，从江边把石块和饮用水运上山来，还有小贩们的叫卖声，这各种声音都传到耳中。当然，我所见到的是被轰炸之后重建的棚户区。看不到一点色彩，灰色的山石上，什么也不能生长，连青苔都没有；人群、房屋、小路都淹没在灰色之中。灰色的两岸中间，夹着一条同样灰色的河流。这真是个倒霉的地方。每个下江佬都恨它。每一个本地人都似乎有一种乖

戾粗暴的脾气。

长江也不能给人什么安慰。水落时，江水从岸边退下去，露出沙滩，很快又被棚户占去一半，还有沿岸叫卖的小船。江面只有原来一半那样宽，水流还是那样湍急，渡轮驰到对岸，已被江水冲下四百码远；而上水回驶时，要呼哧呼哧半小时之久，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溯江而上，才能回到原来的码头。长江从来也不是人们的朋友。每一只下驶的木船，都要有八至十把桨，以防船撞上礁石或浅滩；回程二三百里，全靠人力拉纤。上水回驶的木船都要从大使馆脚下经过，一条条船几乎一望无际。每一条船都有一条粗绳索连到纤夫身上，纤夫们在江边乱石块间赤足前行，船上的水手则用长竿紧张地撑船。这一切动作都使人看了难过。没有一个人能对此感到快乐，成群光头赤足的纤夫，身体痛苦地前倾，几乎是匍伏在地上，哼着低沉的号子，就象灰色蚁冢中的灰色生命。睡在大使卧室里，我也更能懂得大使的心境。

我目前的计划是继续睡在大使床上，直到有人把我踢出去或大使馆人满为患再说。这间卧室里挂满了女人的照片，都是蓓蒂·文森特一人的照片。

4月间，痢疾乘虚而入，以后变成慢性顽症。美国海军军医也束手无策，感到恼火。五月间，我又到昆明访问，被批准住进陆军基地医院，医院里住满了美国大兵，由一批精

力充沛的中国护士料理着，看电影休息时还吃冰淇淋。但是，谁也不曾治愈我的病。我回到重庆后，陆军诊疗所为我注射一种德国药剂，经过一个疗程，竟把痢疾治愈了。注射这种药剂时，病人要避免活动和心力劳累，因此，每次去陆军诊疗所注射时，我都要缓慢地走上那八十九磴台阶。

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颟顸无能已日益明显，他极力加紧控制，实行个人领导，结果并未奏效，可能局面因而越加糟糕。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薪阶层的人们，营养不良，失去希望。外国观察家们开始认为左派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我的健康已经恢复，情绪也和大使馆、记者们的心情一样，由对国民党失去信任，继而对自由派的软弱感到幻灭，然后转而寄希望于当地的左派。1943年8月，我写了以下的笔记：

> 对现政权，已不能抱多大希望，因为它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积极帮助群众。如果说，它还能在民众的可悲灾祸与苦难之中维持摇摇欲坠的脚步，那只是因为敢于对它动手的人太少。

1943年舆论的变化，一半可说是天意（政权失去民心），一半则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所促成。1943年初，我便曾描述那些起作用的因素，首先是严密的新闻检查，使美国人通过有色眼镜来看中国。

> **1943年2月5日**　美国的幻想破灭即将到来。中国官方关于英勇抗战的宣传正被美国观察家们戳穿。美国观察家们发现，中国虽处于战争状态，却不在作战。整个国家还未动员起来，因为动员机构还未

建立。中国在海外进行的宣传是十分危险的虚伪编造。

为了支撑中美关系，1943年3月，蒋夫人前往华盛顿，在参众两院会议发表演说。她的漂亮出色的举止和打动人心的演说，赢得巨大好感。这使自由中国的肥皂泡吹得更大。3月10日，我的笔记中记道：“中央社对蒋夫人的推销术大事报道。”她回重庆后不久，我去看望她，所得的印象是：她的骄傲使她时刻在演戏。

1943年9月16日，于重庆

和伟大的夫人相处的微不足道的一小时 我刚在一小时谈话后回来，带着好坏参半的印象。既然别的许多人能得出他们的印象，我就来记下我的印象。总括来说，她极力想表现为一个伟大的夫人，谈话过分矫揉做作。她是个演员，有许多可羡的长处，很有吸引力，直觉反应很快，也聪明，但在这一切掩盖之下，她在感情上并不幸福（我发现妇女，尤其是美丽的妇女，往往不幸福），有些事情使她怨恨，她对弄虚作假地表演似乎有一种嗜好。她的表情经常是美丽悲伤，说话腔调抑扬顿挫，有时还特意停顿一下，以取得戏剧效果；但偶尔也真笑一下，圆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她的嗓音很尖，但倒很自然，这就更显得其它一切都是可悲的做作。

我由陈小姐（她的英文名字是珍珠）引领，经

过许多宪兵，他们都向我行礼致敬，最后到一间小屋，墙上挂着泰戈尔像和熊猫画像。过了片刻，她从楼上下来了。我解释说，我正致力教育美国人，使他们认识中国。我对昆明美军的情绪表现，感到担忧，为此组织一些演讲会，收到一定效果，但需要做的事还很多。她直截了当地问了几个有关问题，然后转而问我的经历、与中国的关系，这都是我早有准备的。然后，转到一般性的话题，如怎样教育美国人不要崇尚物质。我看到我们的大兵，以洗澡盆与电冰箱的数字来衡量中国，这也可说是唯物主义的表现。我先用了这个词，她接着就指出在美国，这种唯物主义十分时兴。（我想，通常对美国的不满来自这个事实，美国人他妈的，有这么多东西，比任何人都多；换句话说，这是出于嫉妒的不满，它所找到的题目就是美国人讲唯物主义，而美国人也的确崇尚物质）。

从这里，我们想出一个好主意——让研究中心收集中国留美学生对美国的反应：他们第一个感受是什么，第一次生气是为什么？他们第一次感到敬重美国是什么时候？他们第一次感到受屈辱是为什么——要趁这些留学生还有新鲜感时收集这些个人印象，不要加油添醋。她认为，这些材料可以促使美国大兵们思考。至于怎样能引起美国兵对这问题的兴趣，我就不去问了。

然后，表演又继续下去，在广泛无边的话题中插进一点暗暗的心眼。我提到新闻检查，她把话题岔开，凝望着远方，谈论人生就是把理想和幽默感结合，以不断应付眼前的情势。她还说到，我们都是在一场伟大的试验中当演员，谁也不知结局如何。如果她不矫揉做作的话，我也许还可以保持初见时的好感。当时，她正打量盘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人，他想要什么，他是帮我们忙的？还是拆我们台的？等等。

她显得疲惫，有点象老年人通常易有地那样颤动着头。我的印象是她对许多事情都不愉快。尽管发了些哲理议论，她对中国的落后，物质、精神两方面都落后，而且互相拖后腿，还是束手无策。她对沟通中美了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我也没有），只希望靠一些譬喻、比较，能激发美国人思考，而后就突然觉悟，对中国有了真正深刻的认识（就是说看到中国了不起）。（我对这一项工作的办法，也只有发我的讲义。毫无疑问，战后美国向中国出售蒸气机，也将沟通中美了解，同时，夫人还可以说比喻，我还继续发讲义，从而皆大欢喜，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能长寿。）她问我，为什么不从事美军教育工作？我的回答是，首先要教育华盛顿。我仍旧认为，首要的是中国取消新闻检查，使中国的形象不靠吹嘘，而真正符合实际。

自由中国在美国靠吹嘘造成的形象，其危险就象一个气球中的氢气一旦爆炸的后果一样。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全靠它的信誉来维持，或如我们今天看电视的这代人常说的"公众面前的形象"。其所以如此，又是因为它的浅薄，只重表面。

1943年2月7日于成都 人们很难理解，在这片土地上，有那样多的老百姓，而统治阶级，以及乡绅只是那样一小撮。农民与乡绅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只不过是很薄的一层，其中包括维持现代社会运转的一小批人。现代中国的物质装备也很单薄。如果当权者把中国与世界隔开，不消几年，所有装璜门面的现代化道具就将一一消失。

四川省主席几乎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可是，与衣阿华的任一个公司经理相比，他没有一个象样的秘书班子，没有那样多国外消息，要旅行的话，一天只能走几英里，无法更快。他既没有一架得心应手的统治机器，也不需要法律事务顾问，也没有民众代表需要认真商量，因此也没人批评，对全省财政也没有详尽预算或审核开支的制度，如果，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他从事调解，此外的各种问题，就由它们去自生自灭。

上述评论是追随托克维尔①在中国的写作传统记下来

① 阿历克西·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旅行家、历史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访问美国一年多，于1831年发表《美国的民主》一书，分析介绍美国社会，被认为是一部传世巨著。——译注

的，在我之前，已有几百个外国人这样做过了。我的印象则是来自阅读、教学、观察，使我有了现在的这些看法。

问题的实质可从教育部力图控制各高等院校的课程内容一事得到说明。教育部发出命令，某些课程应在大学中讲授；然而讲授这些课程的教授则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教。关于教育部应该独断，教师应当服从命令，这些原则都没有人提出异议，只不过对命令没有服从而已。因此，双方都向现实妥协了，它使要办的事情毫无效率，而且日益如此。即使教育部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也没有把握能行得通。情况继续恶化，以致变成一个对个人忠诚的问题——教育部长要做某件事，他的追随者和朋友们遵命去做，至于其它人则尽量不参与。

我的印象得到其它外国人的印证而加强。我们这些外国人逐渐形成相近的观点。有一位自辛亥革命前便从事传教工作的老资格传教士丹尼尔·戴伊告诉我说：

1937年战争爆发以后，头三年里，学生的热情很高。歌咏运动成为一个群众运动。这是中国精神振奋的时期，也是西方所知道的中国。珍珠港事件前，戴伊先生回国度假。一年后他再到中国时，发现那股热情开始消沉下去。在过去一年中，情况又进一步恶化，思想界不再有什么生气。CC（陈氏兄弟）派和其它政府官员害怕，如果群众运动不予遏制，它将横扫全国，最后，把他们也横扫掉。局

势使人灰心丧气，这是芮陶庵最近访问十七所高等院校后所得的结论。

政府的处境越不妙，它的领导人便越发严密戒备，感到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现在，大家都知道，三十年代时，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蒋介石得到鼓舞，也仿效法西斯，建立起忠于他个人的年青官员秘密组织①。三十年代中期大事宣传的新生活运动便是这种暗中力图吹捧个人，重振革命的公开表现。陈立夫和他的兄弟陈果夫以中央政治学校为基地，极力把国民党员过去对孙中山的崇奉转为对蒋介石的崇拜。

陈立夫的活动标志着中国由家族统治的政府转变为一党专政。无论两者之中的哪一种，都建立在下级对上级的个人忠诚之上，从最基层到最高领导都是如此，最高领导一个人便是无上权威。从前的皇帝往往起用后妃的亲戚——那些人完全靠皇帝支撑——而把亲兄弟视作仇敌，严密监视，党的新领袖们所依赖的是党部人员。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领导着国民党内的CC派。他们两人和蒋介石是浙江同乡，他们的叔叔陈其美又是蒋介石的恩师，也是他们两人的提携人。三人间几乎亲如一家。陈果夫在黄埔培训了七千人，充当国民党的骨干，这七千人成为陈的个人权力基础。他再进而仿效列宁，把国民党组织起来。1927年与中国共产党分裂后，他知道要杀的是哪些人，也知道把谁埋在哪里。陈果夫在国民党组织部和培训公务人员的中央政治学校里成为最高领导。

---

① 参阅劳埃德·伊斯门《夭折的革命》一书。——原注

1943年我到中央政治学校去作过一次演讲，那里环境优美，秩序井然。

陈立夫比他的兄长小八岁，比蒋介石小十三岁。他于1925年在匹茨堡大学获得采矿工程硕士学位，是个真正由美国训练的留学生。他在美国甚至参加过矿工联合会。但是，反革命的形势把他召回，1926年，他在广东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从1928到1938年，他主持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从事搜捕、消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党分子，戴笠是他手下的人。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也正如J·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校长，同时控制全美各大学的预算一样。

1942年10月，我拜访陈立夫之后，以不带感情的笔触，向大使报告说：

> 他十分和蔼可亲，向我介绍了竹子在中国的各种用途，还背诵了一些古代神话，表明中美之间交换教育资料，可以使中国文化注入美国中小学教材之中。我告诉他，公众对微型影片的广泛兴趣，和副部长顾毓琇博士（原清华大学教务长）正率领一个小组，进行这项工作。部长对缩微影片似乎不甚了然，他问我，投影机除放映外，能不能拍摄影片。

一年以后，我与陈立夫作了一次较长的谈话。

致大使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3日

题目：与教育部长谈话纪要

我经·M·H·蒋博士（以前是我的学生，考博士学位时，我未予通过。他与陈立夫是连襟。）安排，昨晚到陈立夫官邸去拜访，我是以他主持的国际文化服务社顾问的身份前去拜访的。我们就文化关系的各方面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使我失望的是，陈先生的健康状况与精神都十分好，举止动人，一如往常，但对教育问题只有一种幼稚的热情。

他询问了微型影片工作的进展情况，还问到战后，微型影片是否还会广泛应用。他认为，学者还是宁愿要书，可以带回家，可以躺在床上看，可以在书页上写评注、做记号。我告诉他，持这种见解的并不仅限于他一个人；但是，近年来，微型影片日益推广，因为便于携带。对此。他表示同意。……

然后，陈立夫对美国教育影片表示很感兴趣。我告诉他，据我了解，文化联络处现在就有教育影片，随时可供中国使用。他还对动画片感兴趣，认为它比人体动作的表现能力更为丰富。他表示担心的

是，电影放映机结构复杂，在中国维修不易，问我是否能有一种不用电力的投影机。他希望搞到八万部这种投影机，在中国八万个农村中放映图片，介绍世界。他主张利用每星期日对老人和青年进行教育。我记起去年谈话中，他曾问我投影机除放映外，能否用以摄影，因此，我没有细问他所说的投影机的具体性能，只是提醒他，有一个盟国影片图书馆及它的各种活动，他似乎对此不甚清楚。

从这次与前次谈话，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位教育部长对教育的兴趣及理解都十分肤浅，似乎他难得有什么时间来考虑我们讨论中涉及的问题。

J·K·F·（费正清姓名缩写）

三月份时，我还注意到

通货膨胀这场消耗战的继续发展，驱使政府日益集中力量去维持它的权力。新思想、改革计划等都成为次要的事情。因此，正如一个朋友所指出的，委员长已把CC系统看成应付内外打击的一股核心力量。CC系统的兴趣只在于抓权和强化控制，保持权力。他们没有进行重大改革的能力。他们手下的人是一批唯唯诺诺的小人，都不是心怀大志的人，对他们的职责也没有多少热情。加强组织控制，并不能赢得公众的敬重。因此，CC派使党自称为奉天承运的基础日见削弱。党一旦遇到危

机，在党外没有朋友，党内则充斥着一批机会主义分子。

委派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是加紧政治思想控制的一个步骤，它当即引起北京来的那批开明教育家的不满，他们对国民党本来就不抱有多少热情。蒋介石拒绝美国民间通过联合援华会资助国立大学教授，在蒋说来是为了维护国家尊严，而它暗中的含意则是告诉昆明的教授们：由你们挨饿去吧！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打算加强他的领导地位，结果只是使学术界更加疏远。举例来说，蒋介石针对通货膨胀的情况，企图以一纸法令来稳定肉价。它只是一具空文，李济和我谈天时说：

委员长自己出面来稳定物价，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仿佛他个人出面呼吁就能改变经济的规律。我的娃向的学生说，他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肉，也没有食油了。我家里的肉都是黑市上买来的。限制肉价法令只不过是使得市场上见不到肉了，养猪户都在暗中等待肉价上涨。李济说，老百姓都在挨饿。他的两个孩子在近年中死去。陶孟和夫人也去世了。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如果全国各阶层都一起吃苦，知识分子真正在思想上动员起来，挨饿也没关系。但是，他们目睹高层人士的挥霍浪费，社会上触目的不平等现象，许多知识分子感到苦闷，其中有的死去，其它人就成为革命分子。

1943年5月，我到昆明时发现，最高掌权者所著《中国

之命运》，在教授们眼中是对著述事业的一种侮辱。

这里对委员长自命圣贤兼英雄，抱着强烈的反感，并且在我面前毫不隐讳。老秦对《中国之命运》不屑一顾。社会科学家们把这本书说成是废话，又讥讽它，又为它感到可耻。学者们不会也不肯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殊地位，而现在蒋介石却当众侮辱了他们。

昆明，5月17日 对《中国之命运》我必须说，多读一些之后，我实在为之吃惊，从未见过为某种政治目的而如此曲解历史的。这本书的大部分都是以叙述历史姿态出现的，讲中国在帝国主义欺压下的灾难，帝国主义是一切罪过的根源。例如，由于根根条约开放的商埠在法庭审案时的坏榜样，使中国的法制不能发展等等。这本书只是个小册子，政治家写这种小册子实在太不象话。现在我才明白，何以与这本书英译本有关的每一个人都象是在发寒热。

可以猜测一下，发表《中国之命运》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顽固偏执，它自有其政治用意，就是要人们看到这个党和委员长是把帝国主义恶魔从中国赶走的英雄，同时，借重燃排外主义，以引起爱国心和促使内部团结。

这里的教授们都心情沮丧，认为中国将实行警察统治，开明的大学教育将被扼杀，经济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都将受到控制。他们认为，没有力量能阻

> 挡这个进程。我则认为，这个政权即便想这样做，也没有可供驱使的人员。结果要求加强政治控制的政府与要求国家发展的民众将达成妥协。

美国对自由中国的幻灭感起于1943年夏，它因为三篇文章接踵发表而触发。这三篇文章是：5月10日，赛珍珠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尔温在八月份《读者文摘》发表的文章和T·A·比森在太平洋研究学会出版的《远东综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远东综览》发行份数有限，但它在中国颇受重视。比森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而国民党是“封建的”。鲍尔温与赛珍珠的文章不涉及意识形态，而只是试图如实地估价中国的局势。鲍尔温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反映了昆明美军长期以来的幻灭感。赛珍珠则对蒋夫人惯用的夸张言词毫不容情。蒋夫人在美国是罗斯福总统的上宾，而她的举止行动就象一位骄横无礼的公主。赛珍珠因她的小说《大地》获得1934年诺贝尔奖金而成为美国的著名中国观察家。她曾告诉我们一个有代表性的插曲。一次，蒋夫人的侍从由海德公园紧急打电话给她说：“夫人要见你，请立刻就来。”赛珍珠从宾夕法尼亚州的珀卡西镇匆忙前往，及至到达后，却发现夫人并没有请她来。原来蒋夫人要找的是她的随从陈珍珠。一声“对不起”，就把她打发走了。

我重述这个小故事是因为类似的事件太多了，它足以表明一种自我毁灭的自我中心主义。我有时想，一个人滑冰，当冰层很薄时，他在心理上会力求快点滑过去。一个人处于

朝不保夕的局势下时，会寻求过分的心理补偿。

蒋廷黻曾以他惯常的直率口气告诉CC派的新闻部长：“在一百篇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有半打文章尖锐评论中国，不必大惊小怪。”美国人认为：你给我，我也给你，这是常理。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才是造成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有更多真实的情况报道出去，就可以纠正错误不实的报道。”

在1943年7月，我对于中国在宣传报道中吹肥皂泡有自己的分析：

> 中国对西方宣传中所作的有害的粉饰太平，不过是任何中国政权在国内粉饰太平的必然结果。新闻局和董显光（新闻局长）并不打算叫我们看见真实情况，至少不愿我们太多了解真实情况，以至有朝一日戳穿肥皂泡，使中国落到遭人嘲笑的地位。他们无非是在应付眼前的压力，其中主要是政府靠威信来维持这个传统。官员们彼此嫉妒竞争，谁也不能公开承认他的工作中有某项缺点、错误。那样做就无异于授人以柄来打击他。任何一层政府也由于同样的考虑，不能承认中国还有社会罪恶问题，因为政府或它的领导人要为此负责。我们把自然界造成的问题与人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加以区别。中国的传统却有所不同。人们与自然同属于自然—社会—伦理的统一体。当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问世时，中国的皇帝还因淫雨成灾而向天叩

头，颁罪已诏。如果他不承当这个责任，他就是渎职。

但是，到这时候，各种补救办法都为时已晚，天命（实际是公众的信任）已经变了。于是，我便着手对局势何以变化作详尽的分析。以下便是我当时所作的临床诊断：

我们应当了解，中国有两个习惯：（1）政府垄断了一切组织。任何组织都必须从属于政府，否则，就被认为是政府的对手，是危险。历史上，非政府组织只有秘密会社和各行业的同业公会。但是，人民中产生的组织，其中埋藏着大量炸药。政府只不过是由行政和司法官员组成的薄薄一层，处于民众之上，又被千万民众把他们彼比隔开。他们所仗恃的不是实力，而是由于当权享有的权势；因此，任何新的组织能够指挥民众运动就构成一种威胁，必须在它出生之前就加以反对。这也是因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成员对领导人的忠诚就象公民对统治者一样；一个新的组织就有一个新的领袖，他事实上成为现有统治者的对手。其结果是，长期以来，任何新组织都得从属于政府，1898年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如此，去年刚成立的工业合作社运动也是如此。

现代社会总要有运动和全国性组织，于是官方就组织了新生活运动和蒋夫人主持下的妇女组织。但是，这些东西之存在，既是为组织、领导，也是

为实行监督。因此，它有两副面孔——一面是西方意义的运动，从事教育、领导和宣传；另一面是防止非官方控制的对抗性团体的滋长，以免它们威胁到官方对社团组织的垄断权。以三青团为例，在一些大学里，被用来推行某些活动，在另一些大学里，则被用来阻止某些活动；总的说来，是被用以监视各种活动，因此，西方人把它称作一个谍报组织。

（2）在中国，进行批评不是一桩好事情。中国社会是由各种各样个人关系交织而成的。在这种背景下，对事物进行批评，不会被人们看作是对事物表示不同意见，而是被理解为对某人进行批评。这就引起了复杂的“面子”问题——如果某人在一些人心目中失去信任，很快，其它一大批人也对他失去信任。而失去信任对一个人来说，就是直接的威胁，无论他是皇上，政府官员或商人。在中国社会，许多位置都是靠信任来维持的，通常这都是对个人的信任。因此，如果你进行批评，它马上就变成另一个问题：你是否还对之维持信任？外国访员对中国局势任何方面加以揭露，很容易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糟糕的是，我们西方人不懂得这一点，或虽知道却嗤之以鼻，认为有批评才有进步。中国人则很难提出任何批评，仿佛它比淫猥举动还更坏。

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各省。毕范宇去春旅行访问了九个省份，会见了省主席和二

十位县长。他指出，国民党与政府简直难以区分，因此要想借区分两者来保住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一个乡里，小学教师就是乡党部的头头，在一个县里，县长就是县党部的领导人。在地方上党政不分，在重庆，也是一样。这种由党垄断一切远超出美国人所能设想的，由民主党或共和党永久执政，另一党在野，伺机取而代之。这是一种结构上的安排，其它小党根本没有地位也没有执政机会，除非是根本改变这种体制，或是削弱这种体制。

我的政治分析无疑对美国的政策有可参考之处。如果我判断1943年国民党已失去民心是不错的话，那末，1945年罗斯福死后，赫尔利大使把美国旗拴到国民党这艘船的桅杆顶上就不仅是徒劳，而且是灾难性的决策。事实也证明了，它确是如此。

在1943年，我还继续作了如下的分析：

我认为中国的进步有两个基本障碍，但它们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一个障碍是缺少好人。在能够升到顶层的那小批人之中，只有少数在思想或品德上有真正的活力。能力和诚实、勇气是两回事，勤奋、真诚也不能象在美国那样，使人得到事业的一定成就。生活要靠花言巧语、阴谋诡计，在这里比其它国家更甚。品德若不与狡黠结合，仍将一事无成。美国的伟人们照着练习簿上的格言去做，在美国可以出人头地，在这里却会还未出世，便送了

命。华盛顿将永不可能偿还那棵樱桃树的债务。因此，每一个行政负责人都苦于找不到既能干又诚实的人来共事。这里所提的诚实与我们惯常理解的不同，它意味着勇于负责、大公无私，而不是假公济私。

另一重困难是宗派主义。要象我们那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任何一件事，至少就目前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不会去关心全国性的政策问题，除非有传统的个人关系。首要的问题是生存，而在政治上维持生存就要靠有用的个人关系。至于西方人所理解的政治问题，诸如国体、政制、国家利益，都被看作是奢侈的次要事务。

中国的民主前途如何？就个人主义盛行这一点来说，可以认为这个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有一定的流动性，强悍的人可以凭本事，由默默无闻而飞黄腾达，这可以算作民主。

君子要凭德性赢得别人尊重。这种个人主义也算得上民主，凭一个人的功绩或品德去衡量他。

但是，一涉及政府机关，这种民主风习就说不上了。政府官员继承了“满大人”的传统，“满大人”的权威是无止境的，除非环境不许可。他为推卸责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对他有约束力的，一是上级官员，二是怕老百姓造反。在这两者之间，他可以为所欲为，除非后来出了事情，他才遭到物议。

今日的许多官员都是专制分子，部分原因是人

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当我象征求学生们意见那样，征求我的中国秘书们的意见时，他们仍然认为我是在发号施令，不过认为我很有礼貌，做出征求意见的样子，因而他们也尽量显得有礼貌。

中国传统的专断政府，使当代极权主义更加强了。蒋介石对联大教授的侮辱接连不断。将近半打左右教授在应邀访美之前，必须先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者在那里受训五、六周，内容包括体操、纪律化的每日生活以及作华丽空洞的演讲之类。”

1943年夏初是人们心理上的转折点。7 月间，我再访昆明并且作了报告：

最近一轮联大战斗　5 月间，联大教职员举行会议，推派两位代表到重庆去请求增加生活补贴，结果仍然是一场空。他们提出几项要求，其中之一是米贴的一部分按市价发给现款。官价米每担九百元法币，而市价是二千四百元；这样，教授们可以得到比较名副其实的米价补贴。另一项要求是薪金按当地物价调整。在昆明，据说物价上涨了三百倍，而薪金只增了五倍。

这场斗争的焦点是：联大能否打破教育部用以扼杀他们的理论，那就是：对全国所有国立院校应当一视同仁，薪金不能因地而异。到现在为止，陈立夫还是占上风。

另一项建议是：昆明的大学利用实验设备，生

产一些市场上急需的商品如电灯泡、真空管；为此需要一笔开办费。孔祥熙博士答应垫付三百万元法币，据说委员长也已批准。但是，在行政院讨论时，陈立夫提议，对所有国立大学都应同样待遇，预算需要一千七百万元，而其中联大只能分得八十万元法币。部长的这一手足以使人确信——如果他们以前还不曾认清的话——CC派决心摧毁联大的教职员工。许多教授宣布，他们对当局不再负有任何义务，只要能生存下去，有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

8月下旬，继访问昆明之后，我又访问了当时美军前进基地广西桂林，这也是各省当局与重庆保持距离的一个例子。桂林的文化界十分活跃。我在昆明所观察到的激愤情绪，在桂林又再次得到证实。我在桂林时，有一部分时间与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住在一起，有一部分时间与战时情报局的格雷厄姆·佩克住在一起。在重庆以外这些地方的知识界舆论，更加公开反对国民党，但是，大学还没有被动员起来的迹象。在桂林市郊，我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理研究所，"都在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的杰出领导之下。他是这个国家创造出奇迹的少数优秀分子之一"——有大楼、茅屋、发电厂，能制造化学药剂和精密仪器等（李四光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许多学者在等待新的机会。在昆明，我见到了"周培源们，他们是可爱的清华人；周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和他的同事正准备前往加利福尼亚，与米利肯① 一起工作。"

在桂林，我遇到原在香港大学担任生理学教授，曾获罗兹奖学金的澳大利亚学者林赛·赖德，他这时是英国军援团团长，上校军衔，负责主持由香港经"地下铁道"传递情报工作。我帮助他与美国战略服务局之间建立起合作利用各种出版物的关系。（战后，他主持香港大学校政。我们成为好朋友，我曾几度在他的副校长住宅下榻，从那里可以看到在山坡上的整个校园。）

9月中，我写信给柯里说：

清华、北大那些受美国教育的开明自由派，最好地体现了美国的制度与科学标准，但还未能向中国提供任何动力。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中共问题。对此，清华、北大的开明派教授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他们说不清，希望推动国家朝哪个方向发展。他们在十分耐心地等待，盼望有朝一日，当年那种开明教育的好时光又会重来。而那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我花费更多时间考虑，如果我来作主，对中国这种一团糟的局面该怎么办，我的结论日益趋向于我也会采用中共的做法。如果不激烈，便不能打破这种局面。

1943年9月22日，我再次写信给柯里说：

真正想战斗的人必定致力于发动群众。我们的作战政策应当是给他们一定的支持，从而进入华

① 米利肯，现代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译注

北，作为革命的朋友。当前首要的是，向北方派出观察家。我希望约翰·P·戴维斯①的主张能够得到采纳。(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前往延安。)

知识分子开始被遗弃，与他们有接触的外国人很快就感受到这一点。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走访了一些关键性人物，把我的印象向使馆书面汇报，并寄给威尔玛，在华盛顿散发。

作家、艺术家与官员之间，最难以互换位置。然而，作家和艺术家历来要靠官方支持才得以生活。自1938年第二次统一战线消沉下去以后，许多有创造才能的人被安排在重庆，有个挂名差使，领生活津贴。这一批之中，为首的是多才多艺的郭沫若。在名人字典里，很恰当地介绍他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创造社领导人，中共宣传家”——真是一个文艺发电厂。他原在日本学医，二十年代在创造社时，以惊人才华名噪一时。他成为共产党人，帮助了北伐，然后于1927——1937年间在日本从事考古研究，以此在西方学术界也享有盛誉。1937年7月，他逃离日本，得到国民党接待，在军事委员会里主持抗日宣传工作。两年以后，他被排挤出直接的战事工作，去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事实上是用栅栏圈起一块地方，把

① 约翰·P·戴维斯是当时美军在华人员，主张与八路军建立联系。——译注

一些名作家拘留起来，以免他们前往延安，那将成为统一战线的灾难。委员长派人劝说三位著名作家、学者胡风、茅盾、沈志远从香港到重庆。为把胡风留在重庆，每月给他两千元津贴。……当局认为，让他们完全自由行动，自由写作是不适宜的。

9月间，我驾车前往文化工作委员会夏季办公使用的农舍。

我们受到郭沫若和他的主要同事的接待，举行了一次宴会，喝了几瓶好酒，大家感到很亲热。我送给他全套缩微影片目录和我们研究中心的缩微影片工作介绍，这时已有很大规模；还有美国对战争所作努力的缩微影片目录，它使这里的研究人员很感兴趣。我还送他们一架放映机，并安排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使用我们的各种设施条件。

10月间，我应邀参加郭沫若的五十寿辰庆祝会：

我把霍尔特公司的比尔·斯隆也带去参加。那幢大楼楼上是英国大使馆，楼下是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有楼里的老鼠和特务们。这个宴会十分热闹，各个房间里都挤满了人，那些清秀颖悟的人，可以令人看出，他们正好适于做现存社会秩序的评论家。郭先生周旋其间，看上去既欢快又温柔，象往常一样年青，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宾客们多数是参加苏联大使馆招待会——当时是重庆唯一的公开活动场合——的那批人。他们在各房间走来走

去，看墙上悬挂的照片和郭沫若著作的展览。展出的郭沫若著作有六、七十种，包括各种内容，真是惊人。墙上挂的照片中，有郭在日本时的照片，周围六个孩子，相貌和现在跟着他的两个孩子都不同。现在这两个孩子的年纪还赶不上战争的年纪呢。参加庆祝会的这些人，看来都应当是有热情，有能力的，特别是假如先让他们吃两顿饱饭的话。

为祝贺郭的生日，我送他几片刮胡子的刀片和一些磺胺止泻药片，既无艺术，也无文字，他很友好地表示答谢。比尔·斯隆告诉郭，在美国，四分钱可以买一本书，等等。

在革命以后，郭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小说家茅盾被任命为文化部长。

1943年10月，我有机会与茅盾作一次谈话。

他的上唇留着短须，看上去很象日本人；瘦削，谈吐和蔼，但不是很有风采。他本名沈雁冰，笔名茅盾（意思是“矛盾”），大概是现存的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说，现在翻译的作品出版很多，可能是因为在出版审查机构易于通过的缘故。即使是翻译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受到删节（如雨果的作品就受到删节，等等），但是靠翻译还较易糊口。如果想以写作维持生活，一旦文章或短篇小说里有什么错误思想，立刻就影响到饭碗。他所认识或所知道的每一个作家，都以出版检查和特务为苦。他表

示从来都支持国民党，只是认为对孙中山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现在的国民党人并不完全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孙的思想很开阔（我同意），应该容许人们有解释孙中山思想的权利。

为更全面了解重庆的政治风光图，我又在11月19日访问约翰·杜威在中国的活跃信徒之一，陶行知博士。

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读于伊利诺和哥伦比亚大学。1938—39年间，他到国外讲学。在此之前，他主张：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有限知识传授给别人，并就此进行实验。大约1933年，他在离上海不远的大场主持一所学校，发动小学生回家教农民父母识字。这个主张传播很快，周围二十五个村庄都很快推广了这种做法，有几千人对此感兴趣。省教育厅长大为赞赏，予以支持，经过一年，运动的规模已很可观。但就在这时候，省主席陈果夫把教育厅长撤换了。这个运动遭到批评，因为它虽推广识字，却贬低了教师对文字的垄断地位。如果小孩子都能当老师，那还要老师做什么？

陶先生说，在武汉时期，有几百个儿童团组织，在一年内，小先生运动发展到二十二个省份。小先生运动的理论是：每一所学校如同一座发电厂，每一个小学生就是一根电线，传导出去，唤醒群众。陶行知发起这项运动，他的学生又出去教下一代学生，已经有七代学生。因此，在这个运动中，陶先生

佩戴七星徽章，他的学生佩戴六星徽章，以此类推。

在陶的工作初期，委员长曾经给与嘉奖。战争爆发后，陶去见蒋，蒋批准他继续进行，并准予扩展。但是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阁下召见他，委派他去担任一所农学院的院长。陶回答说，他对农科是外行，对靠农业为生的农民倒可以去做工作。但是部长认为他最好去做别的工作。于是，陶在北碚创办了一所孤儿学校。这些孤儿是由蒋夫人主持的女子战时服务团或其它单位收容后送来的，如果孩子聪明好学，就教他们学一样手艺。这些经过挑选的孤儿，非常勤奋，成绩很好。我参观美术班时，有些学生正在用心地对着希腊雕塑的石膏复制品临摹素描，但画得并不比其它孤儿好多少。

这所学校当然谈不到政府给与任何补助，陶要向本地商人以及美国联合援华会等慈善单位去乞求帮助。这个人决不是共产党人，他只是想启迪民众的头脑，首先教他们识字。在当局看来，这就是邪恶。从这些事例中使人感到：这个国家的唯一希望只有靠振兴实业，削弱法西斯派的力量。如果这也失败了，那就只有指望革命爆发了。

这里择录的各种印象，仅是当时一大堆记录中的一部分。它们汇总为一个结论：到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象征，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对他的信任与忠诚。

七、发现了左派

直到1944年，美国在华作战活动只限于国民党地区；对于名存实亡的统一战线里，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只能间接听到。它的都城延安成为一种政治上的乌托邦，偶尔有少数访问者从那里回来，谈起延安时都睁大眼睛，就象饱尝了蜜瓜似的。

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交了好运，得到纽约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经理来报道他们的情况。还能找到比他更好的目击见证人来报道共产党吗？马特尔·霍尔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海军服役，以后继续是海军后备役上尉。1919年开始学中文。1938—1941年在日本占领汉口期间任花旗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珍珠港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他制订了逃脱的计划，每天练习走路，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一去不回。他穿着八路军军装，经过五台山，到达延安。当时，他脚穿中国布鞋，带了块肥皂，却无处洗澡，全身都是虱子，幸而没得大病。他报道说：

延安的人们每星期六晚跳舞，以留声机唱片音

乐伴奏。他有一次与朱德将军一起午餐，把小米饭都吃光了，当朱将军叫炊事员再添饭时，炊事员端来的却是白菜，并且告诉将军，他当天的粮食定量都已吃完了。在边区逗留的全部时间中，没有听到经济贪污或男女关系方面的丑闻。

霍尔的反应，主要有两点。首先，在共产党区域，人们思想上十分活跃，充满理想。他曾在一次学校临时召集的会上作演讲，演讲之后，回答问题又用了两小时。在那里的人们都是精华，有许多还受过高等教育。其次，霍尔发现，重庆的人们盲目自信，以为时候一到，就能把共产党一举歼灭，正如日本人以为可以一举击败中国一样。他深信，重庆的人们指望用六周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共，结果只能自讨苦吃。

与共党对峙的军队都忙于做生意，正如某些地区的日军一样；他们互相做生意。在一年前，格雷汉·佩克已经发现，河南的军官都是精明的商人。碉堡制度也是用来对付共产党，而不是为了对付日本佬。

当时，延安中国共产党的蓬勃朝气和并非做作的平均主义，并非由于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而出名。所有到过延安的人——林迈可、美国领事雷·卢登，医护人员等都证实这幅图画的真实性。于是，延安那遥远的地方就日益令人向往。

1943年下半年，我的主要成就是交上一些左翼的朋友，

他们使我在几个月内，对他们的革命事业有所了解。当时，我的健康已经恢复，又有了一个接替我工作的人乔治·N·凯茨博士，我正准备离开重庆回华盛顿。但是，凯茨还要五个月后才能到达。在此期间，我结识了重庆的少数左派分子，特别是两位非常能干的妇女。

第一位是周恩来与记者之间的联络员。周恩来是延安中国共产党和毛在重庆的代表，他象征着统一战线，而这是国共双方都希望在形式上予以维持的。周恩来的总部向外国记者们散发来自延安的消息。1943年6月，我已经会晤了许多政府部长和教育家，也涉猎了日本出版的书刊，我对白修德说，我应设法接近中共，看看他们能提供些什么。此后不久，一位聪明动人的青年妇女龚澎来看我。她当时刚担任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开始了她的才华横溢的经历。（1970年她因严重心肌梗死而过早去世。这时，她是全世界新闻界最著名的几位妇女之一。）

龚澎定期来，帮我学习汉语会话。她的个性里既有青年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采访战争消息的记者的老练观察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的重庆，周围一切都单调乏味，令人沮丧，她的蓬勃朝气却使人呼吸到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也正是开明分子反对国民党的那些事情——暗杀、压制报道、查封印刷厂、钳制

① 白修德，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著有《中国的惊雷》，介绍中国解放区的情况。——译注

开明分子的批评、禁止示威、不准罢工，等等。在斥责国民党剥夺人民自由而同时共产党也不允许自由这一点上，龚澎认为，正义完全在她这一方面。其实，她知道双方都说大话，因为她在国共斗争的阵线两方都生活过。

我曾记录下龚澎的小传：

她于1915年出生于横滨，在广东长大，1925年后到上海。他的父亲是保定陆军学堂毕业，辛亥革命中成为将军。龚澎小时候很爱她的父亲，每当父亲讲起革命工作的故事，她便听得入迷。由此，对中国的“绿林英雄”也抱有一种带浪漫色彩的兴趣。她是在上海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1928年，她入圣玛丽女校，这是由传教士创办、与圣约翰大学相联的一所学校，培养的多半是中产阶级上层家庭的女孩子，准备将来当太太的。她曾一度十分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并且喜爱英国文学。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她的名字是龚维杭。

1935年，她到燕京大学，在同年“一二九”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之一，由此成为一个信念坚定的革命者。1937年，她自燕京毕业到上海，在圣玛丽女校教书并从事救济工作。这样过了六个月，她决心离开家庭去延安。当时，正是统一战线形势高涨的时刻。她经武汉去延安。在延安，要适应集体纪律，这对她来说并非易事。约1938年底，她到前方去参加农运工作，在华北农村里度过两年游击队

生活。她从事妇女工作，帮助妇女组织起来，反对大男子主义，过着农村妇女的生活，头上、身上也长满虱子。她还一度充当彭德怀将军的秘书，对彭德怀将军十分崇敬。

1940年下半年，她与较她大几岁的一名共产党人结婚，丈夫是德国留学生。结婚刚三周便分别而来到重庆，路上跨越日军防线，走了几个月。中共原计划派她到国外，由于"皖南事变"而搁置下来。她因注射针头感染得病，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她的父亲在此期间悲惨地死去。1942年下半年，她的丈夫（两人分手后未曾再次相会）也在华北去世。她在重庆的工作是从事与外国人、尤其是新闻界的非正式联系。

龚澎经常到外国记者下榻的招待所来，手提包里装着复写的最新延安新闻广播稿。西方记者们，每天要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斗争，当然欢迎反对党方面的新闻报道。她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除去家庭生活背景以外，一部分是由于她的聪敏的性格，还因为在这个唯唯诺诺混日子的城市里，她代表一种不同的声音。她是在野派的发言人，他们的理想和方案暴露出在朝派的弊窦邪恶。还有周恩来，他是统一战线里中共方面在重庆的合法代表，也是合法的中共方面消息来源。在重庆，周的总部是统一战线暧昧不清的一个表象，他的总部是如此不寻常的一个地方，我曾对它作过以下描述：

重庆，1943年11月8日

“周公馆”三个赫然大字的图章，盖在我们的送稿签收簿上。

这座“公馆”是个十分有趣的地方。去那里的人要走上一条马路，通向悬崖边，路经求进中学大院，其中有十五个文化、救济团体的办事处，还有美国大使馆的附属机构；还要经过蒋介石公馆、行政院，马路尽头是一幢白色的房子，那是戴笠公馆。从马路尽头钻进沿悬崖边蜿蜒的小巷，小巷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各种店铺、成衣匠、卖甜食的小摊等，然后再沿滑溜的石阶走五十米（这里经常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一下子就钻进了一个小甬道，这就是周公馆了。

你必须懂得这座公馆是个古怪的组合，它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一层夹一层的三明治。首先，这里有两进院子，国民党特务占了前院，共产党人住在后院；其次，两个院子之间是一座三层的楼房，底层和三层是共产党人住着，中间第二层则是国民党特务住着。这还不说，双方之间还能靠得更加紧密。在共产党人住的里院四周，有一边是三层楼房，两侧是二层的楼房，另一边是面对嘉陵江的大平台，嘉陵江就在平台下二百尺。国民党特务从他们占用的二层楼可以走到里院两侧的二层楼楼道上来，还可以到平台上。如果仔细谛听，有时可以听到特务们谈话，同样，特务们也能听到这一边

谈话，特务们有时还用英文说话。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并不需要走同一个门出入。前院有一个楼梯通上二层楼。所以，严格说来，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国民党朋友并不真正住在一起，可是相互之间只隔几尺远，说话声音稍大一点，就可以互相听见。

此外，共产党方面还有一个后门，通向崖下，它其实是有一套房间的地板门。这个地板门经常敞着，要摸黑小心走上去。近来，在悬崖上，紧靠周公馆下面，又盖起一座房子。周公馆后门出入的人都必须从这座房前走过。这座房子可能对支撑周公馆的房屋建筑有点用处，使周公馆不致在某个晚上倒塌下来，堕入嘉陵江；但它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完成铁丝网包围圈，使共产党的人质插翅难逃。

《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逊称曾家岩是神秘的房屋。可是住在那里的人们似乎经常很快活。有一群小鬼，过去是八路军的小战士，现在已长成漂亮的年轻人。他们经常在接待室里，有一个小窗对着前院的出入口。室内有一巨幅世界大战形势地图，俄国的战线，中国的战线都用红线标明。墙上还贴有五颜六色的标语。这些战士们有时吹笛子，有时玩游戏，发出各种声音。所有的屋子都四壁萧然，象重庆其它各种房屋里一样；有些墙上的白灰已经剥落，藤椅坐上去都嘎嘎发响。最近发动的反共运动中，对曾家岩的电力供应也减到最低限

度，因此这里就显得格外黯淡。但是，院子里的公鸡还不时啼鸣。各国大使馆还不时向这里打电话，本地的同志们还按时出版油印的延安消息，反对"蒋先生"，斗争还未完结。

我拜访周公馆去会晤周的助手陈家康，他身材瘦小，却思想敏捷，很有才华。我和他的半小时谈话里，谈论明清史的时间比我在整个冬天里与重庆其他人谈的更多。曾有两家通讯社和两个大使馆应邀到周公馆赴宴。因此，悄悄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不乏其人。我们并不担心这些共产党人象传教士那样在我们身上下功夫，倒是担心，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身入囹圄，而我们总是安然无恙的。

总之，中共在重庆还是孤立的一小批人，受压迫，谈不到构成什么威胁。他们在城区里受气被包围，但在城外一座小山上，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则由八路军战士严密守卫着，似乎可以喘一口气。在那里，无线电与延安保持联系，国民党或外国人都不准入内——这两个办事处算是第二次统一战线仅存的一点痕迹。

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我告诉他，我的任务是收集日本方面的出版物。他说，他将转达我的要求，结果并无下文。我和他谈话时，两人都不时

夹杂几个英语单词，但主要是靠龚澎在旁边协助。

后来，龚澎向我介绍了她的未婚夫乔木（乔冠华）①。乔身材很高，差不多和我一样，戴一副大眼镜，留着学生式的长头发，笑起来几乎所有的牙齿都露出来，有一种不拘礼节的幽默感。他在清华读书时，我正在清华教书。1933年他毕业于清华，得文学士学位；然后到德国杜宾根大学专攻德国哲学，193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武汉，1937—38年从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8—1941年，他在香港从事写作。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逃脱出来，1942年抵达重庆，为中共的通讯社编辑国际新闻。他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笔锋犀利，没有一句赘词。革命不仅是他的哲学，甚至是他的宗教，我曾对他说："你似乎学了极权主义"，他回答说："我是一个极权主义者"。

1943年9月，有谣言说，国民党正计划对延安中国共产党总部发动一次猛烈进攻，把它一举消灭。可是，了解那一带地形的将领们反对这个计划。重庆也害怕这会引起其它各省的反对派采取行动。当时，对周恩来和他的同事更加严密监视。龚澎和乔木这一对抱有信念的知识分子（就象美国的国内传教士那样）不再单独外出了。他们准备随时可能被捕、牺牲，这就使得与他们会晤更富有戏剧性。

---

① 在重庆，他被称为"南乔木"，以区别于延安"北乔木"（胡乔木，在1981年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两人的原籍都是江苏东部的盐城。——原注

1945年9月2日：住在上面街上的周恩来总部的共产党人，很擅于和美国人打交道，实际地、现实地谈论问题。现在他们准备随时被围困，投入集中营，可是这批人对运动的坚定信念是惊人的。他们现在的活动方针似乎是力求象美国当代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样行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是这样的人；至于运动的极权主义方面，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如果国民党愚蠢到要把这一小批共产党人置于死地，他们就准备充当殉道的英雄。我们对他们的一般印象都很好，因为这一小批人包括燕京、清华的学生，英语很好，懂得西方人的思想，他们经常进行小组学习，讨论和自我批评；生活上同甘共苦，就象一百多年前的宗教社团一样，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恰当的比拟。在周恩来他们住的阁楼里，臭虫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会渗滴屋内，但是他们的思想信念和宗教式热情毫不动摇，仿佛他们就能唤醒全中国。我们都盼望他们诸事顺利，虽然说，对中国北部的情况，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延安那边情况到底如何，他们能否支撑下去，就象消失在雾里一样，我们并未认真努力查明事实真相，譬如说，强迫蒋介石同意我们，在延安派驻一位领事。这是美国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失败，因为延安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哨，举例说，我们在那里可以搞到日本方面的出版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

在中国日益站稳了脚根，伸向四面八方，我希望来几个现代帝国主义者，真正干预中国的事务，而不是坐在圈外，看着灾祸演变。我们应当派领事和观察员到北方去，在那里修筑飞行基地，建立空中联系。重庆方面不高兴也得叫它高兴。这样做，可以为我们省许多麻烦，对中国也并无损失。

11月间，龚澎与乔木结婚不久，他们的住处就被小偷撬窗进去偷窃一空。我和乔木身材相仿，我正准备轻装搭机回国，因此便把一套1936年在牛津裁制的蓝色西装送给乔木，极力说服他收下，作为友谊的表示。他回答说："东西是让人使用的。重要的是谁用它们。我相信，你欣赏我的文章中的观点，我们的思想接近，并且在共同作战，是不是？"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中，龚澎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当时大使馆和外国新闻界的许多人都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我们的共产党好朋友龚澎患了痢疾。我告诉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他带她到海军医生那里（这是个秘密）。现在，她痊愈了，磺胺药杀菌力很强。当我把一些文件送回周恩来那里时，在街上遇到她。她正处于被盯梢，被国民党逮捕的威胁之下，知道我不愿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中共人士接近，因此，她和我迎面走过也不打招呼，倒使我吃了一惊。她和她的伙伴们就是抱着分秒必争的信念去工作和生活，他们过去在这里的生活以及在别处的生

活也就是这样度过的。

我给威尔玛的信中描绘龚澎是：

> 中共正式委派与蛮夷打交道的人，她有一种本事，能驯化我所认识的一切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同样感到她特具的热情，更不消说约瑟夫·艾尔索普，一说起她就几乎发狂；艾理克·塞法瑞德一说起她就精神焕发；菲尔·司普劳斯则是悄悄地说；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部分人；其它的人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她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在于她和你一样，善于和人沟通思想。

可是，龚澎很坦率地承认自己："我很肤浅，我的思想不深，我喜欢接触许多事情，可是都不深入。我读的书太少。要警惕成为一个肤浅的宣传家，所说的只是标语口号而没有真正的内容。"——这是很尖锐的自我评价。

另一位帮助我了解中国革命的也是个年轻妇女。她没有龚澎的魅力，也不象龚那样是个公开的共产党人，但她从更广阔的哲学背景出发，敏锐地探索中国的出路。这就是杨刚。

我在1943年中与她会面时，她三十八岁，正在著名的《大公报》担任文艺编辑——有点类似《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她说自己经历了不幸的婚姻生活，因此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于1905年出生于江西，原名杨缤。父亲原籍湖北，曾任巡抚的幕僚，后来任两湖漕运使，在北伐前甚至一度代理湖北省长。"他爱收藏古书、古画、瓷器等"，革命农民烧了他的房屋和书籍，分了他的田地，他一度被关进监牢，

后来释放出来，1939年死于四川。

杨刚的母亲是一个大地主的最小的女儿。虽不识字，却很聪敏并且执拗。她生了十一个孩子，但是家庭生活很不愉快，因为丈夫纳妾。她以信佛作为精神寄托，1921年去世。这段身世就是对邪恶的旧社会制度的控诉。

杨刚自幼在家读私塾，一直到1922年，她到南昌入葆灵女中读书，1927年毕业。次年，她入燕京大学，1933年毕业。在燕京期间，她与西语系的美国女教师包贵思感情很好。包贵思为人仁慈，富有同情心，对她的学生们、对杨刚的生活和文学兴趣都有很深的影响。她开始独立生活时，以为青年协会书局译书为生，前后译过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美国新教神学家莱茵霍·尼勃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她还在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主编的《大众知识》月刊担任过文学编辑。

1933年她在北京结婚，生有一个女儿，丈夫是个银行家。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她决定去上海，她的丈夫则留在北京。1937——1939年，她在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工作，1939年随《大公报》迁往香港。她在香港与另一人相爱，与北京的丈夫离了婚，在香港再次结婚。在此期间，1940年她在岭南大学文学院授课。1941年香港《大公报》迁往桂林。她决定随报社去桂林。

不愿为家庭牺牲事业，操持家务是十分辛劳琐碎的；现在，她与丈夫分居。她在香港的女儿一度失踪，或说是被人贩子骗卖了，现在据说又安全回

家了。

杨刚身材瘦削，清秀多于美丽，她的英语很流利，十分聪敏，热爱文艺工作。她主编的文学副刊上有散文、诗歌，她自己也写诗，写文章，出版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举例来说，她收集1942年日军蹂躏浙江情况的第一手报道被美国军事参赞认为是他所见的最好的报道。她是个左翼分子，但不是公认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中共劝她留在外面，继续她的事业，与中共没有组织联系。但是，她快离开燕京时，把名字改为杨刚——这是钢铁的特性，斯大林就具有这种特性——足以看出她献身的政治信念。

我们首次发现彼此看法一致是评论H·G·威尔斯的《中国人的展望》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8月间，她写给我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国人对生活的执著可以从多方面看出来……我们很难得有人自杀……很少有人懒惰成性……我们不会突然大幅度改变。我们善于适应，但不善于吸收。……我们重现实轻玄想，……所有这些都可从经济背景中找到根源。

"依我看来，如果上述分析不错的话，它们是必须予以改变的……懦弱、无所作为、吝啬、缺乏创见，庸俗的实际精神而不是有想象力的现实主义，折中妥协、奴才的驯顺与贵族的傲慢等等，中国人若不扫清这些东西，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自强，而第一步就要打破各种枷锁。"

这是"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代时人们的信念。从杨刚的信中可以听到著名思想家如陈独秀、鲁迅的声音。杨刚在军

阀时代成长，从旧社会里面看透了它的邪恶，因此，她很快吸收了中国近代的革命文化和革命道德。她严肃地注视着中国的旧社会和改造中国的斗争。此后，我们不时见面或通信，她总是从中国社会内部来分析知识分子扮演的错综复杂的角色，他们惯于依附权势，臧否人物，他们现在正为保持独立的人格而挣扎，但他们缺少为人类服务的理想。对我来说，这种讨论真象是上帝赐福，能找到这样一个朋友，是一种幸运的际遇。

在外交官之中，我最亲密的朋友是菲利浦·D·司普劳斯。他来自美国南方，在礼貌、谨慎和智慧方面简直无懈可击。他虽独身，却生活严谨，待人仁慈。我为杨刚争取拉德克利福奖学金时，菲利浦写信支持，包贵思女士也同样做了。1944年，杨刚得到奖学金前来美国。她能拿到出国护照，全亏得《大公报》发行人胡霖，——政学系要员——为她出力。

在谈话和通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妇女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颇为有限。她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对英美文学的知识可能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一般多。她们不仅关心物质生活的改善，还关心人的创造性表现。就对党的信任和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来说，她们是列宁主义者。但是，这方面的信念是从实际考虑而来，因为个人不可能改变社会，团结才有力量。不需要超理性的神迹，不需要童贞女怀孕生子的信条，不需要救世主的神性或死人复活。她们为向本国同胞传播自己的信仰，具备了很好的条件。

左翼人士一旦认为我持友好态度，就在我身上下功夫，

而我这方面，也对他们下功夫。这既是个人关系，也是政治活动。乔木介绍我认识剧作家夏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那里，我又结识了她的助手安娜·冯·克莱斯特·王（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炳南的夫人）。

> 孙夫人非常坦诚，她很关心最近颁布的规定：中国人没有护照，不能搭乘美军飞机。她不能离开重庆，哪怕在国内旅行散散心也不许可，更不必说出国了。她说，如果特务知道我去看望她，不知会作何想法。我对孙夫人说，我所认识的人，有些比她处境更坏（当我告别出来时，有一个男子正监视着我）。……象孙夫人这样的人，对于有人在傍晚时登门拜访，天真地想为她尽一臂之力，流露出一种默默的凄切的感激，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

（战后，据说她回上海时是搭乘美国空军司令兰道尔将军的座机。）

当约翰·戴维斯和艾立克·赛佛瑞德经历了在缅甸北部那加族地区空降活动和再徒步走回阿萨姆的历险，然后到达重庆时，我们组织一次公开宴会来发泄郁愤。大使馆的菲尔·司普劳斯和吉姆·潘菲尔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艾立克·赛弗瑞德和我偕同龚澎、乔木到冠生园餐厅大摇大摆举行一次公开宴会。

> 遗憾的是，没有别的宾客，四周的特务倒为数不少，抄汽车号码，忙个不停。龚和乔是漂亮的一对，但流露出一种准备牺牲的宗教激情。近来，他

们到处被盯梢，他们和谁说话，警察就会出现恫吓那个人。这使我想起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上海的类似遭遇，警察盯梢使她神经衰弱。两者之间唯一不同的是，这一对夫妇真有可能失踪——正因此，我们要借这次宴会示威一下。

这个事例足以表明美国方面对中国内政深感苦恼。我们之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支持共产主义。我们所主张的只是不要一党独裁，而要容纳政治上的反对派。

这个浪潮很快就使美国政策出现分裂。但是与中国天命转移的这场主要演出相较，那不过是支流。就根本说来，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进行了颠覆，从而偷去了天命，恰恰相反，是蒋介石自己失去了天命。1943年是他开始这样做的一年。

另一次政治示威的场合，是11月间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俄国大使馆是在最高的小山上一座宽敞的大厦，在使馆南北是通向市区的两条马路，从大厦里可以看到长江中间沙洲上的民航飞机跑道。爬上这座山，俯瞰长江十分壮观。不久前，俄国国庆节时，我们使馆的一帮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前去参加酒会。基辅刚被德军攻陷（随后又被苏军光复），苏联的新闻参赞严肃地向我保证，这不是有计划安排的。酒会上没有传统的鱼子酱，但有许多本地酒和糕点。参加的人挤满底层六间大屋，据说

有一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面有病容的左翼分子（左翼分子往往因为左倾而挨饿，越挨饿就越左倾）。他们兴奋地彼此打招呼，也向我们打招呼，大家都觉得，既已来到苏联大使馆，就可以比在重庆街头表现得左一些。

象这样的场合，远不是社交活动，而是政治活动，参加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政治人物。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那个身材矮小、思路敏捷象雪貂一样的人，见董显光正在旁边，就故意特别热烈地与我握手。孙科博士隔着桌子和我握手，因为我正在和王世杰（另一位国民党政府部长）谈话，就特意和我讲一大片话，表示第二天要送给我什么东西，其实那东西并未送来。还有何应钦将军也是对我这样。

我离开中国的行期越来越近，每日的工作也越来越倾向于反对派。我借用罗斯福夫人的专栏题目来记载：

我的一天，1943年10月25日，星期日。早晨起来，厨子来要求增添伙食费用五千元（现在每餐要法币九十五元），我把他申斥一通打发走了。然后上街去看我们的共党女友（龚澎），她带来一本小册子，其中共产党把国民党骂得痛快淋漓，用精白的纸张，印刷精美。他们究竟怎么能搞出这样漂亮的小册子，真是鬼知道。她给了我几本这个小册子，其中一半由她译成英语。这位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说，国民党特务认为她向外国人散发宣传品

太活跃，计划对她实行绑架，她不便过多外出。我向她保证：她的门徒们会找到护送的办法。

例如，上星期，她的姐姐（龚普生，1936年在燕京获文学士学位，194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专修宗教，曾在罗斯福夫人手下工作）抵达昆明，带着一盒药品和衣服，打算递送出去而不致被人捉住把柄，认为是共产党。于是她把东西交给《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他当时恰巧在昆明，就把这一大包东西转交给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军医。后者又搭乘陆军飞机把东西带到重庆，交给《时代》、《生活》与《幸福》杂志记者（白修德）。白修德把东西带到美国书刊服务社，然后收件人来取去了——从一切方面说，手续都是严格合法的。

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助手要来接她去吃午饭，我向这位年轻夫人的老鼠猖獗的保垒告辞，又踏着泥泞回家。半路上，一个乳臭未干的、身穿制服的特务从茶馆里钻出来，在我前面，故意慢慢蹓跶，等我走上去在他身边经过。我则在他后面，更加闲散地蹓跶，最后，他站住了，我也站住了。他环顾一下四周，折回去另找别的主顾了。

我则去探望中央研究院的一位著名学者。他明确地反对教育部及其政策，并希望我不致于完全陷于幻想破灭的境地。

我赶回家来，与谢伟思和王炳南夫妇一同晚餐。王炳南详谈了小党派的情况，直谈到十点多，因此我用汽车把他们送回去。甘肃汽油侵蚀喷油嘴的金属，使它出现小孔，我们

另换了一个（也是旧的），花了四千五百元法币。

在这里生活的主题似乎是物价和革命。我和菲利浦·D·司普劳斯一起请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老先生和周的秘书，每分钟有一个新思想的陈家康吃饭。董的方言口音令人完全不懂。为了补赎这个过犯，第二天早晨我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拜会战地党务局。星期三邀请了蒋介石总部的日本问题专家吃晚饭。因此，星期四我又可以与中共人士见面了。这是大致公道，不偏不倚。

我在中国时，未曾与谢伟思更多共事，这要怪我的运气不好。1935年在北京时，我们只有极短时期共处。1942年，他在我抵达重庆之前离开重庆，直到1943年末才返回重庆。就我所知，他是美国政治官员中，与中国民众接触最多的一个。虽然我并没有暗中参与他写给高斯和史迪威的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但我的观察印象与他并行不悖。

在1942—1943年间，我在中国亲身经历的事情多于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我很快就记录下来，并把它们散发出去。但是，我采取经验的基地其实是很狭窄的。我与一般大众没有个人接触，甚至与学生谈话也不多。我正式结识的多半是官员和行政人员，因此，往往只有表面上的来往。除去我的直接观察以外，与朋友们来往的经验，补偿了我的不足，是我对事件人物评论的基础。我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西方化的、真正开明的教授，多半是三十年代北京时期的老相识，到抗日战争中异地重逢，已是真正的老朋友了；另一些是新结识的左派年轻朋友，也是西方式教育的产品，但都已接受

了共产主义信念。在1943年里，我逐渐认识到：那些老一代的开明分子已经定型，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帮助掌权派，而不是自己掌有权力。他们本身并不能指引方向。另一方面，年轻的左翼朋友也同样无能为力，但是他们抱有希望，有前途，可能将来有发展的机会。我看这两种朋友都是道义上的英雄，在与掌权人物作生死搏斗。

古怪的是：一般大众并不是这场斗争中的主要力量。例如，四川的农民多半比较富裕，而河南的农民却在饥饿线上挣扎。可是在我的狭窄视野内的政治斗争，所看到的只是统治阶层内的斗争。突出的问题是蒋介石在重重困难之中如何维持他的领导地位，诸如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他就束手无策。法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是20比1，而黑市汇价是400比1，这使得想帮助中国的美国人都为之不满；也使这些美国人难于施加他们的影响。国民党应该做到的事倒是在中共地区内实现了，例如识字运动、工业生产合作社、农村动员、妇女解放等等，当然，共产党的这些工作都是以革命为前提来发动的。蒋介石则只依靠CC派和戴笠的组织，他们想靠压制异己来维持统一，结果事与愿违。政治手腕和恐吓手段使蒋介石政府在上层爱国人士中丧失合法地位。腐化的官僚体制并不能因此赢得腐化的投机分子的忠诚。这个进程真是可悲，从内部说，已失去控制，而外面的力量又无能为力。

与之俱来的排外主义产生于过分敏感的爱国分子的屈辱感。外援——如我一年来努力想支援联大的教授们——被看作是外国的干预，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形式，使中国听任摆

布。接受外援而不能报答，对人们的儒家自尊心是一种打击，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超越个人、超越儒家思想的态度，不拘泥于面子或互惠互利。

他们怎样看我们 以下的看法来自《大公报》的文艺编辑，一位很好的观察家（不要援引是谁说的）。她认为，中国老百姓看外国人都是得天独厚，那样富有，他们抱着一种嫉妒的感情，这种幸运与不幸之间的差距引起他们的忿懑不平；对中国的豪绅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人彼此之间还能沟通了解。设身处地想一下，我能理解这种感情。但是，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永远也赶不上美国，这种情况将长此下去，它势必惹出麻烦，这是意料之中的。

当我收拾行装准备回国时，我又一次总结我的看法，并写给阿尔格·希斯。考虑到柯里的注意力主要不在中国，荷恩贝克地位太高而且他很注重与他打交道的人是否地位相当，因此我没有直接写给他们。由于阿尔格是荷恩贝克的助手，我认为他是我与华盛顿官方最好的联络媒介。这份报告也寄了一份给威尔玛。

重庆，1943年11月9日

亲爱的阿尔格：

久未通信，因此这封信不免要涉及面较宽，说一些大而无当的看法。来这里一年，我想，对局势有了较多了解，同时，局势在恶化，我所极力了解的正是这种从坏处去设想的局势。

现在看来，这个国家在战后很难避免严重的内部政治纷争。这是因为现政府已走上“准法西斯”道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不大的政治团体独揽了政府权力，指望用工业化来扩大他们的权力，而其政治思想是保守倒退的，不是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举例来说，很显然，工业化将使农业更加凋敝，而农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可是，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位政治领袖，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只不过是让目前的制度自流下去。

再如，很显然，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将日益发展，广大农民将与新的西方式社会有更多接触，而掌权的政客们却忙得顾不上开展群众教育工作，老实说，他们也不相信这一套——他们也象过去统治中国的少数权贵那样不信任民众。简言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大众将受到现代工业的极大冲击而行动起来，但是这个国家的现领导人，那些掌权的政客，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对工业化只看到它能增强他们的实力，而看不到工业化对整个社会将带来的影响。他们没有一个社会发展纲领。西方的科学公式和中国古代的修砺德性解决不了当前局势的问题。

他们既拿不出主张，剩下的办法就只能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局面。现在，他们正准备这样做，秘密警察和新闻检查已经成为广泛有力的组织系统，如

果美国武器和军备陆续运到他们手中，他们也会使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极权主义组织家还会运用民族主义这一手段。现在要和政府的小职员交朋友已经日益困难。听说委员长下命令，不要与外国人过分接近，看来是可信的。目前，在野派认为与外国接触对他们有利，特别是左翼的反对派认为他们和美国人有很多共同语言，而多数美国人也愿意和他们接触。

左翼反对派中包括采取公开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也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同样批评秘密警察制度、新闻检查制度。事实上，过去一年里，已经开始“遗弃知识分子”。有些历史学家会指出，这是历次大革命的先导。我所知的许多开明分子，以前强烈亲美反共，现在也同意共产党的观点。多数美国人也如此。我相信，那些比较冷静的共产党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运动在近期内能有多大进展，或是靠马克思主义能唤起中国农民。但是，他们的重要性远超过他们的人数或现有力量，因为他们是唯一有组织的少数派和抗议派，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描绘自己是主张改良的理想主义者。这就使日趋极权和暴虐的政府更要排斥外国人。然而它又无力把外国人与反对派真正隔离开，结果其仇外政策只是把我们都驱入反对派的怀抱

许多国民党人认为，美国朋友对他们的批判刺伤了他们。他们也象许多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身不由已地被卷入运动，而这个运动使他们落到现在这地步，既非他们始料所及，也不是他们衷心所愿。我并不为这一切发愁，因为我对一般从事政治的中国人逐渐感到并无大用，我甚至庆幸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没有道德的投机分子，而不是有什么狂热的信念。这个国家目前甚至连推行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那种精神力量都没有。人们长期以来所关心的只是抓一根活命的稻草，他们对每一根稻草都舍不得放过。如果要谈精神力量，那只不过表现为忍耐和顽固不化，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勇气。对我们来说，局面已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也可以说，这为开创新局面是最好的形势。

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感到，应当找到好人，尽力帮助他们，至少不要让那些坏人把我们包围起来。

从我以上所说，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我对华盛顿的人们不抱多少指望。我察觉到，国民党正竭力不让批评他们的中国人到美国去。而通过他们准许去美国的人，宣传一种民主、爱国的假象。在美国士兵的咒骂和中国官方的宣传之间，怎样向美国公众解释这种混乱现象，将是十分困难的。我已准备有朝一日，将我那些绝密评论透露出去，我就将失去

"中国的忠实朋友"这种身份。

中国的问题首先是思想和理想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工业机械学的问题。如果政府或最高层有一个真正理想，他们可以带领人民进行巨大的变革，可是这种变革决不可能增强他们的个人地位。——结果是，我们必须等待伟大的中国革命有一天到来。这番话对十七号街的人们来说，将引起怎样的反应呢？

我希望你到这里来。过去我曾说过，处于负责岗位的人，而不亲身到现场体验观察，从智力上说是不健全的，从政治上说，为成功地推行美国的政策，则是巨大的危险。这种事情竟然能容许它发生，真令人不敢相信。我认为，在这里的美国政府机构作出了优越成绩，要考虑到它的力量十分有限，而这么杂乱的各种战时机构都要大使馆总揽起来。我很难想象，华盛顿方面只凭各种书面报告，不亲临现场，怎能掌握这里的情况。

费正清

1943年12月8日，我随杜诺万将军离开重庆。我的任期早已超过，但是很难从中国政治脱出身来。在战时旅行，常常要为朋友们带信，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来访，交给我一封信，表面上是要在印度付邮的。孙夫人托我带一封信给纽约的E·C·卡特夫人。这只友好的信鸽可以绕过邮政检查，却逃不过戴笠手下人的注意。在我办事处的仆人中间就有戴

笠的人。当时，杜诺万的战略服务局与梅乐士、戴笠的系统闹翻了，不过他们还到机场来友好地送行。而对我则再一次谣言蜂起，说我与左派关系太密切，因此把我打发回国了。这个谣言于1944年4月传到我耳中，当时我已回华盛顿。针对这个谣传，我从研究分析处主任比尔·兰格处得到以下的书面澄清："这种说法如此荒谬，应当用一切办法予以粉碎……你在中国的工作十分出色，使工作大大推进，超过任何人的预期。……我不能举出任何你越出指示行事的实例。……把你召回华盛顿完全是因为你在中国的时间已经很长，再留下去已无必要"，等等。

这当然不能代表戴笠的看法。他凭联想而得出一套我的罪行录。

现在回顾，我对中国左派的兴趣可以说是来自家庭给我的亲近下层民众的自由主义传统。我的母亲通过她姊夫吉尔伯特·E·罗的关系，很早就成为拉·福莱特一家的忠诚友人。在我们的政治神殿里，参议员拉·福莱特和他的夫人是神圣的人物。他们为平民的权利与福利而斗争，反对大公司的既得利益。这种平民主义，反对权势集团，维护公民自由的主张渗透到当时的进步运动之中，而我在纽约的叔父、婶母、罗氏一家都是它的中坚分子。他们敬慕埃玛·戈德曼；林肯·斯蒂芬斯是他们的好朋友。

1928年我在哈佛的自由派俱乐部见过斯蒂芬斯。俱乐部当时坐落在温斯洛普大街一幢老房子里，现在那里是信义会教堂所在地。林肯·柯尔斯坦为俱乐部大厅作了以工业机械

为题材的壁画。1928年，我代表自由派俱乐部参加与塔斯克基学院代表的一次辩论会，主题是黑人与白人杂居问题。当时黑人方面的主要发言人理查·赫斯特·希尔后来和我成了好朋友。十年之后，他还曾来我们家小住。当时，他正为南方种植园里的黑人待遇而斗争。如果他活到六十年代，一定会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

由于这样的背景，我很容易和反对权势集团的人结交，而就信念来说，我只相信法治和人权。我认为在各方面进行改良是必要的，但我不接受一种囊括一切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我清楚看到：改良的要求被扼杀，剩下的路只有造反。中国共产党就是这项事业的化身，因而在其信徒生活中，党的形象就象父母一样。

我于1944年携回华盛顿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的产物，它不是ＣＣ派的控制或戴笠的秘密警察所能压得下去的。农民解放的理想和科学、民主的要求自五四运动已经提出了二十多年，它的性质是一项爱国运动，而蒋介石就没有任何能与之抗衡的主张。

这种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几乎成为我的信仰，只是我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也没有卷进去。我也不想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进行什么革命。这一切都是在替别人说话，对中国革命多管闲事。但是，我认为自己知道，风是在朝哪个方向吹。

八、回华盛顿战时情报局工作

1943年底，我从“现场”（指斗争或实际工作的地方）回到华盛顿。在这个行政中心，代表各种利益范围的势力都蜂拥而来，争先恐后地谋求中央的重视。我可以体会到一位国会议员从他的遭受狂风、水灾或其它天灾人祸蹂躏的选区奔向华盛顿时的心情。而我在现场痛切感到的需要，在华盛顿的阎王殿里又如何提出来呢？在重庆的生活是周旋于各种个人关系之中，回到华盛顿后，生活象驾驶汽车换挡一样，要改为周旋于各种官僚机构之间，它们与个人关系可以无干。但是，我对中国政治有具体的了解。它们与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场合密切关联。这使我得以向美国的政策提出疑问。

离开战时中国，在精神上要有一个适应阶段，这个适应阶段是从昆明开始的。重返美军的随军商店那种生活方式，就如同1972年从俭朴的中国大陆进入香港上层社会的富裕物质生活一样，仿佛是从修道院来到了肉锅旁边。生活不再如少女那样纯真。在中国，物质上的贫困使朋友之间心心相印，节义情操都分外突出。对比之下，美国大兵们的心灵是

以抽象的性——图片、故事、电影——来填饱的；而《时代》、《生活》、《新闻周刊》等杂志则提供抽象的天下大事。它使人感到性的不满足和头脑里的混乱。我知道世界上发生着各式各样的事情，然而却丝毫记不住。这些事件只是经过人的视网膜，却没有切身的经验。

旅行也是一种旁观式的游戏。我飞越驼峰时是坐在一架B－26型轰炸机的驾驶舱里，它在飞机的前端，全由防弹玻璃制成。当我们在喜马拉雅山脉东端朝西飞行时，月光皎洁，布满机舱。

> 轰炸机的驾驶舱除钢架支撑外，全部是由防弹玻璃制成。因此，人坐在轰炸机的鼻端驾驶舱里，就象突出到太空中去一样。这正是月圆时分，在月光下飞越一个个湖泊或一块块水稻田径直前进，仿佛是在薄薄的地表层上激烈前冲；水面月光不时反照，又隐没在身后，就象夜间穿越无数隧道前行的汽车，前灯的灯光在两个隧道之间时隐时现，一瞬即逝。头顶上，月亮在稀薄寒冷的空气中，一动也不动，它洒下的月光却在山野间翻腾起伏，仿佛在耕耘大地的表层。不久，我感到头晕，便从驾驶舱爬回机舱，在即将昏迷的瞬间抓到了氧气面罩。

尽管我在优先名单上排列第三，还是费了三个星期才跨越中东和非洲。威尔玛到迈阿密来迎接，我们在一起短期度假，重温家庭生活，并从中再度认识自己。

回到华盛顿后，我作为自现场归来的最新见证人，有六

个星期大出风头。邀我作报告的十个或一打左右小组织，其中许多人都读过我所写的备忘录和信件。我主要是回答问题，希望使这些同事对中国的现实有一点认识。这一点颇不容易。但这时候，对蒋介石政权的不信任已经相当普遍。我只不过是对中国问题专家们已在形成中的一致看法提供新的证词而已。1944年初，蒋廷黻和王世杰访问华盛顿和纽约，力图重树对蒋介石政府的信任，尽管他们雄辞善辩，也未能扭转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看法。

在我离开华盛顿的十七个月期间，弗雷德·基尔戈的各部委国外出版物征集委员会在传播情况方面，做出巨大的成绩。他把华盛顿一家剧院弄到手，手下有上百人，掌握由海外九个派驻机构送来的五十种不同语言的资料。弗雷德当时看来还很年轻，穿着海军少尉的军装，身材瘦削，但是他的行政才能使他拥有高于军衔的威信。各部委国外出版物征集委员会因弗雷德享有威信而得以蓬勃发展。

为处理各种临时任务，我花费了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我使用劳合林·柯里的办公室；当时，他忙于经济作战局的工作，无暇顾及中国事务。我想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各部委国外出版物征集委员会或战略服务局都没有向我提供适当的工作。虽有一些其它的工作机会，但那些工作都只有十分狭窄的活动天地。就我来说，我的兴趣主要是思想而不是行动，正如我给驻重庆的美国陆军战时情报局负责人麦克·费希尔信中所表示的："可能除去第十四航空队以外，在美国的各种机构中，战时情报局的贡献最大。战时情报局在

华盛顿是最活跃的场所。”它坐落在一幢石头和玻璃构成的庞然大物，社会福利大厦中，远东处在其中占四个房间，有“空调、光调并且隔音”的设备。

战时情报局当时由埃尔默·戴维斯领导。他的印第安那鼻音在每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中成为事实真相的保证。在人们眼中，他仿佛是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一个人。这位个人主义者一下子领导着分布全球、拥有几千人的机构，也亏得有一个得力的经理埃德·克劳伯。由于他的协助，埃尔默·戴维斯得免于陷入事务和合同谈判的勾心斗角中，而专心致志做一个第一流的新闻报告员。埃德·克劳伯的容貌象一个黑手党，身材魁梧，作风粗犷，一眼看去便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这使他扮演监护人的角色更为适宜。1944年，当盟军在西欧登陆作战那一天，威尔玛和我与克劳伯和他的年轻秀美的新娘一起吃饭。克劳伯向我们解释，他比新娘大三十五岁左右，等他死后，她就既有钱又有自由。从生意角度说，这是一笔好生意。他们夫妇一老一少，两人都很吸引人，看上去生活也很和谐。

战时情报局在埃尔默·戴维斯手下，还有一位副局长：埃德·巴雷特。他原是《新闻周刊》主编，暂时离开《新闻周刊》到战时情报局工作。他的副手T·L·巴纳德原在J·华尔特·汤普逊广告公司工作。还有一位来自《生活》杂志的吉姆·利宁协助他们，如同三位一体之中的圣灵一样。他们三人既具有编辑的专业才能，又有广泛的新闻界联系，足堪代表私营新闻业，警惕政府控制新闻。他们在海外反对极

权主义，在国内也反对政府控制新闻，警惕之高如同三匹警犬。因此，战时情报局向公众提供的国内新闻经常控制在极小范围之内。

战时情报局的副局长助理之中，还有三位派驻海外担任地区代表，对欧洲敌占区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华莱士·卡洛尔；对英联邦是原《纽约时报》伦敦办事处主任费迪南德·库恩。在希特勒发动闪电战的初期和英伦海空战争时期，他都在英国，两人原来都是第一流的访员。负责远东工作的副局长助理是一位学者乔治·E·泰勒，他邀请我在他手下主持中国方面工作。

乔治于192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得到英联邦奖学金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由那里再到哈佛大学，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资助到燕京大学。我们曾在北京会面，当时他发表的论文《论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开这方面研究的先河。此后，他在南京蒋介石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数年。

乔治是一位天然的领导者，富有开创新事业的想象力，关心他的下属，与前方办事处能够和睦相处，对自己身边的业务骨干人员又善于协调。我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机会，担任他的副手。偶尔当他出差时，我也尝到一点权力的味道，签上“战时情报局助理副局长代理”的头衔；当然，我只是整个领导班子里的最后一名。我知道乔治对自由中国的战时情况并不了解，他也需要有人协助处理行政事务。我感到在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我们合作得很好；至于我们的工作做得

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

乔治·泰勒有一个主张就是应当把社会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应研究中国的情况。在对日本作战时，他认为，必须取得社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协助，以解释日本人的行动。为此，他找来了克莱德和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夫妇以及亚力山大·莱顿。在他们鼓励之下，1946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发表了《菊花与军刀》一书。

当时，与我共事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德克·博德和在燕京大学任心理学教授多年的夏仁德。我们三人合在一起，专业知识倒是不少，但是，怎样运用这些专业知识使在中国的作战取得胜利，或是取得别的成就，是应进行研究的问题。每天，从各地送来的电报川流不息，往往援引某些书刊，却又标明"机密"，大概我们读到这些书刊应予保密。我们这个思想库的任务是指导战时情报局发布的消息。但是，在如此喧闹的世界里，几个坐在华盛顿办公室里的教授们要去指示纽约、旧金山、伦敦和其它中心城市的消息发布和怎样剪裁消息，作用实在微乎其微。我们可以起草宣传纲要，审查消息，对别人的报道计划的主题与题材批示同意，但我们并不能真正控制美国的新闻战争，因为卷入其中的高手名家实在太多了。

我的差使是在战时情报局的每周综评会上代表第三个战区提出（或者应该说：挤出来）新闻发布指示。这个场合就象一个周刊的每周编辑会议，综览战局，确定宣传要点，以便《美国之音》广播和各种报刊加以贯彻。对远东方面，重要的是我们的对日宣传要说些什么。当我在长桌旁坐下开会

时，海军情报局的菲利普斯上校和他的助手发言，通常都讲得滔滔不绝。海军情报局以日本为作战对手，已经有三十年了。他们难道还需要听几个教授发表高见！？不久，当我在一次会上，提出与上校不同的意见，并且占了上风时，他们都愣住了。我的战时情报局的同事们则感到扬眉吐气，此后，我们才能就问题进行讨论。

可是，在访问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时，我发现：华盛顿发布的宣传要点，连同海军情报局的命令，都没有起多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远东部当时正忙于与东京广播电台进行电波战。我们跨越太平洋的新闻广播，主要听众是敌方的电台工作人员，因为几乎唯有他们才有收听的设备。与华莱士·卡洛尔组织的欧洲前线广播不同，远东的一般民众缺少收音机。因此，我们的电波战的听众，主要只是敌方电台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美国之音》远东部的缅甸科、泰国科、印支科、荷属东印度科等继续坚持每天对这些国家的广播节目。

战时情报局的另一项庞大事业，也同样无法控制，那便是在纽约57号街编辑播放的《海外新闻与特写》。它象是一个有特殊气质的巨人，主管对欧洲各国宣传的各科，充分反映出这些国家内部的动荡：不同派别的流亡知识分子都尽力宣传自己的观点，相互敌视。即便他们读了华盛顿发去的宣传要点——我们往往怀疑他们是否读了——还要先撰稿，经过翻译，再经过播音员，才能向每个国家播送。从另一个城市对这项工作发指示就象对着飞机螺旋桨喊话一样。那边听见的很少，而且听见的一点也往往被扔在一边。起初，乔治无力

顾及《海外新闻与特写》，但是，我对这些新闻工作者很感兴趣。有一段时候，我每两周去纽约一次，向《海外新闻与特写》编辑部人员介绍华盛顿关于远东广播宣传的要点。但是，尽管我苦口婆心，他们还是不理不睬。

宣传指示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华莱士·卡洛尔每天用电话与纽约的编辑们进行讨论。它的另一项作用是向专栏作家欧文·韦克斯勒提供撰写发言稿的主题。他起草的文稿随后作为亚内尔海军上将、雷蒙·格拉姆·斯温等名人的发言播送出去。

《海外新闻与特写》编辑部经常象马蜂窝那样嗡鸣，不断倾泻出新闻、评论、特写故事、新闻图片（当时刚有传真照片，这是电视的前身）、展览图片，及其它宣传品。它们的主要内容都是介绍美国，宣传美国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等等。当时欧洲的难民们正辗转沟壑之中，宣传美国人生活优越，与他们并不相干。当然，移居美国的波兰或保加利亚人后裔，把美国情况介绍给他们祖籍所属的国家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若把这样的内容向亚洲播送时，它们便容易引起误解，甚至被认为是侵略性的。

1944年7月，当我把战时情报局的活动扼要汇报给埃尔默·戴维斯和埃德·巴莱特时，我们在中太平洋（配合尼米兹海军上将）、西南太平洋（配合麦克阿瑟将军）和中缅印战区（配合史迪威将军）都十分活跃。在华盛顿，我们与国务院，国防部、海军部、战略服务局都保持着联系。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我们拟订发给旧金山和纽约的宣传要点指示，以及在各国的工作计划；我们还掌管人事，积累印刷

品、影片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7月间，我还创办了一份通报《华盛顿每周情报员》，发给檀香山、布里斯班、新德里、重庆的派出机构，使它们对华盛顿的新闻发布计划心中有数。为帮助心理作战小组草拟向敌区空投的传单，我还创办了名为《协调员》的每周电报。但是这些综述性的指示、通报，也无非象一个女佣人把家里收拾整齐一点而已，我不敢说它们真正起了多大作用。

为每周提供内容给战时情报局，发布宣传指示，每星期五我要和英国人会晤，然后和我们自己的撰稿人员会商；星期一上午十一时与地区专家碰头，下午三时举行每周综评会，形成整个文件。我们的目标是对我方坚定胜利信心，对敌方散播怀疑与不和。其实，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随形势发展顺水推舟。当我们知道德军即将丢失哈尔科夫城时，我们就故意宣传德军如何准备“死守哈尔科夫”，这样，当德军放弃哈尔科夫时，可以夸大他们的损失。

与此同时，美国与延安的接触，也于1944年春由一群新闻记者开创了纪录。记者们发现，美国公众对延安情况很感兴趣。有的记者便把延安加以美化，正如以前美化重庆那样。1944年7月后，美军观察组常驻延安，此后，我们开始从谢伟思和约翰·戴维斯那里收到有关毛和中共的详尽报告，它们令人大开眼界。

当时战时情报局在研究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促使日本投降。麦克·费希尔发现，在延安有将近二百名日本士兵，被野坂参三领导的日本共产党人争取过去，他们是自觉地从日军逃

跑的。而其时美军所捉到的日本俘虏都是在战场上抓到的，没有一个自觉投降的实例。麦克·费希尔关于中共对战俘如何进行工作，写回一系列报告，极有价值。其时，在重庆国防部也有一个日本人鹿地亘，在战时情报局的吉姆·斯图尔特领导下，从事向日军散发传单的工作，但就领导才能和宣传能力来说，都远不及野坂参三。

我们对于日本战败后，天皇应如何处置，曾在方针上有过一场争论，关键是：天皇对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日本问题专家多半认为，他对维持日本社会秩序、使日本接受和平条件能起主要作用；而非日本问题专家则主张以宪法限制天皇权力，天皇不能再凌驾宪法之上，也就是说，他不再是神圣的。

1945年初夏，战时情报局对日本播送了埃利斯·札卡赖亚斯海军上将的五六篇评论。他在日本海军中有许多老相识。这些评论暗示帝国体制将在和平协议中受到尊重 这是在“无条件投降”这个公式中无法正式列入的内容。这是华盛顿方面高度机密的行动。札卡赖亚斯把他的日语讲话进行录音，然后用飞机送到塞班岛进行广播。

当太平洋战争即将告终时，战时情报局开始紧张地准备报纸用的各种铅字、印刷设备、有关科技、美国和战后世界秩序的书籍以及其它设备，以便供和平时期来临，重建宣传工作之用。战时情报局储存(然后用船只运输)的各种宣传资料、器材，在美军占领各国以后，分按不同新闻工具，由专门小组或地区局根据专门指示掌握运用。以中国为例，运送

的资料、器材包括：45部电影特辑（各备四份拷贝）加上46部商业性短片、50部战时情报局的文献纪录片、图片展览、新闻特写稿件、15，000张供电台使用的音乐唱片、无线电播音磁带，以至整个图书馆的全套书籍等。

1944年5月至8月，乔治·泰勒前往中缅印战区进行视察时，由我代理他的工作。这使我得以就乔治集结起来的力量进行改组、协调，并得到最高级领导的赞赏。但我的心意并不想借此进入华盛顿的官场走马灯，而是想重返中国。

1944年下半年，正当我们与延安中共方面建立起联系之后，史迪威将军被撤去中缅印战区司令的职务，这使美国在中国内部冲突中显得站在国民党一边。凡是看到中共势力将不断增长的人们都感到，如果我们反对中共，将招致无穷尽的麻烦。但是，这种审慎态度对新任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毫不起作用。他的使命本应是调停双方，结果被蒋介石哄骗，很快便卷了进去。

威尔玛于1945年5月赴重庆，到大使馆担任文化联络官员。当时在大使馆负责与中国方面信函往来的是我们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奈特·比格斯塔夫教授。奈特身材高大，精明干练，对外交部门毫不畏惧。他给与威尔玛极大帮助。威尔玛敢于顶住盛气凌人而又精力旺盛的大使，很快打开了自己的工作局面，使国务院的文化关系司在中国有了立脚点①。

① 威尔玛就这一页文化联络工作的历史写了一本书《美国在中国的文化试验，1942—1946年》（国务院，华盛顿，1976年出版），其中几乎没有提到她自己，更不曾提起她在使馆创办文化处取得的成就。——原注

由于荷恩贝克和汉密尔顿去职，国务院远东司由约翰·卡特·文森特领导，在他手下是一批在中国多年的职业外交官。他们殚精竭思的问题是：在国民党政权继续崩溃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进一步陷入支持蒋介石的泥淖；如果中共取得政权的话，又怎样过渡到与中国革命建立新的联系。国务院远东司不相信美国的政策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多半是由于美国的坚持，国民党政府在参加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一名中共代表董必武。他相貌并不惊人，年老而文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深受毛信任的紧密追随者之一。当他来华盛顿时，约翰·卡特·文森特对他作了一次私人访问，地点就在乔治城区三十三号街我母亲的寓所（在威尔玛去中国以后，我放弃了在三十四号街的寓所，和母亲同住）。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董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但是这样的安排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对国务院可能在中国内部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任何迹象都十分敏感。

1945年5月，我与驻中国办事处达成协议，前往中国协助办事处主任工作。当时任中国办事处主任的是威廉·L·霍兰，原籍新西兰，刚入美国籍不久。比尔[1]是所有远东专家都熟悉的，他多年担任太平洋学会执行干事，富有组织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也熟悉太平洋学会出版的各种专题研究报告。他的学识经验使他得以胜任和愉快地接替麦克·费希尔的工作。费希尔在重庆任职已经四年。比尔·霍兰邀我去主

---

① 威廉的爱称。——原注

持战时情报局在中国的新闻工作，因为它在不断发展。我把心理作战（散发传单）的工作留给约翰·斯图尔特。7月30日，我建议8月下旬或9月启程。8月9日，我在局内商定于9月15日启程。这个安排由于和平来临而突然变化。

战争终结的过程使人度日如年，焦急不安。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协议的投降条件（但要保持天皇体制），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取得盟国同意（他们反对保留帝国体制）后作出答复。这项答复于8月11日上午十一时公布。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向国内宣布谈判投降这件事，因此，战事有可能延长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战时情报局的任务是向日本人民提供情况的发展和投降的条件。我们的做法是：

（1）在华盛顿时间早晨八时二十九分从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以莫尔斯电码发布贝尔纳斯答复全文，同时以短波无线电发布英语新闻，从檀香山短波广播电台发布日语消息，同时在塞班岛用中波广播。这时在日本约为清晨四时。

（2）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用所有波段播放贝尔纳斯声明的日文和英文稿，连续广播五十二小时；塞班岛用中波连续广播二十四小时。

（3）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日本组把贝尔纳斯声明译成日文，用战时情报局专线与国务院校正译文后，由陆军通讯部队以罗马拼音字发电报给檀香山、马尼拉和昆明。

（4）我们电告战时情报局派驻各地的心理作战小组散发日文传单；并向五角大楼建议，用第二十航空队以B—29型远程轰炸机向日本本土散发传单。为保证译文准确无误，

旧金山电台通过专线向华盛顿逐字核对罗马字拼音文本。传单的标题经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审批（阿尔奇·麦克利什建议加一句："每个日本人有权知道"），然后用商业无线电话逐字传到檀香山。

（5）檀香山用短波发射台向塞班岛播发传真电讯稿，全文共八页，塞班岛将八页传真电讯稿缩版，用韦本道弗式高速印刷机复印三百万份传单（传单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第二十航空队把传单装入炸弹内，然后用B—29型轰炸机把它们投到东京和其它六个大城市。这全部工作于二十九小时内完成。它比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收到贝尔纳斯声明早六小时①。

从表面看，这一切似乎只是一批组织良好的执行人员取得的一次技术性成就；但是在把"皇帝"一词译成日文时，我们用传统的词汇"天皇"，而在贝尔纳斯的答复正式文本中只用"日本皇帝"一词，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行动使政策更加明确。

在华盛顿战时情报局工作期间，我对新闻工作增长了不少知识，但是对中国的了解却未见增长。这使我更加渴望返回重庆。

---

① 埃德·巴莱特《真理是我们的武器》一书第13—14 页所记述的略有出入，我所依据的是当时我所作的笔记，未发表。——原注

九、战后中国

我在战后中国逗留的九个月，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7月，对于中国人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一起的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由于滥发钞票和通货膨胀过程中的贪污腐化，已经丧尽民心。它搞坏了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却还指望靠美式武器装备可以在战场上打败中共。中国共产党则尽一切可能扩充实力，并为内战进行动员。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在日本投降之前未能预见现实的发展，从而制订一项合理的对华政策，只能临时尽力所及，派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死敌之间进行调停。

在这我段时期的经历是：处于日益恶化的局势下去创立美国的新闻工作。它如同用扑克牌搭房子，搭得越高，就越发摇摇欲坠。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战时成果已经瓦解了。1945年8月中旬和平来临时，战时情报局在中国的二百余名工作人员都排队准备回家去。许多人设法租一条船，由重庆沿长江下驶，经三峡、汉口到上海。比尔·霍兰

亲眼目睹他的战时机构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濒于消失。他需要支援。由于我们在"光复区"即国民党占领区的大城市里扩展新闻工作的需要，使我得到批准在9月底离开华盛顿前往中国。

这次飞行与1942年赴华的空中旅行大不相同。那一次是飞越非洲，而这一次则是由空运司令部安排，途经满目疮痍的欧洲各国首都；首先由一架泛美飞剪号飞机把我从纽约载到爱尔兰，它象"一辆飞行的棚车，机舱比普尔曼式车厢大两倍，这类飞机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了"，在横跨太平洋途中，速度太慢，马力也不足。在伦敦的一周主要是重访故旧。我与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和他的夫人诺拉共度一个晚上。他曾参加华盛顿丹巴顿橡树林会议，帮助成立联合国组织，现在六十岁，担任"外交部会议筹备工作特别助理"。我在牛津读书时的主试教授杰弗里·赫德森请我到白厅俱乐部吃饭。我的连襟小阿瑟·施莱辛格也邀我在他的家中住了两天。

空运司令部的飞机接着把我送到巴黎、马赛、罗马、拿坡里、雅典、开罗，一路不时换乘汽车，经常吃的是军队伙食，住的是军队招待所。然后到阿巴丹、卡拉奇、德里、加尔各答、昆明。10月12日抵达重庆。威尔玛驾驶战时情报局的汽车来接我。我们在中国再度相聚，但局势很不稳定。我们的各机构正准备由重庆迁往长江下游，威尔玛和我在旅途中的大半时间将是劳燕分飞。

1945年10月我抵达重庆时，感到幸运的是，正在势头上

的赫尔利大使刚巧首途往华盛顿公干。在此之前，他曾赴延安，发出印第安人式的战争吼叫，并且虚伪地开始美国对国共矛盾的调处，以便成立联合政府。当时国共双方都表示接受调处，愿意成立联合政府，认为这样表示对自己有利。当时国务卿是从美国钢铁公司转任的懒散因循的斯退丁纽斯。在罗斯福死后，性格坚强的赫尔利反对他的外交工作同事们审慎避免卷入中国内部矛盾的态度，宣布我们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这个不必要而且愚蠢的步骤把我们驱向以冷战（反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问题的"解答"。这样，我们的回旋余地就更小了；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预见到蒋介石将被打败，而我们由于支持蒋介石，一旦蒋介石失败，我们势必也被赶出中国。

对我来说，这一次在中国的逗留与1942年—1943年在中国的经验迥然相异。首先，抗日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在收拾战争的残局，遣送日军回国，遏制国共内战。马歇尔将军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进行调停，协商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我们的国民党盟友，不致被中共领导的革命所压倒。我在战后中国逗留的时期正是双方达成协议、停止冲突的时期。

其次，我不再是单枪匹马的一人办事处。以前，我有充分时间，以观察家的身份与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会晤；现在，我接替比尔·霍兰担任美国政府一个在华机构的行政首脑，总部在上海，在全中国设有十个分支机构，运用一切新闻媒介，向中国公众进行宣传。我们以九个月时间结束战时情报局在华西的工作，把力量投入沿海重新占领的城市。战

事一结束，战时情报局内从事传单工作的一百五十名美国人就收拾行装回国了。战时情报局的新闻宣传工作则逐步转变为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它在大使馆领导下工作，并且包括文化联络在内。

1946年上半年，我们继续扩展工作，同时准备过渡为美国新闻署、新闻处。美国籍人员的数字，从1945年9月的一百二十五人降为1946年4月的二十五人。中国籍人员由七百零六人减为三百四十二人，原来设在中国东南敌后的永安办事处，以及兰州办事处都予以结束。昆明办事处缩小，附属于领事馆内。成都由重庆美国新闻处照管，天津由北平美国新闻处照管。同时在上海、广州、汉口、北平、南京、台北、沈阳增设美国新闻处（上海美国新闻处与设在上海的美国新闻署中国分署总部是分开的）。生产与调度都集中在上海的总部，工作内容主要是：（1）中英文新闻稿；（2）中文的特写资料；（3）照片、展览、张贴画等。影片和图书馆则推迟到第二步。文化联络则要等到图书馆建立和对当地完成社会调查之后。至于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组织的人员交流则由威尔玛在大使馆内主持。

上述各项工作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在美军支持下进行。战时情报局原已建立起电台网，掌握所有战地记者的采访报道。现在，这套系统扩展到沿海城市，用莫尔斯电码或中国电报数字明码，把各地美国新闻处与上海总部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左右新闻报道，还能继续为战地记者，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传递信息。我们还能就公事进行私人

之间的讨论，这是任何其它非军方机构都做不到的。我们还能替别人传递有关国家利益、经济灾难、涉及个人生死的重大消息。传递信息就意味着权力，各种人都来讨好，我们有许多朋友。

在中国的再占区中，人们迫切需要我们所能提供的任何精神食粮。他们需要世界新闻，需要各种书籍。中国的政治命运还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在此情况下，我认为人们需要了解情况，不亚于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去的各种救济物资。有鉴于此，我把回哈佛大学的日期由1946年4月1日推迟到8月。如果我自己都不能坚持到工作告一段落，我就无法要求美国新闻署的其它人员继续工作。

10月18日，我和比尔·霍兰同赴上海（我已担任他的副手，负责新闻工作）我们住在国际饭店，而到锦江饭店吃饭。

> 上海的利兹夜总会，现由海军接管，成为我们的总部。街上挤满了军车、人力车、三轮车、出租汽车、开拔的中国军队、闲散的店员在老式的电车前面横过马路；小姑娘在各种川流往返的车辆中间叫卖报纸；不时可以看到一些蓄大胡子的锡克族警察，他们即将遣返回印度去；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美国大兵，和他们在一起的有由四川同来的投机商、合作者、白俄舞女、流落的德国人、日军士兵，还有患肺结核的中国苦力们。

这幕街景足以说明上海还是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谁在黄浦江上拥有炮艇，谁就能控制上海。那个冬天，上海有暖

气的地方很少，我们美国人虽然住在最豪华的寓所里，却要加穿毛衣、袜套、大衣，才能在室内保暖。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在各种物质匮乏和服务工作很差的条件下，扩展我们的工作。我为延迟回哈佛的日期写信给保罗·巴克，信中描述中国：

> 正处于不稳定的全国停火状态之中，暗杀、殴打、暴力、警察和群众示威将继续增长。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和开明分子正在竭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民主制度，其中许多人将会为此丧生。

但是，美国新闻署的工作可以有助于理智占上风，以减轻灾难。

在比尔·霍兰回美国之后，我成为中国分署署长。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上海总部保持有一批专家，以应付十个城市美国新闻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的运气不错，孟买的战时情报局办事处有四位海外新闻特写工作专家，都是妇女，她们飞过驼峰，来到上海，使我们的工作得以保持应有的水平。新闻稿由鲁思·刘易斯和艾丽斯·福特主管，特写部分由战时情报局华籍工作人员的领导人刘尊棋和艾米·谢弗主管；图片部（张贴画、图片展览和新闻照片）由海伦·普莱曾茨主管。他们都具有专业才能，并抱有献身这项工作的信念。

我的走运还在于发现了布雷德利·康纳斯并且提拔了他。他原是海外新闻特写部的一位图片编辑，来中国后，建立起图片部的全套技术设备，我委任他负责主持上海总部的

业务。布雷德出身于富裕家庭，有很好的文化素养，但表面上看不出来。他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感觉敏锐，嘴上经常叼一支香烟，看上去足可以在纽约市当一名应急行动警官，或甚至在黑社会里当一名维持纪律的执法人。可是，他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人都认识，对于行政事务的各种窍门一清二楚。在飞机场，他认识航空公司经理，甚至飞机驾驶员，对飞机航班时间了若指掌；马路对过的美国总领事馆里，从秘书直到总领事，他都认识，而且谁需要什么东西，他都心中有数。遇到棘手的事，他有办法，因此，人人都找他帮忙。而他的本事就在于，既不被规章制度所束缚，又不违反规章制度。他还有一项特长，就是注意收听华盛顿清晨的电讯稿，使在上海的美国官员们入睡前获悉有什么该知道的重大事件（1950年6月他在华盛顿，当北朝鲜的坦克于清晨驶入汉城时，布雷德从国务院得到消息已是华盛顿时间深夜。他立即通知了迪安·艾奇逊。在他突然去世之前，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他任驻伦敦公使。）我很幸运物色到他来主持上海总部的业务工作。

美国新闻总署中国分署在各种行政专家（他们的大名，恕我不一一列举）协助下，终于建立起来。它证实了我一向抱有的看法，即一个机构应由两个人组成领导班子，布雷德掌管中国分署日常业务的运行，我则使美国驻华大使馆随时了解美国新闻署中国分署做出的成绩，并到各地视察工作，了解情况。自1946年7月1日，布雷德接替我的工作，并成为大使馆的公共关系主要官员。在此之前，我与大使馆的联

系，主要是通过约翰·梅尔比，他是个有头脑的职业外交官，曾在拉丁美洲和莫斯科工作过，很快就适应了中国的条件。

由于要经常向十个城市的美国新闻处发出指示（提建议、要求、批准活动计划，规定权限等），我不断问自己："罗伯特·赫德①在这情况下会怎样做？"结果是：从1945年圣诞节到1946年6月1日，发出了四十四份通函。他们涉及美国新闻署的各方面工作，通常由中国分署的专家们起草，以便大家都充分了解我们的多种活动。例如，关于分发新闻图片，（1946年4月24日发出第三十四号通函），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中国有一百十个刊物有印刷图片的制版设备；因此，我们的新闻图片及说明都是每种一百十份，一经洗印，立即分发。我们编辑的特写稿（与从旧金山发来的新闻稿不同，在于为特写稿提供背景材料）由中文翻译部主任选择（自1941年，战时情报局就采取这种做法），经中国分署业务主任批准执行。通常我们所翻译的文章都已在旧金山、纽约或华盛顿公开发表过。所有翻译的文章，每周编印一期《新闻资料》，有八页，包括八至十篇文章，每期印5，000份（有2750份由我们直接邮寄，其它给各地美国新闻处）。

在第20号通函（2月11日）中，我对美国新闻署在中国活动的目标与方针提出以下看法：

（1）提供新闻，不是进行宣传；

---

① 英国人，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译注

（2）不仅要了解，还要行动："我们应介绍美国人如何解决当前问题，有什么经验，以促使中国人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

（3）现代化，而不是美国化。"我们自己认为好的，未必有益于中国。中国问题的解决途径大致可概括如下：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应用于大众生活之中。"

（4）现实主义，而不靠推销术。"把美国情况全面、真实、彻底地加以介绍；不要粉饰困难、问题与失败。要想维持信誉，凡是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我们自己应首先进行报道。不要向听众过分热心地推销我们的观点。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的目标在于树立一个健全的思想基础，然后产生独立的行动。例如：在美国，一切行动出自个人主动，公民投票，罢免权等，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对中国的政治弊病，也不可能是万灵妙药。"

当我们在中国建立美国新闻处时，在华盛顿，乔治·泰勒和他手下主管中国事务的约翰·C·考德威尔则在吃力地为我们的预算，人员编制和涉及美国新闻署在华前途的指示而奋斗。考德威尔（他的父亲是在福建的传教士）用六周时间访问中国，了解现场的问题。我们还用军队的设施与华盛顿举行电传会议，和乔治交换一些我们自以为是很有见地的警句妙语。

我的行政工作危机主要来自人事问题：如何使各种专家组成团结的核心。最引起混乱的事件是：1945年12月15日宣

布马歇尔将军执行调停国共冲突的使命。约翰·卡特·文森特、迪安·艾奇逊和马歇尔审慎地草拟了杜鲁门致蒋介石的公开文告，既要避免触犯中国人的尊严，又要使马歇尔的形象不偏不倚。当驻重庆大使馆临时代办华尔特·罗伯逊和我收到这份文告时，同时还附来一篇发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其中说杜鲁门的文告是对另一个国家元首的最严厉的报复措施，等等——这与华盛顿的政策大相径庭，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后我发现，这篇新闻报道是从上海美国新闻处播出的。我立即搭下一班飞机到上海去调查（我不能在此情况下与马歇尔将军会面）。这篇新闻报道的作者倒不是一个共产党破坏分子，他只是一般的采访记者，惯于写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故事，以便推销主要新闻，引起读者注意。这种习惯是我前所未闻的。幸运的是，这位记者当时得到合众社香港分社的聘请，正准备到香港去。经与他商讨之后，我召集了美国新闻署中国分署的骨干人员开会。如果我错怪了他们的同事，他们是会拂袖而去的。因此，我的做法是详述：（1）这位记者毫无恶意；（2）马歇尔的使命十分微妙；（3）我们作为政府雇员，不能违反国家政策。解决办法：当事人已辞职而参加合众社工作，我愿担任推荐人；我向马歇尔将军保证，我们决不会再出这种差错。经过大家讨论，同意这样处理，我便向罗伯逊报告：肇事人已经离职。

我对马歇尔将军的调处使命还曾有另一项引起回忆的贡献。在重庆期间有一次，记不得当时是为了什么原因，我认为事态发展已不需要马歇尔将军主持下午二时的记者招待会

（这类记者招待会通常是由美国新闻署替他安排的），因此，我就作主把它取消了。显然，我把自己置身于他的地位，认为我就象一个教授照顾另一位教授午后休息一样，办了一桩好事。谁知午饭吃到一半，马歇尔将军来电话，显得十分生气。他的指示十分明确、概括、清晰，以致现在回忆起来，都使我感到刺痛难堪。总之，记者招待会必须举行。

离开会时间只有一小时，我便到处打电话，但几个重要的中国报馆记者已回家吃午饭了。我毫不犹豫，跳上吉普车，按他们家的地址前去通知。司机在重庆惯常的濛濛细雨中，幸而找到了他们的寓所。这些地段的房屋是我所见过的最破烂的房屋，走进去要弯着腰，登上摇摇欲坠的楼梯，把那些病魔缠身、气运不佳的可怜家伙从午睡中惊醒，彼此都感到很窘。但我乞灵于"马歇尔"的名字，总算把他们按时弄到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尔将军的助手，一位年轻英俊神气飞扬的上校对我说："这里大概不需要你了。"我无话可说，就溜回家了。哈佛大学训练不出能令五角大楼满意的人才。

重庆的战时情报局大院里，后来盖起了七八幢楼，包括一个舞场，这时大都已空无一人。威尔玛和我使用楼角的房间，其中有壁炉，给人舒适之感。但我们都不时要外出旅行。10月间，威尔玛搭卡车赴嘉定和成都，11月间又飞往西安。而我则飞往昆明、广州和再次去上海，12、1月又两次飞沪。2月间，威尔玛飞昆明，然后乘吉普车沿滇缅公路到达大理。3月间，我则朝另一个方向旅行，去北平两次。4月里，大使馆终于随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由南京搭火

车去上海，只消一夜时间，因此，威尔玛得以与上座大海这城市的作家、艺术家们有更多会面的机会。

这些旅行使我对中国之混乱加深了认识。另一方面，从与中国知识界谈话中，从采访马歇尔调处活动的记者中间，都可以明显看到中共处于更有力的地位。

调处协商一开始，就使中共获得一个确认的地位，从而增加了美国与中共的接触。在重庆时，有一晚，我们请乔木与龚澎吃饭；次晚，请国民党外交部的顾氏夫妇吃饭，每一方都认为另一方没有谈判诚意。资源开发委员会的钱昌照认为，中国既需要国民党所从事的工业化，又需要共产党所发动的土地改革。但是，不久之后，他便首途前往欧洲了。

1946年1月，国共谈判似乎即将取得成果。重庆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一次宴会：

> 这是为美国新闻署举行的，周恩来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分在两桌。在两桌上都有一种外松内紧的热烈气氛。周带头唱歌，我们大家很快便响应了；叶则用筷子在桌边和玻璃杯上击打节拍。他们唱的是延安的歌曲。酒过几巡以后，我们也得唱支歌。我们也想找一首比较雄壮的歌，结果发现晚近的美国音乐，或是太甜蜜，或者太软、太伤感，唯有南北战争时期的歌曲还有一点雄壮的味道。周夫人（她从来都用自己的姓氏，姓邓）穿着长裤，非常纯朴，又十分动人。（1980年，邓颖超继续是北京的一位领导人，叶剑英还是军队的领导人，周恩来则已于1976年去世。）

中共代表团在日夜会议谈判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在重庆最好的旅馆胜利大厦大厅举行盛大的酒会。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还有许多别人都参加了。威尔玛和我还和郭沫若夫妇以及我们在重庆中共代表团的两位好朋友一起会宴，喝得微有醉意。我想，所有这些热情的表现以及似乎无忧无虑的神情，都是为表明中共人士对基于美国的明智政策取得的谈判成果，表示满意。他们今后有了活动的机会，而且，这是一批精选出来的社会革命的信徒和行动家。

在上海，我与来自檀香山的日裔美国人，研究延安的专家孝治有吉一起活动。他曾参加军事观察小组，在延安住过。我们"请鲁迅夫人和一位朋友吃饭——这些夫人甜蜜动人，虔信有余，而头脑清醒不足，令人感到他们就象刚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一样。"孝治有吉在檀香山港口曾一度是左翼分子，通过他，我们把美国新闻署的出版物也发往延安。

1946年初，设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派出许多调处小组到华北各地，以制止当时日益剧烈的国共军事冲突。国民党、美国和中共三方派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人员中只有一位女性就是龚澎，负责叶剑英将军的对外联络工作。《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力·波特评论她非常干练，穿着蓝色旗袍，发型却是美国式样。她说："对北平居民，没有一点恶意。"波特也象记者公寓的其它外来动物一样，十分推崇她。在最初那一阵歌颂烟消云散之后，我在上海龚澎家里见到乔木与龚澎，他们的小男孩巴黎（为纪念首先解放的

国都而起名）由外婆照顾着。不久他们就为安全的缘故转移到香港去了。周恩来显然要把他的重要助手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之用（1971年，乔冠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1975—1976年任外交部长）。

美国新闻署因杨潮案件而卷入国共冲突。杨潮是个知识分子，战争结束时，他在永安美国战时情报局办事处，在克里斯托弗·兰德（后来到《纽约客》杂志）手下任职。一次，克里斯派杨潮执行公务，被国民党战区司令下令逮捕，作为共党嫌疑犯关押在杭州监狱。兰德设法保释他，因为他是奉派去执行战时情报局的公务。但是，美国人能用治外法权保护中国雇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杨潮终于在狱中死去，显然是患病得不到医治，酷刑折磨也是意料中事。国民党方面想使杨潮的寡妻离开上海，怕她在上海给国民党招麻烦。兰德和我还有其它美国人则设法保护她。左派也挺身出来，最后举行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追悼会，郭沫若在会上热情致词。我也参加了追悼会，以示美国人对他们的雇员的关怀；但是，我拒绝在追悼会上致词，虽然点了我的名，我也没有讲话，因为美国政府对纯粹的中国内务不能表态。我不愿被中共利用来反对国民党政府。这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的复杂情况，就是：杨潮是我的朋友杨刚的哥哥；当时，杨刚正在美国。

美国新闻署与作家、艺术家建立联系的文化联络工作使我们在自由派与左派中间，搞得眼花缭乱。依我们看来，文化界人士在政治上持什么态度，与文化无关，即使我们要想弄清他们各人的政治态度，也没有这种能力。美国赞成国共联合

政府的政策使我们绝不介入中国的党派政治。我们与各界人士打交道时，力求超越政治，只着眼于他们在专业中的地位。

后来的事态表明，1946年时中共已经拥有惊人的力量。我们在上海的中文编辑部主任、深受大家敬重的金仲华，在1949年以后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他自杀了）。《文汇报》编辑宦乡曾从战时情报局获得当时难以得到的铅字，以创办民间印刷厂。他后来成为中国首任驻英代办（即大使）。1981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的朋友杨刚于1949年担任北京《人民日报》副主编（直到她于1957年自杀）。这些重要的职务所委任的人选只可能是一些多年的共产党员。战时情报局中国雇员的领导人刘尊棋是另一个例子。他是麦克·费舍尔物色来的一名记者，当中国雇员人数急剧增长时，刘的冷静判断对麦克是极大的帮助。1945年以后，刘来到美国，为普及教育运动谋求支援，希望在中国创办现代化的印刷出版事业，结果未能成功。他从三十年代初便是共产党员，但是自1957年以后，有二十一年之久，他被监禁在北京，流亡到满洲，湖南（现在他在北京任英文《中国日报》主编）。这一代人自五十年代起的各种经历足可以写成许多本书。三十年代趋向左倾的大学毕业生是当时世界知识分子潮流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至于中国自1957年至七十年代期间在政策斗争中应运而生的红卫兵及其它人则属于另一种类型。

1946年3月初我访问北京，又自然地吸引了许多人。陈福田已从檀香山回来，正帮助陈岱孙和其它人把清华大学从

昆明搬回北平。我们哈佛的研究生阿瑟和玛丽·赖特已从山东潍县集中营回来，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三年劳动生活。他们继续保持着对中国研究的献身精神，住在北城原被一名汉奸占有的一座四合院里潜心研究。在他们的房子里，有带铜锁的大柜、硬木家具、雕花的窗棂还有其它吸引人的东西，再加上老式、受过专门训练的仆人。玛丽正要开始收集中国革命史料，筹建胡佛图书馆。他们向我介绍一位来自苏联的研究生同学，名字是塞尔吉·齐赫文斯基，当时他还年轻，后来在苏联政界成为红人。我还和乔治·哈特姆（马海德）一同午餐，他是在延安的一位美国医生，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奇迹式的贡献。格雷厄姆·佩克在西城租了一幢房子，正在写他的战时中国回忆录《两种时光》。两名中共联络官员来美国新闻处拜访我，他们是黄华和柯柏年（1981年时，黄是外交部长，他的儿子在哈佛读书）。当时我到北京是为帮助新任北京美国新闻处主任约翰·伯特·福斯特。他于1940年暑期，曾来哈佛的远东研究所学习，与一位女同学结婚。这些老朋友、新相识交织成甚为复杂的网络。

在上海，这种复杂关系也日益难以掌握。4月里，我们起用设在美国总领事馆对过，汉密尔顿大厦的美国新闻署新址，为此举办了三次酒会招待上海各界——这是外国军事人员、官员、商人和中国官员、编辑、艺术家、作家的大杂烩，其中大多数都是早已对政府不满的。每周都有一些中国相识来告别，他（或她）正准备偷偷到北方去。

有一天，在吉姆·斯图尔特手下，从事把战时情报局传

单译成日文的日本知识分子鹿地亘在上海来看我，希望返回日本。美国海军正在把几十万日本人运送回国，而对鹿地亘则明显地是为了安全的理由，不让他走。我写了封信给美国军方，认为在战争中帮助了我们的日本人，其所受待遇至少不应比战俘差。我的干预使鹿地亘得以回国，但我自己的名字却被打上了一个黑点。我们已经惧怕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也在惧怕我们。安全考虑开始在起作用了。

在上海时，我赞成美国新闻处把英语著作译成中文。为此，要引起擅长翻译的中国学者的兴趣，我深知，要把中文、日文、朝鲜文、越南文译成英文，等于重新创作一样困难；反过来，要把英文译成中文、日文等，也是一样困难。如果我们希望得到真正的文学作品，就一定要请精通外国文学如同费思棻①那种水平的中国学者来翻译美国的奥马尔·凯扬姆②。我向学识渊博的郑振铎请教，还鼓励冯亦代从事译述，他的夫人郑安娜曾帮助美国新闻处开展文化联络工作。我们还动员赵家璧、徐迟和其它人，但直到我离开时，在这方面无所成就。我还曾荣幸地参加作家协会会议，这是三十年代著名的左联的继续。由于我在中国文学方面毫无所长，因此，我只能起一个象征友好的作用。

在北京，美国新闻处遇到了特殊的问题。在京津地区驻

① 澳大利亚的著名中国学者。——原注

② 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约生于公元1050—1123年，著有《鲁拜集》。——原注

扎有四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保持政治上的安定，这自然成为中共反对的目标，认为他们代表“美帝国主义”。要成立中美文化研究所并不容易，因为马歇尔的调停作用眼看就要垮台。内战和对文化工作者的镇压都已迫在眉睫。

1946年6月初，威尔玛试图在文化联络工作中贯彻马歇尔将军在国共冲突中采取的平衡政策。她得到马歇尔将军同意，邀请设在中共地区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派遣四名学者到美国一年，作为中美交换学者计划中的一部分。当时从国民党地区派到美国去的已有近三十人。

为物色适当人选，威尔玛得到使馆指示，经由北京往前张家口。这时中共首都已由延安迁往张家口。我当时正在北京解决北京美国新闻处工作中的问题，因为北京美国新闻处主任正患病休假。我也与威尔玛同赴张家口，但这次主要是她的活动。她居然能活动到一位美国空军上校驾机送我们前往。飞机跨过长城，到达蒙古的边缘，那里气候干燥、尘沙飞扬，有点象亚利桑那州。“我们飞往张家口只用了四十五分钟，一星期后，却用了十六小时搭火车、乘驴车，返回北京。”我们受到边区政府接待，住在解放饭店。威尔玛在那里办她的公事。我们还一起看文工团跳秧歌舞，这是在农民“解放”的过程中十分流行的一种民间舞蹈。我们还和一些小组进行谈话，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主张民主的美国何以采取一项政策，反对中国的民众运动？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与解放区文艺界的“沙皇”周扬共进午餐（他是他

们拣选的四人之一）。他由女作家丁玲和当年创造社领导人成仿吾陪同。诗人艾青讲话很直截了当：‘我们指望从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得到援助；我们恨赫尔利的美国。”

我从未能想出适当的理由去延安跑一趟。因此，在张家口的这一周访问就是我仅有的一次访问中共地区。这所大学看来象是（只有）中学水平，教材是油印的。我们会见了边区政府最高领导人聂荣臻将军。有一次，威尔玛和我在剧场里，要对挤满剧场的年轻人讲话。我从来未曾感到那样穷于言词。我的中文，为旅行、宴会谈话、讨论近代史是够用的，但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词汇等于零。我尖锐地意识到，我头脑中的世界与我的听众头脑中的世界，这两个映象迥然不同。我所能说的无非是他们已经说过的人民友好、争取和平之类老生常谈。我不能背离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来讲话，也没法把这项政策说成是通向公义、富裕的天国之路。如果把这一次经历作为我1945—1946年访问中国的高潮，那我只能收拾行李回家去。

在张家口城里，墙上的标语写道：“发扬民主，建立新生活。”从张家口返回北京，我们乘一辆驴车，在无人地带走了十英里，然后在中共哨所等待国民党军停止射击；到达南口时，在长城的城门上看到的是大字标语：“拥护蒋主席”。后来，这四位中共方面提名的学者，由于国民党方面拒发护照而未能成行。几年之后，当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我们也就让这幕插曲被悄悄地忘却了①。

我离开上海前夕，左翼方面组织一次盛大的饯别宴会，

有五十位文化界人士参加。郭沫若和其他人讲话中对我表示肯定的评价。我的答辞中心思想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对争取自由的斗争表示敬佩，等等。这次饯别完全不是为了走什么形式，我很高兴，出席人都在签名册上签了名，这是当时这类场合的惯例。有这么多文坛名人签字是很难得的。倒霉的是，我忘记了“人在人情在，人去情谊断”这条不成文法则。我把这份宝物交给办公室的公务员（他很能干，布雷德给他起名“麦克杜格尔”），嘱咐他连同其它文字资料，给我寄到美国。这本签名册始终没有寄到。我才想起自己忘记了：一旦关系结束，就谈不到还有什么义务了。麦克杜格尔也许把那本签名册卖了，但更可能的是，它进了戴笠的档案。

1946年7月7日，我离开上海，直到二十六年后才重访中国。威尔玛在南京大使馆里，多逗留了九个月，把使馆的文化联络处与美国新闻处的活动加以合并。

1945—1946年，我在“战后”中国的九个月，毋宁说是“战前”的经历。我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靠美国军事装备，把它的势力扩展到东北的主要城市，而那批寡廉鲜耻的政客则在重新占领中国东部以后，把所有的战利品中饱私囊，丧尽民心，贪污腐化和通货膨胀使原来拥蒋的社会上层也改变了态度。我原来希望，美国新闻署的活动能有助于国民政府，使它不致分崩离析；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机会。马歇尔将

---

① 细节请参阅威尔玛著的：《美国在中国的文化试验，1942—1949年》第106—109页。——原注

军在1月间曾经神迹般地遏制了内战的趋势，而到夏天，它又蔓延了。我们的对华政策正走着下坡路，可是美国的公众还未曾察觉到这一点。

跋

穆　欣

本书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所著五十年回忆录《与中国紧密相联》一书的第四部分（原书的第十五章至二十三章）。原著系由纽约哈波与罗出版公司于1982年出版。这是一本和这套丛书中其他几本迥然不同的著作。作者是著名的"中国通"，但不是以记者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身份，而以抗日战争期间派到中国的美国官员的身份和立场撰写的。书中许多内容就是当时他向美国政府所写的报告的节录。

费正清原名费尔班克·约翰·金，1907年生。美国大学教授。1929年哈佛大学毕业后获得罗兹（RHODE S）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1930年携眷来华，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历史。后又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继续其研究。他在北京居住期间，曾经兼任清华大学和税务学校的英语讲师。1936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关税的起源（1850——1858）》。1937年返美后任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华盛顿美国新闻处任职。1942年——1943年担任美国战时

情报局在重庆的代表，并任重庆美国大使馆特别助理兼新闻处主任。日本投降后，再度来华任美国在华新闻处长。1948年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重访中国。战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被称作“中国通”的美国外交官和驻华新闻记者当中，曾有相当数量的人成为美国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对象。著名的外交人员谢伟思、戴维斯和著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都曾受到严酷的迫害。费正清当时也曾受到过麦卡锡主义的攻击，但他不是其主要目标，没有受到严重迫害，也没有影响他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费正清为美国培养中国问题专家效力二十余年，很受美国政府器重。他所培养的一、二代人中，有的成为反华专家，有的随着美国政策的发展而转化。费正清常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著有《美国与中国》(1948)、《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1954)、《中国的传统和维新新解》(1968)、《美国和中国的传教事业》(1974)等书。还与赖绍华等合著《东亚文明史》三卷(1959——1973)，与邓嗣禹等合著有《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955)、《清代的行政：三种研究》(1960)。此外编有《中国的思想和制度》(1957)、《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1968)；与他人合编有《中国对西方的反映：1839——1923年文献通论》(1945)等书。

作者在中国逗留期间(共计十五个月)，曾在重庆等地接触过相当多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学术界、文化界知名人士，他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

治、社会情况，蒋介石政府不得人心和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他以自己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对于蒋介石的封建皇帝式的法西斯独裁，对于特务横行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以及在国民党统治下个人主义遭到的压抑，都曾有所揭露并且表示明白的不满。书中还对作者尊敬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形象作了正确描绘。

费正清这次来华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转变关头。自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和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二次大战真正成为全球性大战，形势急骤发展。随着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了主动权，同盟国已在欧亚战场开始转入反攻，中国战场引起举世的注目。中国政府能否维持有效的抵抗？能否参加对日的最后反攻？中国在配合同盟国作战，促成二次大战的早日胜利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尤为美国朝野所最关心的问题。

在这方面，作者看到“美国的幻想破灭即将到来。中国官方关于英勇抗战的宣传正被美国观察家们戳穿。美国观察家们发现，中国虽处于战争状态，却不在抗战。整个国家还未动员起来，因为动员机构还未建立。中国在海外进行的宣传是十分危险的虚伪编造。”当时国民党“中国首先关注的不是抗击日本的战争，而是准备将来与中共的内战。”

关于国民党的恐怖统治，这个政府的腐化堕落和它的颟顸无能，本书有较多的暴露。作者认为“现政府已走上‘法西斯’道路”。他说：“陈立夫的活动标志着中国由家族统治的政府转变为一党专政。无论两者之中的哪一种，都建立

在下级对上级的个人忠诚之上，从最基层到最高级领导都是如此，最高领导一个人便是无上权威。”蒋介石集团“只相信和依靠CC派和戴笠的组织，他们想靠压制异己来维持统一，结果事与愿违。政治手腕和恐怖手段使蒋介石政府在上层爱国人士中丧失合法地位。腐化的官僚体制并不能因此赢得腐化的投机分子的忠诚。这个进程真是可悲，从内部说，已失去控制，而外面的力量又无能为力。”作者认为“1943年夏初是人们心理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蒋介石开始失去民心”。他在1943年8月说道：“对现政权，已不能抱多大希望，因为它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积极帮助群众。如果说，它还能在民众的可悲灾祸与苦难之中维持摇摇欲坠的脚步，那只是因为敢于对它动手的人太少。”

书中对蒋介石有所指责：“到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象征，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对他的信任与忠诚。”蒋介石“还打算加强他的领导地位，结果只是使学术界更加疏远。”作者说：“我到昆明时发现，最高掌权者所著《中国之命运》，在教授们眼中是对著述事业的一种侮辱。”作者对宋美龄也有微词：“她极力想表现为一个伟大的夫人，谈话过分矫揉做作。”——“她的骄傲使她时刻在演戏”。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持美国政府立场是坚定的，他在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从如何对美国有利这样一个基调出发的。可以看出，他对国民党暴政的揭发，是要把中国的政治局势扭到美国布设的轨道上，在于要在战后的

中国建立“美国式”的社会形态。同样，他想按照这种模式来塑造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由于作者的这种偏见，他对各种事物的观察是不全面的，分析问题的时候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作者所具有的这种“一切为了美国利益”的立场，有时会用极其荒谬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说要把科技传到中国，又怕中国有了反对美国的手段。“中国人象日本人一样，可以接受我们的技术。他们吸收的自然科学再多，也未必就此把我们连在一起。它很可能只是使中国有了反对我们的手段。”“我们在这里的长远利益必然是鼓励更多中国人员，沿着我们指引的方向发挥领导作用。”还说什么“我们不能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是当地的必须，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应当提倡国际主义。”甚至写出这样狂妄武断的话来：“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永远也赶不上美国。”

提到那些曾在美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他竟然说出他们是“美国在中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分利益”这样侮谩的话。他说：“由美国培训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是美国在中国的一项投资和资产。”又说：“这些在美国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思考、言谈、教书都和我们一致，他们是美国在中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分利益，在目前这场斗争中，他们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实际上，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风暴影响下，许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长期中热爱祖国，拥护人民的正义事业，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光荣。而在作者指名道姓提到的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都是著名

的爱国者，有的至今还战斗在新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斗争的最前列。

作者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唯恐别人说他已经“变成一个扩张主义者”。可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些话语，不是正好显露出一副殖民主义者的尊容么？他的这些话语集中表达的，无非是要防止“赤化”，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屈从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不损害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既得利益。可是，历史潮流的奔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绝不会以某些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费正清的悲剧正在这里。他所最苦恼的事情，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按照美国的方式办事，又立不起来他们自己的政权，无法摆脱自己必然灭亡的命运。

作者表示，在他呆在中国这个时期思想上有所变化：“在战时重庆度过又一年后，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了丧失权力的道路。”而“延安那遥远的地方就日益令人向往。”又说：“我离开中国的时期越来越近，每日的工作也越来越倾向于反对派。”他看到，面对着国民党法西斯暴政，各大学的“开明自由派教授”，开始转向左倾，看到“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中共问题”。根据他的观察，“左翼反对派中包括采取公正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也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同样批评秘密警察制度、新闻检查制度。……我所知的许多开明分子，以前强烈亲美反共，现在也同意共产党的观点。多数美国人也如此。”甚至公然表示：

“我花费更多时间考虑，如果我来作主，对中国这种一团糟的局面该怎么办，我的结论日益趋向于我也会采用中共的做法。如果不激烈，便不能打破这种局面。”

1943年底，费正清离华返回美国的时候，他说：“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颟顸无能已日益明显，他极力加紧控制，实行个人领导，结果并未奏效，可能局面因而越加糟糕。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薪阶层的人们，营养不良，失去希望。外国观察家们开始认为左派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作者据此批评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如果我判断1943年国民党已失去民心是不错的话，那末，1945年罗斯福死后，赫尔利大使把美国旗拴到国民党这艘船的桅杆顶上就不仅是徒劳，而且是灾难性的决策。”作者根据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我于1944年携回华盛顿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的产物，它不是CC派的控制或戴笠的秘密警察所能压得下去的。”“如果我们反对中共，将招致无穷尽的麻烦。”

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间，费正清又在战后中国逗留了几个月。这个时候，美国正在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对于中国人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一起的时期。”“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在日本投降之前未能预见现实的发展，从而制订一项合理的对华政策。”这时赫尔利“发出印第安人式的战争吼叫，并且虚伪地开始美国对国共矛盾的调处。”——“在罗斯福死后，性格刚强的赫尔利反对他的工作同事审慎

避免卷入中国内部矛盾的态度，宣布我们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这个不必要而且愚蠢的步骤把我们驱向以冷战（反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问题的‘解答’。这样我们回旋余地就少了，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预见到蒋介石将被打败，而我们由于支持蒋介石，一旦蒋介石失败，我们势必也被赶出中国。”

这个时候，费正清又要表示对中国友好，又要忠于美国的政策，常感处境尴尬。以后作者访问解放区，在张家口一个剧场里向青年讲话的时候，“从来未曾感到那样穷于言词”；“我不能背离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来讲话，也没法把这项政策说成通向公义、富裕的天国之路。”作者的这种尴尬处境，细心的读者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随时能够觉察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费正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主流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在思想上能够理解历史发展的方面，对于进步力量也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是他又是一个美国官方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在行动上他又不能也不敢完全接受自己得出的结论。这种政治立场上的摇摇摆摆，吞吞吐吐，就不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时露出自相矛盾的破绽。

1986年3月1日于北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国之行
作者＝
页数＝１８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